



黑水城历史文化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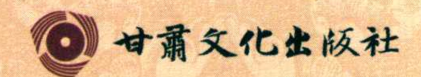
百年黑水城

BAINIAN

HEISHUICHENG

蔡彤华/编著

物转星移，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流经百年，当我们再一次面对黑水城，就会发现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辨。陶瓷残片，风化的白骨，破损的石磨、块垒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过往。在古城遗址的西北角上，矗立着五座覆钵式佛塔，它们是那样古朴，圆融，安详，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风沙侵袭，今天却依旧耸立云端，成为黑水城独具魅力的标志。站在城池的面前，我们感慨万千。岁月的无情，把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城变成了一座任黄沙掩盖的古迹，任谁也找不回当年的喧嚣与繁华……



甘肃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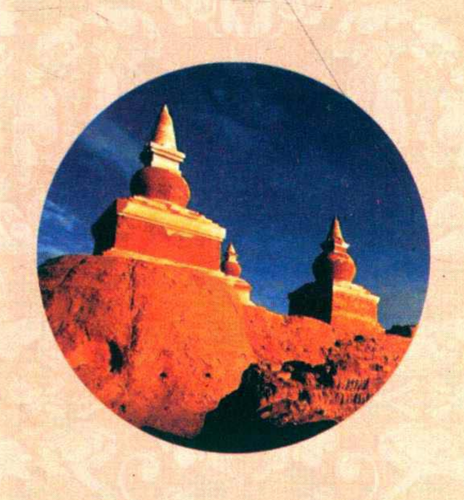
黑水城历史文化系列丛书

百年黑水城

蔡彤华/编著

BAINIAN

HEISHUICHENG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黑水城 / 蔡彤华编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490-1492-7

Ⅰ.①百… Ⅱ.①蔡… Ⅲ.①额济纳旗—地方史—研究 Ⅳ.①K2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6901号

百年黑水城

蔡彤华　编著

责任编辑 | 房金蓉
封面设计 | 吉　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12.5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492-7
定　　价 | 38.00 元

著　　者：蔡彤华

序　言

百年以来，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遗珍中有众多文物是西夏时期的，黑水城文献为新兴的西夏学铺垫了厚实的资料基础。

20世纪中国有震惊世界的四大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黑水城文献，而这其中的两大发现就出自于额济纳的黑水城地区。六万多枚居延汉简和八千多件（册）西夏文献，确立起黑水城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里自然环境特殊，既有戈壁、沙漠，又有绿洲。祁连山融化的雪水汇成黑水河，滋润着干渴的沙漠，形成了独特的沙漠绿洲。自古以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就在这块奇特的土地上生活着。而人们的生产、生活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数千年来，这里的环境变化很大，这种变化强烈地影响着更为广大的地区，并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阿拉善是自然的摇篮、人文的绿洲。这里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朴、经济快速发展。可以用三个方面来概括阿拉善。从生态的视角看阿拉善，这里是一片荒漠，在2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浩瀚沙漠、茫茫戈壁、荒漠草原约各占1/3，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许多地方荒无人烟，可谓苍茫大地，无垠旷野。从艺术的视角看阿拉善，这里是一片圣地。古人在这里曾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诗篇。这里巍巍贺兰山高林茂，幽幽居延诉说兴衰，古老岩画栩栩如生，灿灿胡杨金叶厚重，点点

沙湖碧水映天，座座古庙古香古色……阿拉善王府在这里记录着昨天的故事，东方航天城在这里展示着今日的辉煌，苍天厚土在这里承载着英雄的传奇，各族人民在这里建设着美好的家园。这里文化积淀丰厚，文化土壤肥沃。

阿拉善文化积淀丰厚，文化土壤肥沃，从经济的视角看阿拉善，这里是一块宝地。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种86个，占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矿种的76%，湖盐、无烟煤、萤石、奇石等储量居内蒙古自治区首位。这里生物资源多样，有野生植物669种，其中，列内蒙古自治区珍稀名录的有45种；有野生动物18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有37种。这里旅游资源富集而独特，在国家十大类95种基本类型旅游资源中，阿拉善就有八大类55种，其中许多旅游资源，如航天城、世界沙漠“珠峰”、胡杨林、黑水城等都是全国乃至全球少有的。这里拥有富饶的黄河农业灌溉区、贺兰山林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盐场、世界第一大金属钠制造厂等。山需一步一步登上去，船需一橹一橹摇出去。走进阿拉善历史深处，就如同走进了一座神秘的人文宫殿。这里的每次相遇，都会带给你无垠的遐想，带给你美丽的际遇。

在额济纳生长的胡杨是古老的物种，有着活着一千年不倒，死了一千年不朽，朽了一千年不腐的传奇，它用顽强的生命延续着年复一年的生命赞歌。人们现已认识胡杨，喜欢胡杨，可知道额济纳历史又有多少，这个无从了解，生长胡杨的额济纳和胡杨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其历史价值和胡杨同样珍贵。居延是额济纳历史古称，是居延文化的一部分，黑水城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人语言命名的城名。在历史上发挥阻碍防范外域入侵，商贾游客信使传递信息的重要中转之地。因此，在额济纳这样一个大漠深处的小镇，发现出土重要历史文献，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4年，阿拉善盟委、行署经过认真调研，专门成立了俄藏黑水城文物访问工作小组，抽调阿盟文化、文物和档案等方面的专业骨干，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

东方文献研究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科兹洛夫博物馆等相关文物收藏馆所以及文化机构，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拍摄、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积极探索一条额济纳流失文物的回归路线，形成一种国际文物保护的有效合作模式，从而全面推动居延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扩大和提升阿拉善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地区的全面发展。黑水城流失文物的保护研究及回归需要我们做出长期的坚持和努力。通过沟通交流，访问团成员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对黑水城流失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有了更多的思考。希望通过后续的努力使回访活动的成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拓展、巩固和提升，能够使阿拉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尤其是流失海外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做得更好，走得更远，为阿拉善的发展和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为巩固此次访问成果，拟有组织、有目标地培养一支专业研究队伍。黑水城文物的深入研究需要一些懂外语（俄语、英语、日语等）、会交流、具有一定西夏文字识读能力的文物专业工作者，这需要我们有计划地选送一些专业骨干进行专门的培训，开展国际访学，不断培养和造就一支人才队伍。这不仅是阿盟搞好流失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更是提升阿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水平，实现文化繁荣，促进融合发展的长远追求。

为提升此次回访成果，拟通过努力使阿拉善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科兹诺夫博物馆等建立国际友好的关系，为遗失海外文物的研究保护搭建交流平台。当前，中俄关系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期，中俄文化的交流充满了活力，我们应当转变思路，通过建立一些国际友好关系，投入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当中去，积极参与，真诚沟通，有效推动成果共享，实现我盟对黑水城流失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收获一份地区文化权益。

当下，国家积极推行向西发展的丝路经济带战略，阿拉善处于这一战略通道的重要节点，正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全力推进阿拉善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为大发展目标，将以构建“大沙漠、大胡

杨、大居延、大航天、大民俗”五大国际旅游目的地，打响“苍天圣地阿拉善”全域旅游文化品牌。将以居延大遗址是保护草原丝绸之路、传统丝绸之路的重要屏障，是中原、草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切入点，以黑水城文化为纽带，转历史之“危”为现实之“机”。通过国际友好交流，从而寻找向西发展的落脚点，积极加入新丝路的进程中，实现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地区发展机遇。

目前，阿盟已报请自治区文化厅等相关部门，为正式签订阿拉善博物馆与东方研究所和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协议做准备。经沟通已基本确定了协议内容，包括就黑水城文物资源的保护、研究进行合作，具体包括建立目录数据库、合作出版、人员互访、国际研讨等许多方面。

为扩大此次访问成果，已举办了俄藏黑水城流失文物访问活动回顾摄影展、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建立教育基地，签订委培西夏学专业人才等一系列活动，提升社会保护的意识，形成一个全社会共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近几年随着西夏研究的长足发展，对黑水城的关注也与日俱增。20世纪80年代，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片《黑水城遗址》首次在荧幕上向世人推介了黑水城。后中央电视台10频道又制作了《西夏——一个被遗忘的王朝》，其中有不少黑水城的内容；1991年，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过程中，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有两尊彩绘泥菩萨像，还有多种西夏文典籍。进入21世纪后，中央电视台又制作了5集西夏电视片《尘封不住的西夏》。2006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制作多集《新丝绸之路》，其中第八集为《黑水城》。影视中以黑水城演绎西夏，讲述西夏又凸显黑水城。中央科教频道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2016年5月，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和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联合出版的《神秘西夏》和《正说西夏系列》系列图书，定位“正说”，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历史真实，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有人说，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地理环境变迁。历史的沧桑巨变，湖海干涸，绿洲变成沙漠，物是人非，黑水城已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残留在额济纳戈壁沙漠之中。黑水城的断残遗迹，诉说着战争对社会文化、经济的破坏。历史是靠文献物记说话的，历史不会说谎。了解历史、发现历史，首先必须学会发掘文物。因此，要尊重历史，发现历史，必须先学会尊重文物文献，更要保护重要的文物文献。

额济纳黑水城文献文物发掘虽给我们留下很多遗憾，也由此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但随着国家对历史文物文献发掘工作的重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文化交流不断在加强，它对历史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它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额济纳，了解阿拉善，从而了解我国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变迁，增强全社会文化意识和爱国意识，牢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

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唯有了解历史，才能传承历史文化，才能做好今天的事，展望美好的未来。

目　录

第一章　探寻黑水城

第一节　百年沧桑

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赖呼布镇东南约25公里的荒漠中，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宜于耕牧的绿洲。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水（古称弱水）流经这里，灌溉着两岸的农田草场。西夏立国后，在此设置黑水监军司，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西夏宝义元年（1226年），蒙古大军攻破黑水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归甘肃行省管辖。“亦集乃”为“黑水”的西夏语称，“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元朝沿用西夏旧称，仍名“亦集乃”，后世称为“额济纳”。元亡以后，黑水改道西移，草场农田沦为沙丘，城郭随之废弃。

物转星移，时光总在不经意间流过百年，当我们再一次面对黑水城，就会发现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辨。陶瓷残片，风化的白骨，破损的石磨、块垒等，都在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过往。在古城遗址的西北角上，矗立着五座覆钵式佛塔，它们是那样古朴，圆融，安详，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风沙侵袭，却依旧耸立云端，成为黑水城独具魅力的标志。站在城池的面前，我们感慨万千，岁月把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城变成了一座任黄沙掩盖的古迹，任谁也找不回当年的喧嚣与繁华。

黑水城遗址，处于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每一面城墙都堆附着高高的沙堆，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从城墙外的沙堆上径直爬上十几米高的城



黑水城全景

墙，然后从城墙内的沙堆走下城去。城址周围几十里荒无人烟，只是偶尔有路人经过。黑水城的城墙、城门基本上保留下来。平面布局略呈方形，东西长421米、南北宽374米。四周城垣保存较好，基宽12.5米，顶宽4米左右，平均高度达10米以上。东西两墙置城门，东门偏北，西门偏南，相错而设。城门外皆有方形“瓮城”，门皆南开，以避风沙。城墙四角增加厚度，筑有向外突出的圆形角台。城墙顶部外缘建有女墙，系用土坯砌成，没有垛口。墙体夯筑，夯层明显，墙内尚存木骨夹棍。城垣外有马面20个，计南北各6个（南垣最西一个被毁），东西各4个；马面作方形，有收分，端头翘起。现今城墙仍高耸地表达10米，城内至今仍存断垣残壁，范围大致可辨。现已探明，东西向的大街有4条，南北向的大街有6条。大街两侧多为店铺和民居，佛寺遗址散见于城中。在城垣西墙北端和西北角台上，曾建有五座喇嘛塔[1]，三个保存较好，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第4页，《文物》1987年7期。

两个已毁，前些年在原基础上重建。在城中心建有三座佛塔，在城外西北有佛塔群，在南城外有佛塔一座，总计二十余座。这些大小不同、残损程度不一的佛塔，使古城更加雄伟，也使这座在大漠中沉寂了数百年的古城更具魅力，令人遐思。

清真寺与回回墓地分布在城外西南，一座土坯砌垒的穹庐式伊斯兰教礼拜堂至今仍矗立在这里，尚未被风沙掩埋。



黑水城清真寺

黑水城的废弃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引起的，传说元朝最后一个镇守黑水城的守将是一位名字叫作哈日巴特尔的黑将军，他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当元朝大军兵临城下，他顽强抵抗，元军久攻不下，于是在流经黑水城的额济纳河在上游拦腰修了一条沙坝，堵塞了流向城里的水源。城中缺水，人们在城里西北角挖井，一直挖了80丈深也没挖出水来。黑水城危在旦夕，黑将军誓死不降，他把几十车的金银财宝全部倒入井中，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偷偷从城西北角城墙凿开一个洞，带领军队从洞中杀出。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元军占领黑城以后，对全城

进行了洗劫，可一直没有找到黑将军埋下的财宝。后来也有一些人结伙到城里挖过这批珍宝，都一无所获。土尔扈特人说黑将军埋珍宝时留下过咒语，挖他留下的宝藏会遭受不幸，据说探宝人最后一次挖宝时，不但没有找到黑将军的珍宝，还碰到一红一绿两条大蛇。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挖黑将军的财宝了[①]。现在被称作怪树林的地方，就是当年突围的古战场，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怪树林的传说连同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科学研究表明，黑河水下游是喜马拉雅山和祁连山造山运动形成的盆地，地表由剥蚀中低山、丘陵、山间洼地、洪积扇群、洪积扇、冲积平原绿洲、湖积盆地组成[②]。它东接巴丹吉林沙漠，南邻甘肃鼎新盆地，西达马鬃山东麓，北抵蒙古边界。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的低山、丘陵，海拔1000—1500米，东南部的沙漠地带，海拔1100—1200米。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黑水河，是我国著名的第二大内陆河，全长821公里，流经青海、甘肃，进入黑水城地区后，分为东、西两河，十二个支流，呈扇形流入古居延海，形成了“河湖岸带”“湿地”“荒漠戈壁”“沙漠”四大生态系统。其中除了“河湖岸带”“湿地”生态较好外，其余地面“植被稀疏，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气温年变化、日变化较大，光照充足，多风沙”。

《尚书·禹贡》[③]注载：“古居延泽‘新如月生五日’，则其状为“新月形”。《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洲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 “乃汉之西海郡居延古城”。由此可知，先秦至夏、元时的居延大泽在今黑水城东北，是一个新月形大湖。而现在的东、西居延海，也即苏泊淖尔、嘎顺淖尔却在西北，明将冯胜率大军攻破黑水城时，曾使黑水河改道，加之水量减少，原来的一个月型大湖逐

---

①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第四章《额济纳河下游与哈拉浩特遗址》。

②迟振卿、王永等：《蒙古额济纳旗地貌特征及其构造、气候事件》，第371页《地质品论》2006年第3期。

③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渐分离为东、西两湖，且湖面大减，并多次干涸，使今天的额济纳旗的尾闾湖嘎顺淖尔，距古居延泽相距50公里，生态环境严重退化。

黑水城一带，曾是历史上著名的居延文明所在地，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最初的人类活动。夏商周时，人类活动逐渐频繁，留下了“大禹导弱水于流沙”[①]“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周穆王西征，过流沙，积羽，狩猎”[②]。战国以降，乌孙、月支、匈奴相继在这里游牧狩猎。西汉武帝时，命霍去病驱逐匈奴，霍去病出陇西击败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以其地置酒泉郡，目的在于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出兵河西，直抵居延城。以后的二十多年步步为营，将匈奴逐出河西，在沿线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进攻与屯田同时推进，尤其是元狩以后，大规模经营河西走廊，“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汉朝在居延地区已设有“居延农都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④]农都尉，是郡一级屯田主管官吏。郡镇的设置，军队的进驻，长城的修筑，形成了一个扼守河西走廊的巨大防御体系。但是，匈奴民族并没有轻易放弃在河西走廊长期生存过的良好环境，不时地南下侵扰。

为了阻止和有效防御匈奴南下，汉朝在弱水（黑水）下游居延绿洲上开始布控驻军，设立居延塞，由称“遮虏障”，设居延都尉，沿弱水修筑有西南东北走向的类似于长城的防御设施。当时居延都尉，是边塞武职中地位较高的武官，“秩比一千石”。《史记·匈奴传》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城居居延泽上”，驻军的粮草供应，就依靠军屯来解决。从此，这个孤悬塞外的军事防御地与屯垦戍区就出现在居延。据专家测算，两汉时居延屯田达280万亩，修筑城池、亭障20余座，烽燧120余座，修甲渠、临渠等

---

①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穆天子传》卷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②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442页。

③《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④赵丽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水渠数十条，农业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隋唐时，又在此修筑大同城，并置安北都护宁寇军。同时，兴修水利，开垦新田，再一次促使了居延文明的崛起。唐代宗时，突厥攻占河西走廊，甘、凉交通封闭，于是居延古道代替了河西通道，大量的中西使者络绎不绝，来往于沙州—居延—长安之间，并留下了大量的壮美诗篇。如王维“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入汉塞，归燕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①

五代辽宋之时，政治中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辽虽曾占领居延一带，但发展不大。直到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居延后，设置“黑水镇燕军司”，繁荣稳定发展近200年。元代时扩建黑水城，置“亦集乃路”，又稳定发展150余年，使夏元时期的黑水城地区很快成为额济纳历史上的黑水城文明。

西夏前期设立十二监军司，后期增加到十八个，是西夏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同时兼理民政。黑水镇燕军司，主要防御北方的契丹。夏元时期这里河渠纵横、农牧交错，形成了城镇工商业、城郊农牧业以及外围游牧业的三种经济形态。至元八年（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途经这里，他在游记中记载，“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Edzina）。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特。居民是偶像教徒。颇有骆驼牧畜，农业、牧业为主。盖其人不为商贾也。”②应该说马可波罗记载的是元朝初期亦集乃城情况，从出土文献来看，元代亦集乃的工商业是相当繁荣的③。

黑水城地居四塞，北接往岭北，南抵河西，西通西域，东至大都，中原的农耕文明和北方的游牧文明以及来自中亚的丝路文明在这里交汇。元朝西进中亚的一条重要通道就是由大都西进亦集乃路，再向北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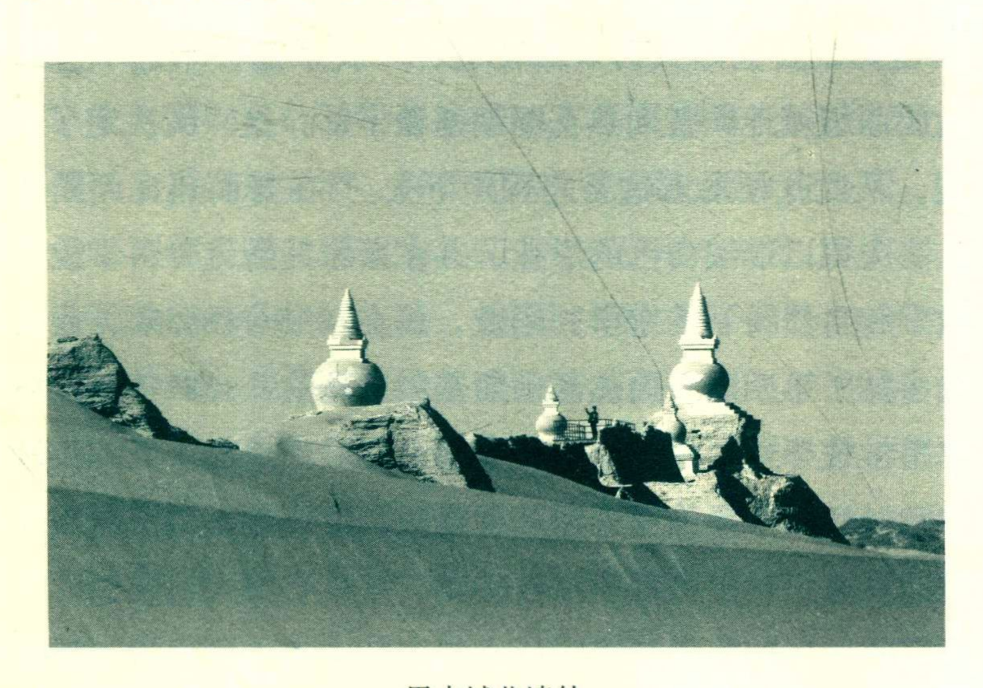
①王维撰，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10《出塞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②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

③《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第37页。

草原和林，这条道还可沿河西走廊进入西域中亚。《经世大典·站赤》记载，元代“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的纳怜道，由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过黄河，经宁夏往西行，亦集乃是纳怜道上的交通要冲，由这里向北行40日，即可抵达岭北行省治所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发展和人口增加，祁连山森林资源也不断遭到破坏，致使弱水流域下游的水源不断减少，特别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攻破亦集乃城，黑水河（额济纳河）改道，失去水利的黑水城最终被漫漫黄沙所吞噬。有学者指出：“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农牧业的替变和农牧交错带的空间移位，还是社会结构和朝代的更替，都与历史时期气候的较大变动在时空上高度融合。”西北地区“古城废弃的时期，往往也是气候明显偏干冷的时期”①。无论是黑水改道抑是气候的变化，都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让后人从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责任。



黑水城北墙外

①王录仓、程国栋、赵雪雁:《内陆河流域城镇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机制——以黑河流域为例》,《冰川动土》2005年第4期。

第二节　科兹洛夫掘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斯坦北部和南部之绿洲，中国西域、敦煌、蒙古、西藏成为外国探险家的乐园，其中敦煌莫高窟、黑水古城等成为关注的焦点，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美国瓦尔纳、俄国科兹洛夫、奥登堡、波塔宁在他们所写的“探险”报告和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关于哈喇浩特废墟出土有银制器物和其他财宝的情况。波塔宁最早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在黑水城的流沙中埋有银器、财宝的传说[①]，收获最大的是科兹洛夫。

科兹洛夫出生在斯摩棱斯克省杜霍夫申小镇一个牲畜贩卖者的家庭，他在当地学校毕业后，就在斯洛博德市一家啤酒厂当办事员，恰巧一位当时就已出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普而热瓦而斯基，在这里买了一座别墅。1882年，科兹洛夫与普而热瓦而斯基相遇，决定了科兹洛夫此后的生活道路，科兹洛夫后来回忆道：“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大胆而坦诚地同普而热瓦而斯基谈了话，这一天决定了我整个一生的前程，从此我便沿着这条路程走下去。”在普而热瓦而斯基的提携下，科兹洛夫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并在斯摩棱斯克专科学校（当年那是偏重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中学）毕业，而在1883—1885年，还很年轻的科兹洛夫参加了第四届普而热瓦而斯基中亚探险，1887年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军事学校毕业，并被授予军官衔。此后他参加了1888年别夫错探险队和1893—1895年罗伯罗夫斯基探险队。遣使他得到日后被委托独立进行探险的锻炼。

旅行家兼民俗收集者波塔宁从土尔扈特蒙古人那里得知黑水河口有一座废城，他在1884—1885年度旅行报告中写道：土尔扈特人说有一座

①[俄]波塔宁：《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疆和蒙古中部》，第464页，莫斯科：圣彼得堡出版社，1893年。

古城叫埃尔海—哈拉—布留克，意指黑水极东部支流岸边的黑城；他们说，那里还可见到大的城垣，即小城墙，四周有许多沙埋房屋遗迹。挖开黄沙就能找到银器，小城四周则为流沙，附近无水①。1900年，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曾试图找到这座沙埋小城，当地的蒙古人不仅没有告诉他这座故城所在，而且把他引向了与黑城完全相反的方向。当年科兹洛夫身在蒙古，也曾派遣他的同伴卡赞科夫前去寻找此城废墟，都没有找到，原因还是一样。”当地居民对废墟情况秘而不宣。

1907年沙俄组建蒙古—四川探险队，同年6月17日和10月2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两次召见领队科兹洛夫，双方就行动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得到了沙皇的大力支持，由国库发款3万卢布。探险队有14名成员，配备步枪十二支，子弹一万五千发，左轮手枪六支，子弹六百发。颁发通行文书写道：上帝保佑，朕全俄皇帝、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仰全体知晓，持证人为我帝俄地理学会所遣科学探险队队长。该队将取道恰克图经库仑前往中园西北和蒙古，然后经兰州府及库伦返回俄国。队长为掷弹兵团统帅亚历山大三世近书军中校彼·库·科兹洛夫，出入俄国境由其随从十人陪同，故希沿途所经地方军政当局查验放行，务令科兹洛夫及其随从十员畅通无阻，并于优待。特颂此照以资证明。文书加盖国玺，外交部副部长遵圣旨签字、印鉴以及1907年8月 12 日年款②。

由于沙俄政府和沙皇的支持，俄国驻博格多汗的外交使馆很快从清政府得到通行护照，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有关中国地方当局。他们前往库伦（乌兰巴托）时，恰克图边境专员根克与中国派驻蒙古的管理当局接洽，得以租用蒙古驿马和蒙民骆驼。鉴于奥布鲁切夫的错误，科兹洛夫决定同当地蒙古人搞好关系，特别要取得蒙古王爷巴登札萨克和土尔扈特贝勒的支持。

---

①[俄]波塔宁:《中国与蒙古中部地区的西夏与吐蕃边界1884—1886年旅行记述》,圣彼得堡,1893年。

②[俄]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08年3月初，探险队抵达巴登札萨克王爷驻地乌果勒津-托洛果，向王爷巴提出到额济纳河，王爷问为什么一定要走额济纳河，而不直接前往阿拉善，阿拉善的道路好走，还可少花时间，节省开支，看来你们对额济纳河很感兴趣！科兹洛夫回答说，王爷您说的对，那里有一座古城废墟，很有意思。王爷沉思片刻，慢慢地说：我听手下人讲，那里确有一座四周有墙的城市，不过已被黄沙掩埋了，土尔扈特人不欢迎外人去古城的，你们是找不到的。1908年3月12 日科兹洛夫在给地理学会秘书的信中写道，起初王爷和他的两位顾问都竭力使我相信，在我要去的方向是没有路的。但是礼品帮了大忙。首先是左轮手枪和步枪，宴请，以及留声机，还有那封请俄国驻北京使团转请清廷加封巴登札萨克为乌鲁孙-古纳的信件，此举将使他从博格多汗朝廷所得薪俸增加两倍。由此可见，没有他的协助，科兹洛夫同他的先行者一样，是不可能找到黑水城的。

在前往黑水城的途中，第二位提供帮助者便是土尔扈特贝勒达西，正如科兹洛夫在后来演讲中所说，他给了探险队很大的帮助，探险队才有可能找到黑水城。土尔扈特贝勒在与哥萨克布里亚特农民巴德马沙波夫谈话后，同意探险队进入黑水城废墟。1908年4月1 日，科兹洛夫兵分两路，大部队和辎重按预定计划前往定远营（阿拉善），科兹洛夫和切尔诺夫、纳帕尔科夫、哥萨克伊万诺夫、马塔耶夫5人小分队，在向导巴塔的带领下，从托罗昂策向黑水方向进发。巴塔曾多次到过黑水故城，轻车熟路，走到半途发现农耕和定居文化的痕迹，有磨盘、陶器、瓷器碎片、水渠痕迹等。但是，最使探险队感兴趣的是土夯建筑，特别是沿途可见宝塔，或一两座，或三五座，散落在道路两旁。越接近朝思暮想的目的地，科兹洛夫一行的情绪越亢奋，终于在一条干涸的古河床边，看到高高耸立的城墙。

他们在黑水古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 日），“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满了1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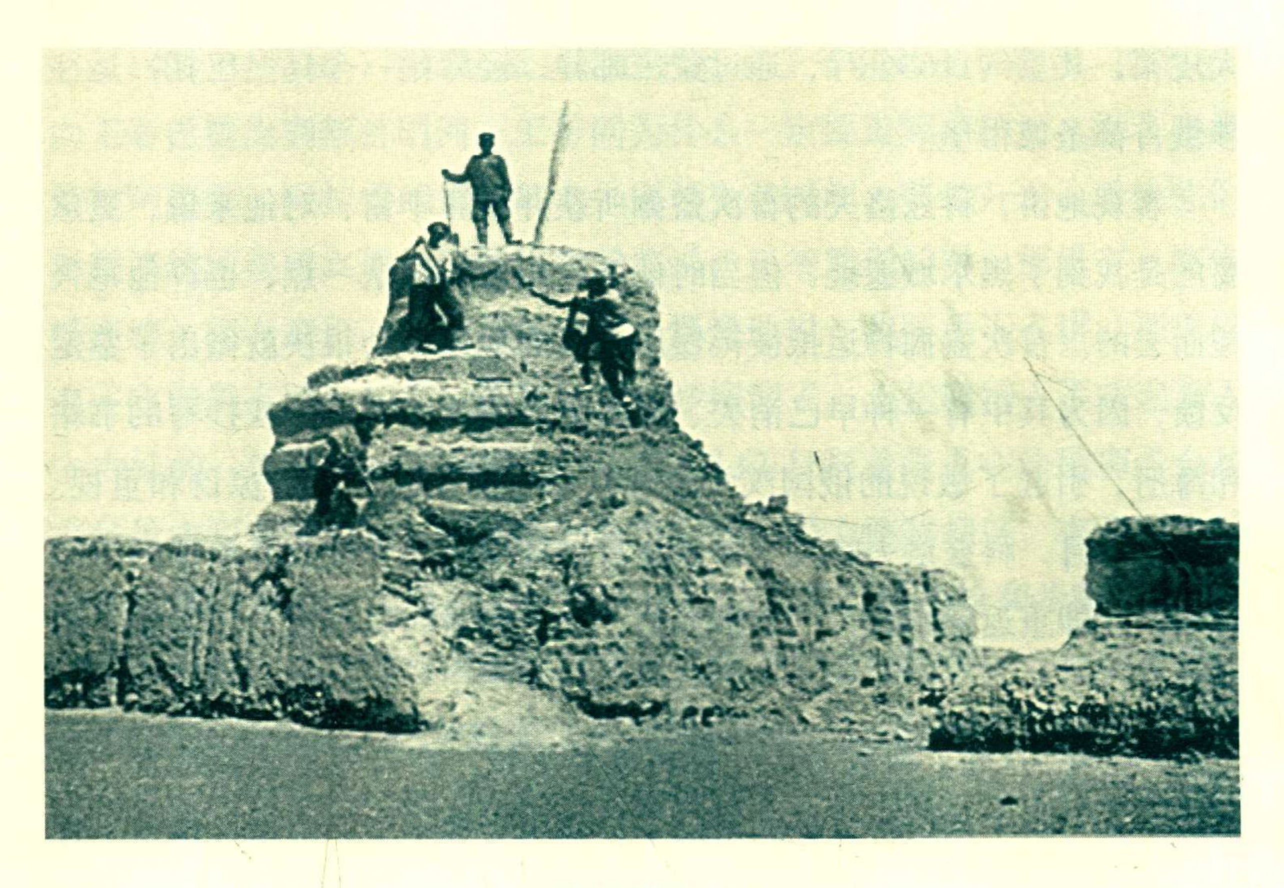
大皮箱，共重约1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沙俄首都圣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但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做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一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住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起初并没有惊人的发现，科兹洛夫本人则不仅“未正规参加发掘”，“甚至连很有意义的发现物也不曾登记在城市平面图上”。

5月27日科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时间是五点钟，已感到天地炎热，不禁想到在凄凉、死寂的黑水城我们将如何工作”。显然，他对这次重返发掘并非一开始就充满信心。然而，奇迹出现了。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无怪乎后来这个俄国人声称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在这个著名的塔内，他们的疯狂发掘整整持续了9天（1909年6月12日—6月20日）。科兹洛夫后来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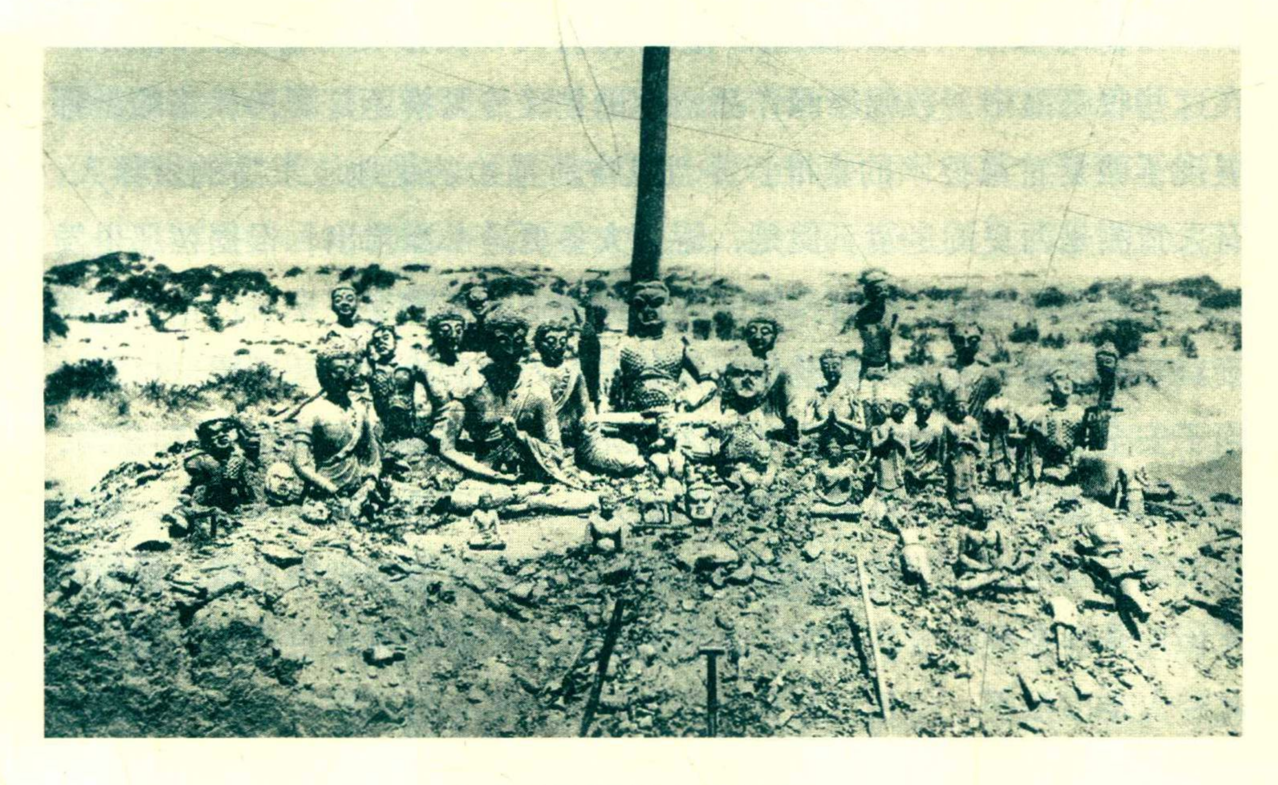
1909年主要发掘两处：一是庙宇遗址。在要塞北墙从西数第三个侧防塔楼上，一张几乎散了架供桌、数件佛像底座，有绘着圣徒和双头绿鹦鹉的壁画。二是城外古塔。这座被科兹洛夫称为辉煌舍利塔，位于黑



辉煌塔的挖掘

水城西城墙外约300米，西夏遗物大多出于此塔。科兹洛夫十分兴奋地写道："它赐予考察团大量的收集品，一批书、画卷、手稿，近300件画在画布、薄丝绸织物和纸上的佛像"，"文明水平参差不齐的金属和木质佛像、刻板、苏布尔干（泥塔）模型及许多其他物品，一块代表着高超编织技艺的双面挂毯特别富丽堂皇"。由于这些发现物被罕见地完整保存于异常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大量书、手稿，还有神像在地下沉睡了几个世纪后，其色彩鲜亮清晰的程度让人惊叹不已。不仅书页保存完整，就连以蓝色居多的纸质和丝绸书皮也是如此"，"只要看一眼刚刚从泥塔中挖出的这尊或那尊佛像，这本或那本书，或被发现的单个小雕像，特别是青铜或鎏金的小佛像，散发出栩栩如生、意味深长而又真实的东西。""两件写在网状织物上的汉语书，当我们打开这些神像画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妙不可言的、沐浴在淡蓝色和浅粉色光辉中的坐像"，"只要你从旁边随便拿起一幅画，画的多数色彩立刻会脱落，还有一位可能是宗教人士，他的骨骼呈坐姿放置在墓志铭北墙旁高于台

座的位置”，“书籍密集地堆成一堆，或者紧贴在分别用木轴卷起的神像旁”，还有“几本谨慎裹在丝绸中的书籍”。“保存最多的是青铜小雕像、铜板、木刻板、泥塔模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手稿卷和单个手稿超过2千卷或份，近300件”。在哈喇浩特发现的蒙古文献共计17个编号，有一片14行的残卷带有训导性质，它是成吉思汗训言片断”[①]。



20世纪挖掘后塔基和泥塑像

一般认为辉煌舍利塔于1226—1227年，在成吉思汗攻占黑水城前被密封起来。由于挖掘的混乱，后来俄罗斯学者无法确定哪一个纪年的经文是出自此塔。有专家推测，在埋葬了某位僧人后，更多的物品被放进墓里，与原来东西放在一起。虽然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尤其在此城面对敌人急迫攻击的时刻。就墓中的书籍和卷轴的数量、性质及多样性来看，可知这些宝藏要不属于某高层的人，就属于富有的寺院。

克恰诺夫教授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经典之研究，以及孟列夫教授对

①“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译小组:《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第44页。

中国经典的研究，都显示出这些收藏品中有许多作品是由帝王家委托制作的，其中有些复制成多部。就如同孟列夫教授写道："有几件作品是印在黄纸上的，而黄纸通常是皇室图书馆之私人复制品的标志。"[①] 此外，我们知道西夏皇帝仁宗及其皇后罗氏，以个人身份委托制作或资助许多出版物。根据上述两项证据，孟列夫推测，埋在辉煌舍利塔中的属于"官宦之家的一员及私人图书"。另有两项因素支持孟列夫的推测：在这些收藏品中，数幅绘画作品，不论是汉传风格还是藏传风格的，都展现了西夏首都技术的水准：并且其中所描绘的是地位崇高的供养人，有人猜测是西夏的皇帝。但是，孟列夫冬更进一步指出，根据在那里发现的女性头骨推断，拥有实物并埋葬在墓中的应该是罗皇后。仁宗皇帝于1193年去世，儿子纯佑继位。拜蒙古人入侵造成的动乱所赐，仁宗的侄子安全，推翻了纯佑，并得到罗皇后的支持。她迅速派使节到金国，盼望他们能支持安全称帝，并顺利获允。文献记录没再提及罗后。孟列夫假设：安全禁止罗后参与政事，因而罗后奉旨退隐到黑水城，最后老死该地并埋在辉煌舍利塔中。孟列夫承认这个假设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假设是唯一尝试辨认墓中人身份的一项推测。

俄国人黑水城之行的最后一天，又是残阳如血的黄昏。在微风扬起的沙尘中，一共有四十峰骆驼和科兹洛夫一起踏上了归途，它们的驼峰间承载了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五百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除此之外，俄国人还把一些不便运走的大件文物都就近埋在了黑水城的沙窝里，但是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古代的文物和艺术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

---

①转引自《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第46页。

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10到14世纪中国各个朝代，特别是一个西北帝国的文化资源。其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它们从再现于世的第一天起，便沦为外国探险家的囊中之物。

如今这些世所罕有的珍贵文物和艺术瑰宝，就静静地躺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的展柜和箱子里。

科兹洛夫的发现在学术界造成极大轰动，并且对于东方学中新兴显学——西夏学研究之推动起到很大作用，涉及西夏的历史、语言，包括西夏文字的解读、文化及艺术研究等。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①，现藏大英博物馆。

第三节　考古调查发掘

一、中瑞西部科学考察

1926 年冬天，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他接触了当时中国社会许多的重要人物。1926 年 11 月 21 日，斯文赫定在北京同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前任所长丁文江取得联系。在农工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瑞典籍）的积极鼓动下，他与丁文江草拟了关于到中国西北内陆地区考察的协议。协议规定“要把前去内蒙古和新疆考查所得的地质和考古材料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待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②。这一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声誉的协议一公布于世，就遭到了中国各界的一致反对。中国的学界、政界极力声讨，谴责此协议。

草拟的协定还规定“要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二人伴行，负责在西行途

---

①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

②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中国科技史杂志》,1984年1期。

中与当地官厅接洽，待考察人员抵达新疆后中方人员即刻返回，由瑞典人接替，继续进行考察”[①]。

据袁复礼介绍，当时丁文江为安特生所看好，丁居于安特生家中作为客人，被给予较高待遇。国家处于危难时期一些人对外只知屈服退让，只顾个人利益和安危，不会，甚至也没有那种保护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识。对内也不过是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肆意而为。1927 年 3 月 7 日，丁文江与斯文赫定所草拟方案披露之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反对将中国文物运往国外，反对外国考察团对中国西北进行考察，特别反对外国人对中国进行单独的探险和考察。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确定“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主体，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刘半农在京负责考察团的理事会，检查并指导该团进行的一切事务；经济方面接受斯文赫定的资助”[②]。

随后中方派刘半农为代表与斯文赫定谈判，双方经过十余次商讨，于1927 年 4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学签《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该协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平等的科技协议，按照协议，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内蒙古等中国西北内陆地区为期八年的考察，在考古学、地质学、历史文化学、简牍学、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开创中外科技合作之先驱”的成功之举”[③]。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中方团员黄文弼考察了额济纳旗黑水城及附近遗址，在城内采集到数百件文书，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考察黑水城[④]。

二、中国学者考古发掘

新中国成立后，黑水城所在的额济纳旗先后归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1962年

---

①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科技史杂志》,1984年1期。

②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科技史杂志》,1984年1期。

③中国地质学会:《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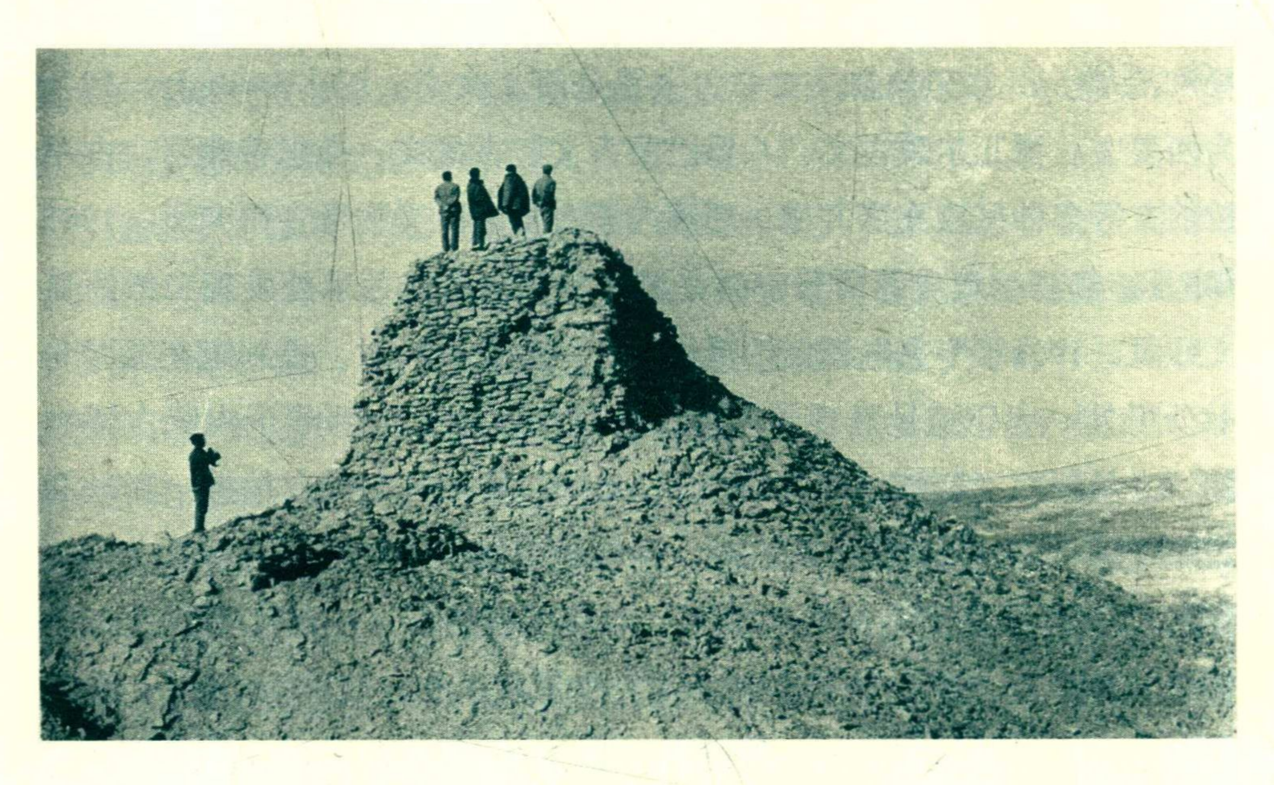
④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和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调查古居延时，在黑水城采集到少量文书[①]，现藏内蒙古博物院；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到黑水城调查，在距黑水城城址约20公里的老高苏木遗址也收集到一些文书，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西夏考察组也初次赴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察和访问。1981年7月15日—9月9日，丝绸之路考察队考察黑水城遗址，后出版《丝路访古》[②]一书。分别采集到少量文书，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下拨专款，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1983年和1984年两次发掘，基本上将全城勘察完毕，重点发掘面积11000平方米，揭露出房屋基址280多处，探明了古城的布局和沿革。出土3000多件文书，主要是汉文文书，约占3/4以上，其余为西夏文、畏兀尔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书，现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年5月，额济纳旗文管所普查时在黑水城西北角四百米处发现二纸西夏文残页。199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望长城》时，摄制组在绿城北七公里处一寺庙遗址发现了西夏文文献和文物，大部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少量留藏于额济纳旗文管所。2005年4月中央电视台拍摄《新丝绸之路》第八集《探访黑水城》时，在绿城寺庙附近发现写有西夏文字的瓷缸残片。汉文文书保存的情况，共有四种情形：一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简称为“整”；边沿微缺和损失少量文字的，简称为“缺”；残损不全但尚能贯通其文义的。简称做“残”；仅存文书一角，或虽有文字数行但是已经不能贯通其文义，或有年款、署名而无内容的，都称为“屑”。亦集乃路总管府架阁库遗址（F116）出土的“屑”纸最多，计1000余件，其中未刊印的纸屑，尚有490余件。出土自其他房屋基址中的主要是公文碎屑，其次是民间的契约、账单、包封等世俗文书碎屑。

①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旗沙漠中古庙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②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佛经的印本和写本在佛寺遗址中出土外，也有少量残屑出土于一般居民基址中。其中汉文文献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联合整理出版[①]，蒙古文及其他民族文献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蒙古学研究所联合整理译释。另外，1983年、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发掘的西夏文献收编在《中国藏西夏文献》“内蒙古编”中[②]。2001年06月25日，黑水城遗址作为夏至元时期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归入居延遗址项中。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调查黑水城遗址

①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②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史金波、陈育宁主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第四节 黑水城的价值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或称夏国）的别称。《宋史·夏国传》云：夏国境土，方二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其间城镇堡寨，更不知凡几。西夏太祖李继迁，在抗宋自立后，就“招纳叛亡，建立州城”以便有“且耕且战之基”①。景宗李元昊时“始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塞”②。崇宗贞观年间，打破夏军流动作战的常规，仿造中原制度，在沿边“多筑堡栅”，以为防守。就史籍所见，西夏所筑城镇堡寨，有的是作为统治中心而建，有的是为控御蕃部而建的，有的是为保护商路而建的，而更多的则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的。李元昊建国时，就在全国设置了12个监军司，统率全国的军事力量。

黑水城是十二个监军司之一，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依然控制着古居延的北部出口，控制着南下河西走廊、灵州、兴庆府要地的道路，包括自额济纳旗东行往阴山山麓和鄂尔多斯沙漠的通道，军事地理作用依旧重要。成吉思汗数次进攻西夏，这里是必经的军事要塞。早在1203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亡西夏，就是经过黑水城进入的。1206年春，成吉思汗第一次大举侵入西夏，其理由之一就是西夏接纳了桑昆，不送质子和拒绝征调。蒙古军队的进攻，就是先攻入黑水城，再驻兵肃州之北。1209年三月，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为由对西夏发动了第三次军事进攻，兵锋之抵西夏军事重镇黑水城。1226年春，成吉思汗第六次攻打西夏，蒙古军队分两路进兵，攻破黑水城和兀剌海城。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过程中，进兵的路线大都在黑水城一带，体现了黑水城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性。

---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包括绿城、绿庙一带均被开发重要垦区，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弱水河干流的右岸①。黑水城地区不仅是西夏军事重镇，更是西夏四大宗教传播中心之一。倘若对黑水城地区的百姓的宗教信仰活动作以分析②，就必须考虑到人文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自然这一方面看，黑水城地区异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显然是迫使该地居民采用宗教的手段来寻求众神的保护，以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痛苦，以及医治种种疾病的主要因素。而这一地区的百姓最终选择藏传佛教作为他们虔信、皈依的对象，多半是因为藏传佛教的神祇远比当地民间信仰百神殿中所有神灵强大、灵验。从人文这一方面来看，藏传佛教所具有的萨满教特征对那些绝望地需要借助超自然神力来克服其面临的不可战胜的自然环境的人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民族的人文特征肯定不是单单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来决定的，人文与自然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十分微妙、复杂问题。黑水城居民选择藏传佛教作为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应当是这一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藏传佛教之萨满性质互动的自然结果。西藏喇嘛正好适合填补原为传统的西夏和蒙古萨满巫师所占领的文化位置。正是那些看起来吓人，但神通无限的神祇才被认为有能力提供强大的手段来克服那些足以令人灭顶的自然灾祸，并给人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前景。

黑水城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大道的交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枢纽，阿拉善高原北端唯一的沙漠绿洲和商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与汉唐时的居延城、大同城的一样，在巩固西北边防，加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保障“丝绸之路”贸易畅通和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及特点也独具特色。

黑水城是承载夏元350年历史沧桑的古老遗址，至今已有1000余年，是夏元时期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活化石，是黑水文明的

---

①景爱:《从绿洲到沙漠》,《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论文集),第16页。

②参见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

载体、标识与传播媒介，它所表现出来的筑城理念、规模、格局、技术、军事体系，以及民居、寺院、佛塔等，具有丰富而广阔的文化内涵，既有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西夏人、蒙古人和其他的众多民族，在这里共同生存，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边疆文化，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夏元时期边镇生活的画卷。

黑水古城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宝库，黑水城文献与黑水城文书保存的夏、元时期的各类资料，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世界文化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夏、元社会生活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它客观反映了人们在这里与自然长期休戚与共的生活轨迹，也记录了这一带生存环境的不断退化，对我们认真探索这里自然环境的过去、现在、未来，并促使其与人互利和谐相处，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

以黑水城文献为标志的黑水城文化，是中原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由于黑水城特殊的地质、地貌、地理特征和特殊的生态环境系统，以及其特殊的交通、防御、政治、民族、历史、文化等功能，其孕育出的黑水城文化具有多元性、传承性、兼容性、开放性、流动性的特点。

作为阿拉善高原北端沙漠中的明珠，黑水文明是典型的绿洲文明，水是绿洲生命之源。黑水城因明将冯胜改道弱水入西北而被废弃，黑水地区的绿洲也因无水而沙漠化，黑水城兴衰史，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双重交叉的研究价值，是一个“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生存的重大课题。

黑水古城遗址及其历史文化特点，与居延文明一样，具有世界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随着黑水城文献的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以及黑水城遗址的修复，黑水城文化必将在我国民族文化中闪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它也直接推动了西夏学学科的形成和西夏学的研究。俄国学者利用哈拉浩特出土文物，对西夏历史、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

第二章　跨世纪追寻

第一节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出版

1907、1908年黑水城文献文物出土后，苏联学者近水楼台，首先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龙果夫、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克平等一批西夏学家。伊凤阁在文献整理中，惊喜地发现西夏人编的夏汉对音对义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他借助这一工具书，考证出一部分西夏文文献名称，打开了解读西夏文献殿堂的大门。我国学者罗振玉与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从俄人手中获得《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图片，石印出版，使西夏文字的释读成为可能。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研究专号，由中、苏、日三国专家撰稿。今天国家图书馆藏有苏联赠送的西夏文佛经，尚有俄文藏书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学者很难见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貌，只能靠俄罗斯学者陆续刊布的一些材料，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与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先生访问苏联，这是中国西夏研究者第一次踏上寻求黑水城文献的旅途。他们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览资料，但当时不能照相、复印，加之时间短，只能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为了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之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专家学者足不出户就能直接查阅、利用、研究这些文献，在多方的积极促成下，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长彼得罗思扬、副所长克恰诺夫的联合正式答复，同意与中方合作，共同整理出版藏于该所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全部

文献。1993年，中方邀请俄方代表克恰诺夫教授来具体谈判双方合作出版事宜，最终确定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方由史金波先生带队赴俄整理、拍摄文献。

根据协议，史金波先生分别于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四次率团赴俄进行整理、著录和拍摄工作，参加此项工作的中方专家还有白滨、聂鸿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蒋维崧，照相师严克勤。他们在整理过程中，首先参考俄国几代专家们的整理的目录。克恰诺夫教授将已经编纂整理好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慷慨借给中方工作组参考。此《目录》近800叶，著录了373种佛经，有的佛经有多种类型的版本，多种编号。克恰诺夫对每一个编号的佛经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西夏文和汉文名称、编号、版本、装帧、叶数时代、题款、形制、特点等。此书还编有多种便于查找、使用的索引。这份资料极大方便了中方对西夏文佛经的整理，在整理西夏文佛教典籍及回国后编纂《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它都是不可或缺重要参考资料。此书于1999年在日本出版。

史金波先生一行无不为这批珍贵典籍的巨大数量所震撼，先后四次工作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一年，他们几乎把能见到的黑水城出土的古籍都经眼、过手一遍。他们在原有目录的基础上，对文献认真阅览、审读，并详细登录，拍摄相关照片。登录卡片上列有40多个项目，包括编号（原编、别编、新编）、文献名称（民族文字、汉文对译、汉译、所在位置）、著（译）者、时代（原录、推测、辨疑）、文献类别、文献特点（首行、末行、装帧、背面、题记、批校、序、跋、印章）、纸张（纸幅、纸数、纸质、纸色）、刻写特点（墨色、字体、每纸行数、每行字数、版口、版心、栏框）拍摄要求等。他们于1993年整理、拍摄完全部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并整理了大部分西夏文世俗文献；1994年整理、拍摄完全部西夏文世俗文献。并整理了部分西夏文佛教文献；1997年继续整理、拍摄西夏文佛教文献，发现并整理了部分西夏文社会文书，还整理、拍摄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2000年整理、拍摄完西夏佛教文献和

西夏社会文书。先后拍摄照片数万幅，包括文献十多万面。

中方与俄方合作整理、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得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处和中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的热情支持，通过此次合作，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友谊。



俄藏黑水城文献

已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分为三大板块：第1至第6册为汉文部分，其中包括北宋刻本《吕观文进庄子义》《广韵》、宋人笔记《新雕文酒清话》、术数类的占卜书《六十四卦图》《六壬课秘诀》、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孙真人千金方》《南华真经》，西夏文写本《杂字》、刻本和活字本历书，以及宋朝西北边境军事文书、各种官私社会文书，以及其他唐、五代、宋、齐、元代文献。第7至第14册为西夏文世俗典籍，包括《音同》《文海宝韵》《五音切韵》《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法》《法则》《贞观玉镜统》《官阶封号表》《历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碎金》《圣立义海》诗集《新集锦合道理》《孝经传》《论语全解》《孟子传》《十二国》《新集慈孝传》《德事要文》《德行集》《孙子兵法三注》《六韬》等大量西夏文社会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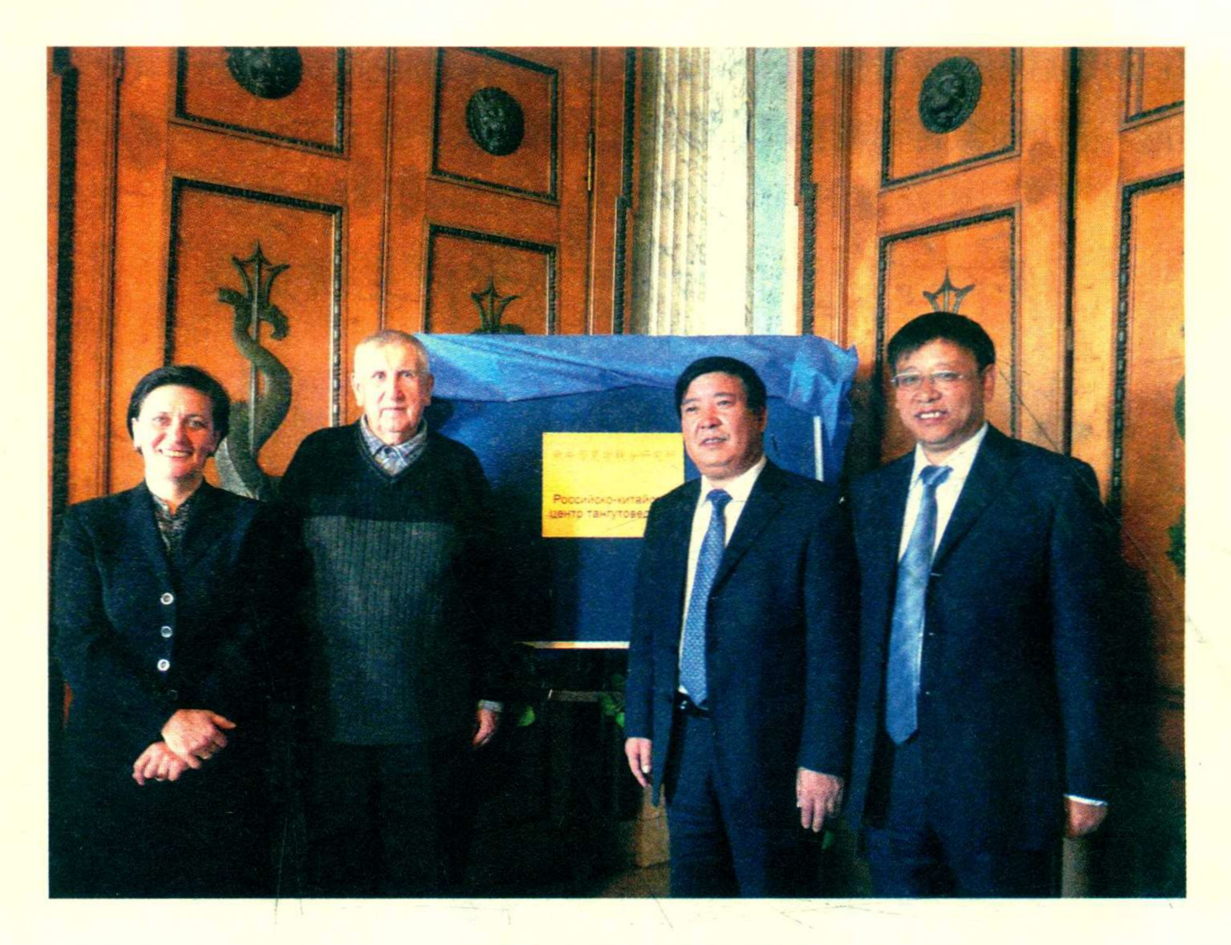
第15册以后为西夏文佛经，如《大宝积经》《佛说阿弥陀经》《中有身要论》等大量藏传佛教经典，最后还有回鹘文、藏文等文献。

第二节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成立

西夏在中国，大量的西夏文献收藏在俄罗斯，整理、研究这部分珍贵资料成为中俄两国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在1972年1月，国务院周总理在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西夏文献时，曾关切地问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在，懂西夏文字的有多少人？王冶秋局长回答：只有两三位老人了。周总理马上明确指示：一定要有人学习、研究这种文字，决不能让它失传。时隔37年后，西夏学由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2009年4月，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务委员刘延东的亲切关怀下，“西夏文化研究”被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确定为中俄“语言年”活动项目。按照项目要求，2010年6月2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签订“成立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协议”。

2010年10月17日，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宁夏大学揭牌成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长杜建录共同揭牌。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著名学者史金波、陈育宁、克恰诺夫等出席揭牌仪式。2011年9月21日，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揭牌，宁夏大学校长何建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俄方所长波波娃共同揭牌。

2011年，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的指导下，制定了《中俄人文合作交流机制下研究机构——宁夏大学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长期（2012—2020）规划》。按照该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四：一是联合开展西夏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二是联合开展俄藏西夏



俄中西夏联合所在圣彼得堡揭牌

文文献的整理编目；三是联合开展俄藏黑水城西夏艺术品和实物资料数字化研究；四是互派访问学者，通过国家西部留学项目，带着课题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访问研究。

在成立联合研究机构的同时，两国学者通过协商，围绕黑水城文献与西夏社会研究、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保护、俄罗斯西夏学论著汉译、中国西夏学论著俄译等领域，设计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研究课题，使两国新时期西夏学合作研究从协商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一批西夏学中青年骨干赴俄罗斯访问研究。短短几年时间，双方围绕西夏法律文献、社会文书、佛教经典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出版《〈天盛律令〉研究》《西夏佛典探微》《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中国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释录》等著作。

在2016年12月10日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成果出版座谈会在银川举

行，冷僻的西夏学聚集了一批热心学术的学者，难认的西夏文吸引了众多攻坚克难的专家，曾被称为“绝学”的西夏学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两国专家跨越万水千山携手完成了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有关部门为这批新书的面世召开了座谈会。参加此次会议的著名西夏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认为，《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堪称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制作，可以说是西夏学研究的“百科全书”。“这本书的出版，今后将极大方便西夏学专家学者查阅、使用，进而对书中收录的数千件文献作史学上的深层次研究。”史金波说。

杜建录说：“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整理编撰，前后历时七年，包括农政文书、钱粮文书、律令与诉讼文书等九卷14册，共收录4000余件文书。”

著名西夏学专家、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陈育宁教授说，“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的成立让中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形成了合作实体，且双方专家学者围绕黑水城文献开展了专题性研究，完成了多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在以前很难实现。”

“俄罗斯学者非常重视西夏学研究，我所在研究所收藏了一些西夏学文献资料，这也成为中俄双方合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但目前来说还是中国学者参与联合研究更多，希望以后双方合作更加紧密，更多俄罗斯西夏学学者参与其中。”波波娃说。

座谈会上，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陈育宁、波波娃、杜建录、程妮娜、李进增等专家和教育部国际司的有关负责人对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成立以来的科研成果给予充分肯定，称这种国际学术合作是个成功的范例，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的西夏学研究，已经从收集整理、影印出版文献资料拓展到多学科研究，而且其研究也已不限于文献资料，也不限于俄藏资料，西夏

学学者的视野更是不断拓宽。现在，西夏学不仅成为宁夏大学最具优势的学科，也成为宁夏大学最有影响的学术品牌。

第三节　来自黑水城故地对俄罗斯的访问

为推动居延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建立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机制，争取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保护、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2014年，阿拉善盟委、行署经过认真调研，专门成立了俄藏黑水城文物访问工作小组，抽调阿盟文化、文物和档案等方面的专业骨干，先后访问了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冬宫博物馆、科兹洛夫博物馆等相关文物收藏馆所以及文化机构，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拍摄、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此次活动开创了阿拉善流失海外文物访问的先例，同时也是百年来，阿拉善文化工作者第一次目睹黑水城文物的真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主要收藏机构之一，所长波波娃女士接待了访问团一行。会谈中她表示非常愿意与我们建立多方位的研究交流关系，并准备了一部分相关资料赠送给访问团。

这里珍藏着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有许多是佛像、唐卡等佛教艺术品，精美绝伦。访问团认真了解该馆收藏黑水城文物的情况，对展出的文物一一拍摄，留取资料，为后续研究、复制、展示和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

访问团进一步详细了解了科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活动情况及对黑水城文物的处置情况，并与馆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进一步搜集掌握了科兹洛夫黑水城挖掘活动的重要实证和补充资料，为后续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通过沟通交流和走访参观，访问团结识了一批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专家，建立了友谊，为后续开展具体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访问过程中，

东方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贝拉克列尼茨基先生、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女士、科兹诺夫博物馆的管理员奥列格·费拉基米罗维奇先生等一些汉学家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诚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黑水城文物均有非常专业的研究，在相关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都希望在黑水城文物保护研究和交流方面能够相互协作，建立友谊。访问团邀请他们到阿拉善开展学术交流，对方欣然接受，这为我们开展后续的合作提供了重要人力支撑，建立起合作机制。

黑水故地俄藏黑水城访问团主要成果：

此次访问活动是一次阿拉善盟流失文物追索文化破冰之旅和文化交流之旅。通过多方位的接触和深入的交流，打破了双方间历史所形成的复杂文化心结，为后续的合作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对俄藏黑水城文物各方面的情况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这次访问工作的成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进行了交流座谈，达成了多方位的合作意向。会谈时，俄方对阿拉善盟的访问非常重视，交流中安排有五位汉学方面的专家参加，认真细致地回答了访问团提出的问题，并愉快地接受了我方的合作建议和邀请，提供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拟定了合作协议。

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主要收藏机构， 在俄罗斯近百家东方问题研究机构中，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无疑是其中的领袖。东方学研究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协调各机构间的科研活动，以推动俄罗斯的东方学研究的发展。目前，东方学研究所正在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方学的研究网络，以便能够更有效地交换学术信息。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罗斯汉学研究基地，以其珍贵的馆藏文献和文物闻名于世，是俄藏黑水城文献收藏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有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获取的文献约15万页以上，8000多个编号，是中国宋、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及其他民族文献的写



阿拉善赴俄访问团与俄方交流

本和刻本，其中以西夏文文献居多。所长波波娃女士在会谈中表示，非常愿意与黑水故地建立多方位的研究交流的关系，并准备了一部分相关资料赠送给访问团。访问团参观了东方文献研究所的陈列室，对俄方在东方文献的搜集、研究和保护等方面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并进入文献档案库房，参观了珍藏着标有8000多个编号的黑水城文献。波波娃女士为访问团一一介绍了展柜内展示出来的包括部分黑城文献在内的许多珍贵东方文献，访问团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俄藏黑水城文物，经俄方允许访问团对展出文物逐一认真拍摄，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目前，阿拉善正式报请自治区文化厅等相关部门，为正式签订阿拉善博物馆与东方研究所和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协议做准备。经沟通已基本确定了协议内容，包括就黑水城文物资源的保护、研究进行合作，具体包括建立目录数据库、合作出版、人员互访、国际研讨等许多方面。

二是访问了科兹洛夫博物馆，进一步详细了解了科兹洛夫在黑水城

的活动情况及对黑水城文物的处置情况，并与馆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科兹洛夫博物馆是科兹洛夫的故居，里面大大小小套着八九间房子，每个屋子都摆满了科兹洛夫在中国西部探险和考察的用品和获得的实物与资料，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管理员尤里听说是来自黑水故地访问团，非常高兴，他说这次访问是近百年来来自出土地访问该馆的第一批人员。

管理员向为访问团介绍了每一个房间的藏品，并拿出了几件不轻易示人的藏品向我们展示，还把自己珍藏的一些珍贵资料和书籍热情相赠。访问团对展出文献文物认真拍摄，详细记录，为后续研究工作做重要前期准备。

三是通过沟通交流和走访参观，访问团结识了一批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专家，建立了友谊，为后续开展具体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础。访问过程中，东方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贝拉克列尼茨基先生、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女士、科兹洛夫博物馆的管理员尤里先生等一些汉学家都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诚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黑水城文物均有非常专业的研究，



阿盟访问团与俄方合影

在相关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都希望在黑水城文物保护研究和交流方面能够相互协作，建立友谊。访问团邀请他们到阿拉善开展学术交流，对方欣然接受，这为后续的合作提供了重要人力支撑。

通过这些学者和机构的努力，黑水城文物再次穿越历史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逐渐深化着人们对黑水城及其历史的认识，拓展着人们对于西夏王国、丝绸之路，乃至东方与世界文化的观察视野。

在与俄方会谈时，波波娃详细介绍了文献研究所和俄罗斯在黑水城文献及西夏学方面研究的成果，并向来自文物出土地的阿拉善的同行赠送了俄方黑水城古籍文献研究专著。双方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和成果分享等方面达成共识，就下一步双方合作进行了探讨。

第三章　黑水城出土文献文物

第一节　俄藏黑水城文献文物

一、俄藏黑水城文献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回鹘文等文种，其中以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大，多达8000余种，约15万面，占目前已出土西夏文献的80%以上，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90%以上，包括佛经、辞书、字书、法律、类书、诗歌、谚语、医书、日历、译自汉文的儒经兵书以及3000余件借贷、买卖、租赁、雇佣契约和军抄、户籍、赋税、站赤文书，是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于和西夏王朝同时的宋、辽、金、元社会历史的“无价之宝”。俄藏黑水城文物有绘画（唐卡、版画、绢帛画）、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等。上述文献文物分别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冬宫博物馆。

（一）西夏文佛教文献

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绝大多数是佛教文献，这其中以西夏文佛教文献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已可确定其佛经名称的总共400多种，有数千卷、册。西夏文佛经有的译自汉文佛经，有的译自藏文佛经，佛教经典包括了佛典中的经、律、论三藏，也有西夏人编撰的佛教著述，形成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其刊印时代下延至元、明。黑水城遗书中俄藏西夏文佛经多完整，且一种佛经有数种版本。目前可定名的有80多种，亦同俄藏佛经属一类。以下仅就黑水城遗书中西夏文佛经刻本和写本有

年代可考者列举如下：

西夏文刻本有：大安十一年（1085年）《佛说阿弥陀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大乘圣无量寿经》，贞观六年（1106年）《维摩诘所说经》，人庆二年（1145年）《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天盛元年（1149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顶尊胜相总持功能依经录》，天盛四年（1152年）《佛说父母恩重经》，天盛十七年（1165年）《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天盛十九年（1167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经》，天盛二十年（1168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乾祐四年（1173年）《达摩大师观心本母》，乾祐十五年（1184年）《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乾祐十九年（1188年）《西壁国师劝世集》《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乾祐二十年（1189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夏仁宗时期《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天庆三年（1196年）《大蜜咒受持经》。西夏文写本有天盛四年（1152年）《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天盛五年（1153年）《大般若波罗蜜经》，天盛八年（1156年）《无垢净光总持咒言》，天盛十八年（1166年）《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天盛二十年（1168年）《佛说父母恩重经》，乾祐四年（1173年）《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守护经》《佛说生来经》，乾祐十七年（1186年）《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经》，天庆二年（1195年）《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天庆三年（1196年）《大般若波罗蜜经》，天庆四年（1197年）《发菩提心顺及常作法事注》，天庆十二年（1205年）《忍教搜颂》，应天三年（1208年）《菩提心及常作法事》，光定元年（1211年）《瑜伽师地本母》，光定四年（1214年）《金光明最胜王经》，光定五年（1215年）《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光定七年（1217年）《菩萨业记》。

《大方广佛华严经》 译自汉文，为八十卷本华严，见《大正大藏经》第279号，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第258—888页。题款汉译

为“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夏仁宗）御校”。又有“天生全能番禄圣佑国正太后梁氏”“天生全能番禄法仪国正太后梁氏”题款，说明该经至迟在惠宗朝（1068—1086）梁太后1085年去世之前译成，在仁宗朝又重新校勘。卷首有说法图一幅，各卷经题之下有类似汉文文献大藏经中的千字文编号。现存有西夏刻本、元代刻本多种，又有泥活字、木活字本以及大量写本[①]。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据同名汉译本翻译，共600卷。此经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400卷，第二部分401~600卷。西夏文有好几个译本，前400卷保存完整的有第1、3、4—10、13、15—20、30、31、33、38、39、46、48、61—63、65—67、69、70、124—128、130、155、158、160、321、323、327、329、330、333—337、340、351、352、355—357、359—362、365、367、389—391、399卷，共65卷。第二部分保存完整的有第402、403、407、410—413、420、422、423、432、434、441、443、445、447卷。天生全能禄番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和功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写本，折本装。蓝布封皮，有的封皮上贴有标签和标记，有的标记是用黄色直接写在封皮上，而不是贴上去的。为该经某些卷捐助钱财发愿抄写经文的发愿者有内宫侍者、僧人、德者、长寿者等。第8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大藏经》第220号；西田龙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059号，格林斯坦德《西夏文佛经》第16—229、1240—1256页；第9号《大般若波罗蜜经》是一组小开本的写本书籍，折本装，写成于1153年，经文中还提到1152年和1156年。抄写该经目是发愿者为悼念死去的母亲。题记中还提到几个随喜发愿者和抄经者的名字。

《大悲心陀罗尼经》　据同名汉译本翻译，其内容较接近伽梵达摩所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但是大为

①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减省，而且有差别。段玉泉副研究员大致构拟出其汉译文[①]。

《圣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陀罗尼经，译者周慧海，成文时间不晚于仁宗大庆二年。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口褒利沙门周慧海奉敕译。此经多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其一合刻本刊于天盛元年（1149年），后附仁宗皇帝施经发愿文。亦有将此经之陀罗尼部分单独析出传经者。黑水城文献中又存此经同源、同题之汉译本及藏文本残卷[②]。

《金刚乘十四种根犯堕》 简称《金刚乘根》《金刚乘根犯根堕》或《十四种根犯堕》，马鸣菩萨造。据藏文译出，译者不详。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八种麄重犯堕》，其解说中言："礼因礼缘，故马鸣造十四根、八粗重，依禅定本续中略开演触犯仪轨。"原文为写本，多与他种"犯堕"文献合抄。旧分为四种文献著录，实为同一文献。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多蜜多心经》 刻本，折本装，全文留存。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奉敕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详定。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存德慧所译的同名汉译本，有"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发愿题记，一般据此判断为据梵文本所译。然西夏文发愿文则言"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圣佛母般若心经》与梵、羌本仔细校译番、汉本"[③]。每页8行，每行16个字。此经是仁孝皇帝为纪念他去世的母亲而刻印2万册，散施民众，希望他母亲在西方净土世界里超生。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陀罗尼经，译者周慧海，成文时间不晚于仁宗大庆二年（1141年）。多本经题后存传译者题款，汉译作"西天大般弥怛五明国师功德司正口褒乃将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口褒檄利沙门周慧海奉敕译。"此经多与《胜相顶尊

---

①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②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③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其一合刻本刊于天盛元年（1149年），后附仁宗皇帝施经发愿文，亦有将此经之陀罗尼经部分单独出传抄者[1]。

《大宝积经》　由汉文译成，见《大正大藏经》第310号，西田龙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70号，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第1730—1913页。写本，折本装。每页基本上是7行，每行21个字。浓墨线沟栏。蓝布封皮上有白色回纹图案的标签，上面写有经文名称和卷号。秉常皇帝及其母梁母皇太后御译。

《大般涅槃经》　写本，贝叶经。墨线勾栏。每页31行，每行13个字。正反两面书写，正面右处角处写有标记和页码。引人注目的是这组经文就抄写与发现地——黑水城，发愿者为当地的军人。现存第1—10、23—35、37—74、76—98、103—106、111—115、117—122、125—128页，页面正面右边角处写有标记和页码。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西夏特藏第194号，残。规格尺寸不大，说明该经是为信奉者日常诵读方便的口袋书。该经文比较容易辨认，因为基本内容都是描绘佛像及其名号。佛像是刻印在经书页面上的，或是一排，或是两排，呈水平状将页面对等分成两半。页面空白处（即原来的页面黏合处）标明有经文名称缩写、卷号和页码。此经属写本，折本装，无正文内容。

（二）汉文佛教文献

俄藏黑水城遗书中西夏时期的汉文刻本和写本佛经约在240种以上，有明确西夏纪年的达27种；宋刻本佛经约30种，其中有宋刻纪年的5种；金刻本数种；还有一部分是元朝刻本和写本，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佛经版本流传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如黑水城汉文佛经有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这些西夏新译的汉文佛经包括《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圣大乘圣意菩萨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

---

①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222页。

录》等。根据这些佛经的序、跋及发愿文可知，它们都是西夏仁宗皇帝在位期间（1139—1193年）西夏译师根据“梵本”翻译，并大量刻印、流通的西夏新译佛经。由于现存汉文《大藏经》找不到与这几部佛经对应的本子，苏联汉学家孟列夫难辨真伪，故将其中的几部列为疑伪经。据研究，除《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外，它们均能在藏文《大藏经》中均找到。显然，它们不仅不是伪经，而且是极为珍贵的西夏译汉文本。此外，黑水城汉文文书中的藏传密教仪轨抄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①]。尚存纪年题款的近30种，其刻本佛经依年代顺次为：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年）《夹颂心经》，大安十年（1084年）《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大庆三年（1142年）《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注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十三年（1161年）《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天盛十九年（1167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乾祐十五年（1184年）《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佛说圣大乘三皈依经》和《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乾祐十六年（1185年）《六字大明王功德略》，乾祐二十年（1189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天庆二年（1195年）《佛说转女身经》，天庆七年（1200年）《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皇建元年（1210年）《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光定八年（1218年）写本《赞佛称赞慈尊》等。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也不乏珍本，如《新雕文酒清话》，存5—9卷。该书为南北朝到唐五代、北宋初期趣闻轶事汇编，刊行时间大约在公元1085年至1180年的90年间，中原内地早已散佚。《吕馆文进庄子义》，宋蜀刻本，蝴蝶装，存109页，刊于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

①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或以后，早已散佚，目前存金刻本，可与黑水城出土宋本对堪。

《大宝积经》，据唐菩提流志同名汉译本翻译，存译经题款，汉译“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教德国主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名御译”；一本又存仁孝皇帝校经题款，译文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或“奉天显道”。故知此经至迟在惠宗（1068—1086年）朝梁太后1085年去世之前译成，在仁宗朝又重新校勘。汉文原本共120卷，西夏文译本可拼配完整。各卷经题下有类似汉文千字文的函号，每十卷共一函号。

几种最流行的汉文佛经，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华严经》和《妙法莲华经》等的刻印本的数量就已经接近100种。此外，还有约60种是其他普通的汉文佛经的残本。这几种文书之刻印本的数量的总和已达200种之多。虽然这200种文书同样具有价值，因为它们或是某种汉文文献大藏经稀有刻本的残本，但是，这上述200种文书以外的黑水城佛教文书对于揭露西夏王国佛教传统之真实面貌更有价值，它们是我们重构西夏王国佛教历史的最基本资料。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的组成表明藏传佛教文献是整个黑水城佛教文献中的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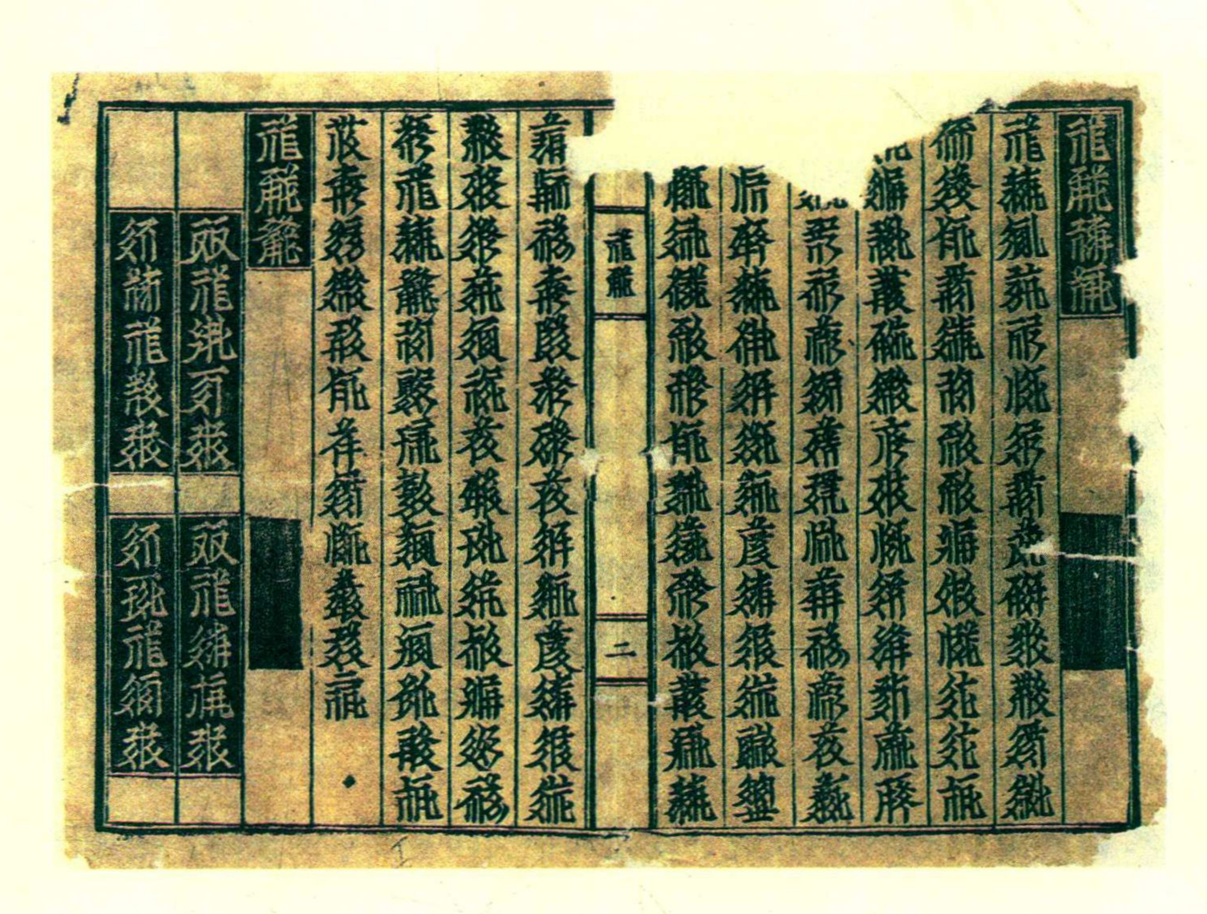
此外，《论语》《礼记》《新唐书》《汉书》《广韵》《一切经音义》《杂字》《孙真人千金方》也都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

（三）西夏文世俗文献

西夏为了发展民族文化，规范和扩大西夏文字的使用，编纂出版了多种类型的字书、辞书和韵书，流传下来的有《文海》《音同》《音同文海宝韵合编》《音同文海杂抄》《五音切韵》《义同》《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等。流传至今的西夏世俗文献还有法律、诗歌、谚语、类书、译自汉文的典籍以及大量的社会文书，它们是西夏文文献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为西夏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文海宝韵》　正名《大白上国文海宝韵》，简称《文海》，是西夏文字的形、音、义字典。西夏学者罗瑞智忠等编篡，成书于惠宗天赐礼

盛国庆四年（1072年），刊印于崇宗正德二年（1128年）。它将汉文《广韵》和《说文解字》的特点熔铸一炉，体例新颖，前所未有。1983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合著的《文海研究》出版，对《文海》作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集《文海》校勘本、汉译本和影印本为一体，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文海》初的专著，也是第一部黑水城文书研究的专著。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难能可贵的，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同音》

《同音》 又译作《音同》，是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同音字典。成书于西夏早期，后经多次整理校勘，为刻字司刊印。今见最早为崇宗正德六年（1132年）义长的整理本，还有西夏著名学者梁德养的修订本，是研究西夏语言体系，构拟西夏文字音的重要资料。《同音》一再修改、

校勘、重印，今见“至少有五种版本”[①]，说明此书的社会需求量较大。在某版“序”中称，这本书是“依音立字，语及句成，乃世间大宝”，为“传行世间，劝民使学”的重要字典。1986年，李范文《同音研究》出版，对该书语音系统做了研究，并给每个注音、释义；同时，给五千七百九十个字用四角号码编码，颇便于检索查找，起到了字典的作用。

《同义》 又译作《义同》，或《义同一类》。仁宗乾祐十九年（1188年）和尚梁勤宝撰、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德养校定，是以本大型同义字典，也是类似汉文《尔雅》的重要典籍。全书总三十篇。每篇集同义字、近义字、相关字为组，每组七言，间有八言，保存了五千五百九十个完整的西夏字。从内容上讲，所收文字有佛神鬼怪、皇帝后妃、城郭宫室、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树木花草、宗族姓氏、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社会杂项等近六千个词语，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对研究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天文地理、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等，都有重要意义。

《番汉合时掌中珠》 简称《掌中珠》。全书三十七页，蝴蝶装，版框高23、宽15.5厘米。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成书于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这是一本在西夏时期广为流传的番汉文字对照的词语汇集，也是汉人学习西夏文，西夏人学习汉文的启蒙读物。骨勒茂才在序中写道，番汉文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通过学习，使“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以利互相沟通，可起到和番汉之众的作用。

《掌中珠》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以天、地、人三才分类，每类三品，总和九篇；前八篇为有关天文地理、八山四海、时令气象、动物植物、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的各种事物的词汇；最后一篇则收录一个人从出生直至去世的有关语句，多以四字一读，浑然成趣。如阴阳和合，得成人身，学习文业，仁义忠信；孝顺父母，六亲和合；学习圣典，立身行道；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八万四千，演说法门，菩提涅槃，六趣轮回等。该书是党项人骨勒茂才在1190年编写的，骨勒茂才

---

①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西夏文史论丛》(1),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对汉族语言文字和西夏语言文字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编写的这部书是西夏文与汉文音义互相对照的语汇辞典。每个词语都有并列的四项内容，中间的两项是西夏文和它的汉译文，最右边的汉字是左边西夏文的注音、最左边的西夏文是右边汉文的注音。这种西夏文与汉字的注音解意互相对照的字典，既是党项人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汉人学习西夏语的工具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部书出土时保存有37页，1000多字，它对后来解释西夏文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掌中珠》在编排上颇具特色，每一词汇并列四项，中间二项为相对应的番字和汉字，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番字和汉字，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番字和汉字的译音字。在黑水城发现的众多西夏文献中，这是唯一有汉字标音释义的辞书。学术界由此始知千余字的意义和读音，也是解读西夏语音和宋代西北方音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被称为“一把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它还是“中国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辞典”，在中国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①]。

《三才杂字》 简称《杂字》。这是一本分类识字的启蒙读物，有多种刻本和写本，用当时社会上常用词语编辑而成，总共一千多词语，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飞禽走兽、蔬菜水果、生活器皿等，甚至番汉姓氏、亲属称谓的名称都有。该书“序言”强调此书是为村夫乡人所写：“彼村邑乡人，春时种田，夏时力锄，秋时收割，冬时行驿，四季皆不闲，又岂暇学多文深义，愚怜悯此等，略为要方，乃作杂字三章。”为了便于记读，以两字一组的格式编排，四字的词也要从中



黑水城出土番汉合时掌中珠

①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间断开。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简称《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令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制定的。总二十卷，卷下分门，每门又分若干条，共一百五十门，一千四百六十三条法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王朝编纂并实施了的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军事法等，内容十分丰富，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资料，对研究中国法制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文《天盛律令》

《法则》　为西夏晚期法典的重要代表，是继《天盛律令》之后重要补充法典，很多内容为《天盛律令》所无。此法典翻译了西夏晚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卷六所载有关西夏军抄的合并与拆分；卷九记

①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载的西夏职官职掌、监察制度、基层乡里制度等问题均为目前的西夏史料所不载。《法则》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方性，代表了西夏晚期的法律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法典的重要代表，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亥年新法》 西夏文做《新法》《亥年新法》，手抄本，保存内容丰富，现存内容丰富，现存10卷，42个编号，286页，多为册页装，亦有卷子装等其他装帧方式。因《亥年新法》原卷为草书抄本，字迹较难辨认且页面破损，前后错乱较多，故此法典尚未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释读与研究。

《贞观玉镜将》 又译作《贞观玉镜统》《贞观玉镜鉴》。“贞观”为年号，“玉镜”有“明镜”之意，比喻政治清明，将意为“将兵法”，书名可理解为“贞观圣明的将兵法”。编纂于西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4年)，由刻字司刊印。全书分“政令”“赏功”“罚罪”和“进胜”四篇，前有序言。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西夏的军事思想、统兵体制、赏罚办法等，是研究西夏兵制、军法的珍贵文献，也是我国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第一部军事法典，在我国军史研究、兵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圣立义海》 是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书之一。全书五集，十五卷，分为一百一十二类，约六万言。“圣立”有“钦定”之意，刻本，蝴蝶装，有多种版本。其中一本为乾祐十三年（1182年）“刻字司重新刻印”，今存第一、三、四、十三、十四、十五共六卷，其中前三卷为残叶，后三卷较为完整。《圣立义海》是以天、地、人三才为纲，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为指导思想，结合天、地自然现象和夏国风土人情修撰的一部百科式全书。文体采用格言形式，多为四言，通俗易懂，富有韵味，内容丰富。从保存完整的一百四十二类名称，可知其大致情况。如保存较完好的第十三卷类目为立人、圣人、仁人、智人、君子、众人、清人、军人、愚人、仆人；第十四卷类目为父母育爱子、童子孝顺、孝顺吉祥、兄弟、叔侄、外公等；第十五卷类目为婚姻、美男、智媳、丑

媳、亲朋、贫富等。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一书，对全书作了汉译和研究，并附全文影印件。认为该书“对研究西夏天文地理、伦理道德、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①。

《月月乐诗》 是一首著名的西夏文诗歌，此前只有日本和俄国学者的翻译。《月月乐诗》的形式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除了偶尔出现的“对仗”句以外，每句的字数一般都不固定，而且通篇不用韵，全诗除“引子”外分为十二章，依正月至腊月的顺序，每章简要叙述一个月的物候和人事。《月月乐诗》在体例上实际上是用两种既相近又不相同的语言写成的，日本的学者西田龙雄指出，诗的每一章都由两段组成，两段诗所表达的内容基本一样，但使用的词却是大异，好像是一个人用一种语言“唱”了一遍，另一个人又用另一种语言“和”了一遍②。这种特殊的体例在中国诗歌史上极其少见。

《新集锦合辞》 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养德初编，乾祐十八年（1187年）切韵博士王仁持增补刊印。总计三百六十四条，每条谚语成对组合。所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天文、地理、农牧业、宗教信仰、习俗等，是了解和认识党项民族文化、人文面貌等各方面最鲜活的资料。

《类林》 十卷，刻本，蝴蝶装，刊于仁宗乾祐十二年（1181年），《类林》属于私家类书，唐代于立政编纂，全书收录五百多条古人故事，是将古书中古人的故事“重新编写后再转述出来”，编纂成书，汉文原本在金代已经失传。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一书，刊布全部影印件，并收集有关资料，对原本《类林》作了复原③。

《论语全解》 刊本，蝴蝶装，东汉郑玄集成，共二十篇，后世有多种注释本。西夏文本译自宋陈道祥《论语全解》，西夏人自注，为刻

①[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前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日]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6年。

③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字司刻本。《论语全解》的正文，在品名、品数、内容、顺序等方面与汉文本相同，是汉文的忠实译本，但在分章用词方面略有不同。

《孟子》 共十四卷。原有十一篇，后存七篇。后人有多种注本，西夏文本有的有注释，有的则无，有的与汉文本某注相同，有的又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夏文《孟子》是《孟子》的新版本"，从中可以了解西夏的思想观念，有益于研究西夏的社会状况"[①]。

《孝经》 此为汉文"孝经"的译本，有吕惠卿所写前言和注释，写本，斜体字，间有草书，蝴蝶装，保存良好。

《孙子兵法三注》 三卷，附于《史记·孙子传》。全书共十三篇。所谓三注，是指宋代流传，而今已失传的曹操、李筌和杜牧的三人注本。存《军争篇》第七、《九变篇》第八、《行军篇》第九、《地形篇》第十、《九地篇》第十一、《用间篇》第十三与《孙子》本传。西夏文译本的重要价值，在于保存了宋代已经失传的三家注本。孙子的著作为历代军事家所推崇，对我国军事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书之一。草书西夏文，地契正文十一行，立约人和中人的署名、花押八行，总十九行。行款格式与汉文文契相类。内容为天盛十二年（1170年），寡妇耶和氏宝引等，有闲置土地二十二亩，在地界内有"茅舍三间，树两株，情愿让与耶和女人，圆满议定地价为全齿骆驼二，双峰骆驼一，代步骆驼一，共四匹。""若我等反悔，当依法领罪。有不服者告官罚麦三十斛，决不食言。"此外，还写明闲置地四界所属人氏。立约人除耶和氏宝引外，还有二子附署：中人有四人署名画押。黄振华先生翻译并著文研究这一文书。文后附恭楷抄件，认为"这是迄今所见反映西夏土地关系唯一文书"。契文表明牧地私有，可以自由转让，官府保护土地买卖者不

①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受干涉，违法者罚。由此可见西夏实行土地私有[1]。

《乾定二年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1971年克恰诺夫《黑水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英文），发表在《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4卷第2期上，并刊布了原件。1978年，黄振华先生在《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中[2]，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指出克译诸多错误，并根据已刊布原件进行了汉译。该《禀帖》是守将仁勇于乾定二年（1224年）向上级请求调动工作的报告。黑水守城管勾持银牌赐都平官走马婆年仁勇，原籍鸣沙乡人氏（今宁夏中宁鸣沙乡），因离家多年，七十七岁老母病重，请求"遣往老母近处司（院）任大小职事，当尽心供职"。文中还称原籍司院"不准调运鸣沙窖粮，边远之人，贫而无靠，唯恃食禄各一緡"，"今食粮将断"，此类请调报告的《禀帖》是西夏文献中仅有一件。《禀帖》保存完整，写得文从字顺，内容比较丰富。根据这一《禀帖》，确定了如今的黑水城遗址，就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的"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同时说明作为西夏军事重镇的黑水城，这里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光定卯年（1220年）腊月雇工契》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3]。单页契约，写本，西夏文草书15行。首行有"光定卯年腊月五日"年款，后有契约署名、画押[4]。此件契约包括立契时间、立契人（雇工）、雇主、雇佣时间、工价、雇工要求，违约和反悔处罚，以及立契人和证人的签名和画押，具有完整的契约形式。立契时间是西夏光定卯年，光定是西夏神宗年号，知立契时间距西夏灭亡仅有8年时间。立契雇工时间共9个月，囊括春、夏、秋3个季度，从春种的准备时期到秋收完毕。雇

---

①黄振华:《西夏文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6页。

②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第642页—647页。

③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第349页。

④《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4册,第94页。

工契的立契者是党项人，雇主和两位证人也是党项人，反映出部分党项族经过两个世纪，已经成为可以雇佣的、可以从事农业的农民。

《卖油帐》 俄藏黑水城文书[①]。系汉文、西夏文合璧，十分少见，属稀缺文书。该文书为写本，麻纸，残，开始有汉文2行，后有西夏文草书19行，有画押，有勾勒[②]。在第13、14行记："二十五日曹十月犬一升油 三斗杂"。名为曹十月犬的买1升油，后面的"三斗杂"是否为给付的价钱，很难断定。如果1升油价值3斗杂粮，油粮的价格比显得过高。卖油者这样详细的记账表明当时卖普通商品的管理很细致，商业运行比较规范。

《监军司粮帐》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③]。监军司粮帐为经书封套中的残页，都是断片。残粮帐中都有"监军司""京师"字样，看来这些粮帐和军事有关。残文书分条记载，各条中开始的一行，顶格有西夏文"一溜"二字，每溜为一单位，可能是黑水监军司以军溜为单位从当地黑水城向京师（中兴府，即现在的银川市）运送粮食的有关记录。残粮帐中有较大的粮食数目，有的为几百石，有的上千石。这些粮账虽残损严重，无一行完整，且草书字迹模糊，但从已见的账目仍可了解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耕地水税帐》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④]。此件文书因残缺，与背面文字笔画相叠混，有的字錾难译出，但关于耕地和水税尚能识别。文书记录了3处耕地的水税账，每处第一行都有"往处"二字。文书记录西夏耕地有用撒多少种子来计量，在种子粮食后写"撒处"二字表示，都表示有撒多少石种子耕地。此件文书是反映西夏水税的重要资料。

《贷粮押畜契》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书[⑤]，是一单页契约，写本，麻

---

①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3月。

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4册,第52页。

③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3月。

④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3月。

⑤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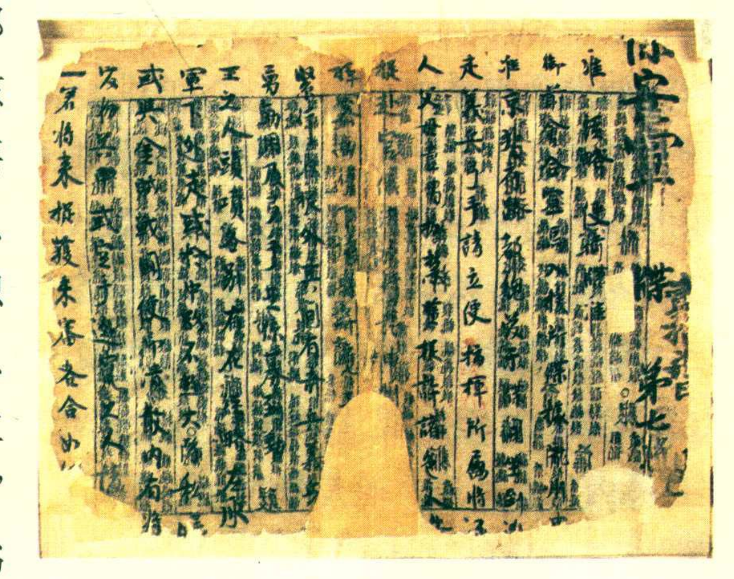
纸，护封衬纸，存西夏文草书11行。上部残，首行有“末年腊月二十九日”年款，第一字存半字，应是年号的第二字，据其所遗下部与西夏年号第二字对照分析，很可能是（盛），这样此年号很可能是（天盛）。西夏天盛年间有两个未年。一是天盛辛未三年（1151年），一是天盛葵未十五年（1163年）。契约末有署名、画押[1]。

贷粮押畜契与单纯的贷粮契比较，相同的是都要有利息。贷粮契到期要收回本利粮食，但若到期收不回本利，则要罚粮；如果贷粮者当时真的拿不出粮食，罚粮也难以交出。而贷粮押畜契不同于单纯的贷粮契，因为贷粮押畜契在立契约时，就已经由贷粮者抵押了牲畜或其他物品，若到时借贷者不能还付，则可以契约规定的抵押物偿还借贷主人，这种有抵押的借贷对借贷主人届时收回本息有了切实的保障。

（四）汉文世俗文献

黑水城汉文献时间跨度较大，包括唐、五代、宋、西夏、伪齐、金、元（含北元），其中元代数量最多，其次是西夏、宋，对研究宋夏金元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宋代西北军政文书》　公文纸背文献，计 109 页，背为西夏文文献，主要是两宋之际陕西鄜延路第七将公文，反映了该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机构，如宋金延安府之战、北宋为应对西夏入侵而组织成立的“策应环庆路军马”、为救援都城开封之围而成立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以及为施行宋高宗即位赦书



黑水城出土宋代西北军政文书

---

①《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3册，第161页。

而进行的招收溃散兵员等，均系传统史籍记载较简略者。该文书对研究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重要事件、公吏制度、军事制度、司法诉讼、社会风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 白麻纸书写，两件，内容相互连贯，拼合成高20厘米，宽41厘米的纸片。光定十三年（1223年）距西夏灭亡只有四年时间，也是夏神宗遵顼在位的最后一年，这年十二月神宗遵顼自称太上皇，传位于太子德旺。当时夏金十年争战还没有结束，二月西夏联兵蒙古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数月后又发兵陇安军，“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而去”。“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正是这场残酷战争的真实写照。呈状人的“千户”一职在其他夏、汉文献没有出现过，值得重视。“千户”本是女真“猛安谋克”制下的一种军职，一般“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浦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千户之上有万户、副统、都统、提控。有时“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呈状反映出西夏后期在金朝的影响下，也设置了“千户”一职。当然，也有可能是金朝的“千户”，被西夏俘获或主动投奔西夏后，继续任“千户”一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发现与考释。呈状详细开列了杀掳的人数与姓名，呈状中的人名均旁注西夏文，这在以前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不多见，反映了夏金边界地区蕃汉杂居以及西夏文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西夏乾祐五年验伤单》 为西夏文刻本经折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232封套裱纸，麻纸书写。记录乾祐五年三月某日医人康按验“自鼻内见有血迹，验是拳手伤，无妨”，“验已，后稍有不同，依条承受”。“验伤单”是审判机关判案的重要证据，马虎不得，负责勘验的医人必须对它负法律责任。因此，文书的一开头就写明医人姓名，然后才是被伤害人姓名、受伤害时间以及伤势情况。接下来是对该验伤结果的解释，如果有异议，“当依条承受”，即按有关规定向有关机构申诉。

最后署上验伤的日期。前述受伤人“自鼻内见有血迹，验是拳手伤”，非凶器所伤，验证的结论是对身体无妨。西夏法典对各类伤害案件的判处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对如何按验伤势却没有具体规定。“乾祐五年验伤单”就弥足珍贵了，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夏的审判制度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资料。

《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　西夏文佛经《种咒孔雀明王经》封套裱纸。内容比较完整，有立文字时间、借贷人、放贷人、贷钱数额、期限、利息以及到期还不上的处罚，最后是立文字人（借贷人）与同立文字人（担保人）签名画押。值得重视的是放贷的“本”是“课钱”，课钱即封建国家赋税，是国库重要收入。用国库中的钱放贷，说明这是一件官府借贷文书。史载西夏借贷有官、私两种，但此前所见到的文契都是民间或寺院借贷，这件官府放贷文契自然非常珍贵了。契约末尾的当事人和担保人签字画押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契约正式生效。文契第一个签名的是立文字人，即借贷人王受，然后是同立文字人，也即担保人小受、周遇僧等。小受可能是王受的儿子。

《西夏光定十二年正月李春狗等扑买饼房契》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俄藏编号ДX18993，没有定名。中俄两国联合整理出版《俄藏敦煌文献》时，将该文书收在俄藏敦煌文献，图版见《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七册①，后经专家考证，属于黑水城出土②。该文书最大亮点是“扑买”，“扑买”是我国古代一种承包经营方式，唐代后期开始出现，北宋时得到普遍推广，不仅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实行，而且扩大到西北沿边，尤其重要的是，宋代扑买是政府经济行为，而西夏光定十二年正月李春狗等于王元受处“扑到面北烧饼房”则是民间经济行为。虽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第一七册，第三一〇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2001年。

②杜建录：《西夏光定十二年正月李春狗等扑买饼房契考释》，《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然李春狗的“扑”，只是王元受将“烧饼房”包给出价较高的李春狗，和宋政府的竞标扑卖有较大的区别，但李春狗“扑到面北烧饼房”一事，在西夏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中看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与经济关系的一些变化。

《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 包括材植账、漫土账、胶泥土账以及材料发运处给“材植至处”的照会、有关机构给库司的呈领状等，文书提到“般驮塑匠胶”，说明胶泥土是用来泥塑的。建筑内有泥塑像，不是寺院就是庙学，这些建材由“脚户”或“脚家”送纳前去。脚家或脚户，即赶脚的人或人户，五代宋元史均有记载，有的称脚户，有的称车脚户，有的称脚人。文书中的姓氏有孙、傅、崔、王、杨、李、贺、梁、田、白、孟等，反映了当时从事长途运输主要是汉族。文书中有孙猪狗、白伴狗、李猪儿等姓名，以猪狗等动物为名是西夏姓名的一大特点。

《西夏榷场文书》 12件，西夏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封套裱纸，《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其分为呈状、收税文书、收薑椒绢文书、確场文书等类型。日本学者佐藤贵保则分为榷场文书与呈状文书两大类。实际上它们均为榷场文书，只是出于裱糊的需要，将文书剪裁成片段，有的是前半段，有的是后半段，有的是中间部分。令人遗憾的是裱糊匠人还将文书上下各裁去一部分，因此没有一件文书能拼合完整。但我们通过前后文关系，还是能看出其大概。榷场文书多次出现镇夷郡与西凉府。郡为秦汉以来普遍设置的地方机构，相当于州一级，下辖县，有时是州县，有时是郡县。一般情况下县级名称不变，而州郡名称互换，如灵州与灵武郡，夏州与朔方郡，泾州与安定郡，凉州与武威郡，甘州与张掖郡，肃州与酒泉郡，等等。西夏立国后承袭前代，在地方上设州置郡，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1]。这条资料出自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由于该书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往往为史家所诟病，研究者不

---

①《西夏书事》卷一二。

敢确认西夏设郡。黑水城西夏榷场文书明确记载镇夷郡，为西夏在地方设郡找到了确凿证据，其意义不言自明。

二、俄藏黑水城文物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是黑水城文物的收藏地，这座昔日沙皇皇宫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设计，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洛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初建于1754—1762年，1837年被大火焚毁，1838—1839年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遭到破坏，战后修复。这是一座三层楼房，长约230米，宽140米，高22米，呈封闭式长方形，占地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最初冬宫共有1050个房间，117个阶梯，1886扇门，1945个窗户，飞檐总长近2公里。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但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则严格统一。1917年2月前，冬宫一直是沙皇的宫殿，后来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占据。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起义群众攻下了冬宫。十月革命后，1922年成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艾尔米塔什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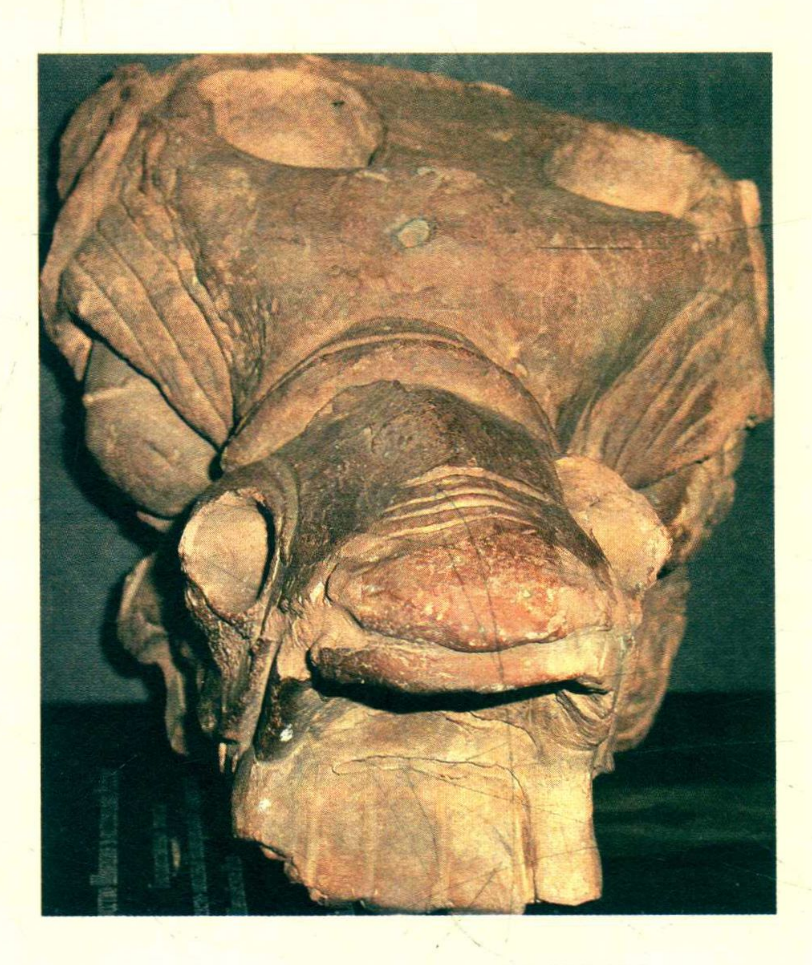
冬宫博物馆有专门的黑水城收藏品室陈列馆，负责黑水城文物保管、整理、陈列的萨玛修克博士，在《丝路上消失得王国》一书中写道："东宫博物馆之黑水城出土收藏品一共包括了3500件文物，其中约200件为绘于丝、麻、纸张及木桩上的绘画作品，或壁画。一半以上的作品是完整无缺的，其余则为断片。此外，还有20件版画和素描。大部分的版画以及经文为东方研究所收藏。科兹洛夫带回70尊泥雕、木雕和铜制的作品，还有一些织品、纸币和硬币。另有3000件的物品，包含一些陶、瓷器的碎片，约为元朝时期所制作的铜、铁或木制的家庭用具及日常用品。"① 《西夏艺术史》的作者之一汤晓芳1999年应东宫博物馆之

①［俄］萨玛修克《黑水城的发现》，见"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译小组编《丝路上消失得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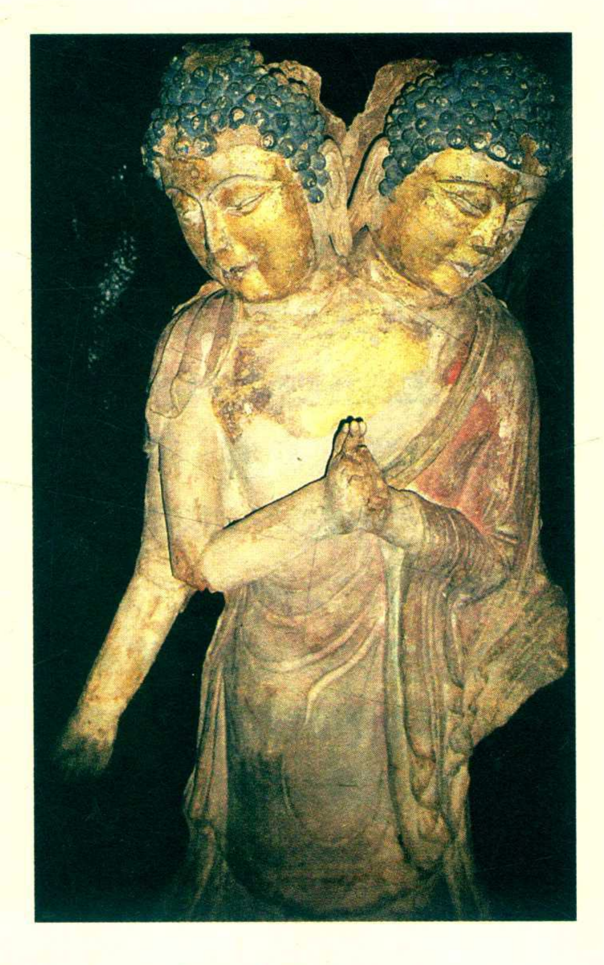
邀去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考察时，见到西夏展馆中展出的完整的绘画作品50来幅，泥塑作品20余尊，还有一些残件和残片被放置在库房的抽屉里。东方研究所收藏的主要是文献，其中有不少版画插图。

冬宫博物馆所收藏的黑水城出土文物，可以让人深入了解中古时代中国、西藏和中亚的艺术，并且洞悉西夏文化是如何兴起、成型及其特点。这些收藏品本身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现存保存的古物中，其保存状况几乎无可比拟，并且因为它为图像、风格和文化史的研究开启了全新的邻域。这里对部分文物介绍如下：

陶质鸱吻 龙首行，陶质胎形，象征避除灾难，鼻翼宽大，上颌突出上曲，眼睛凸出，眉粗且向下弯，双耳竖起，内空，较完整。这种建筑构件曾在北部佛寺遗址中出土过。圆形，表面施绿色琉璃釉，正面饰兽面纹，面部狰狞凶猛，眉弓粗壮，双目圆睁，两腮极度夸张，鼻孔硕大，颧骨突起，造型独特。



俄藏黑水城出土陶质鸱吻(建筑构件)


俄黑水城出土双头佛

双头佛　泥彩塑，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彩塑。高62厘米，双头四臂，面相方颐饱满，发螺髻半圆形，有唐代造像特征。主臂双手合十，一臂残，另一臂自由下垂，发螺髻深蓝色，肉身描金，袒右臂和前胸，斜披红色袈裟，右肩搭袈裟一角，下着裙，服饰有唐五代造像特征。这是现有诸佛造像中，唯一的一尊佛分身艺术造型。

关于双头佛像的来历，唐代玄奘法师在西行印度取经途中，听到一个简单而美丽的故事：曾经有两个穷信徒，要求雕刻师为他们每人制作一尊佛像，但雕刻师认为他们付的钱只够定制一个。当他们拿到一个佛像后，就为了没能履行先前向佛陀许下的誓言而感到苦恼，此时，佛陀就运用神灵，将自己的雕像一分为二。在所有的宗教文化中，都有这类奇异的故事。此塑像镀金上彩，脸带微笑，显得生动，头部略微倾斜，整个轮廓极为优雅柔和，如今虽然镀金和色彩都已消退，但却永久展现创作者的理念。

佛头像　发蓝色，肉髻圆平，高准尖鼻，唇薄有须，细眉长目，眼睑下垂，作冥思状。面方颐饱满，两耳垂肩，须蓝色，五官清晰明朗，头顶有红色摩尼珠，是阿弥陀佛。对佛像气质的刻画具有阳刚之气。须髭的图案为日、月、云纹，有藏传佛教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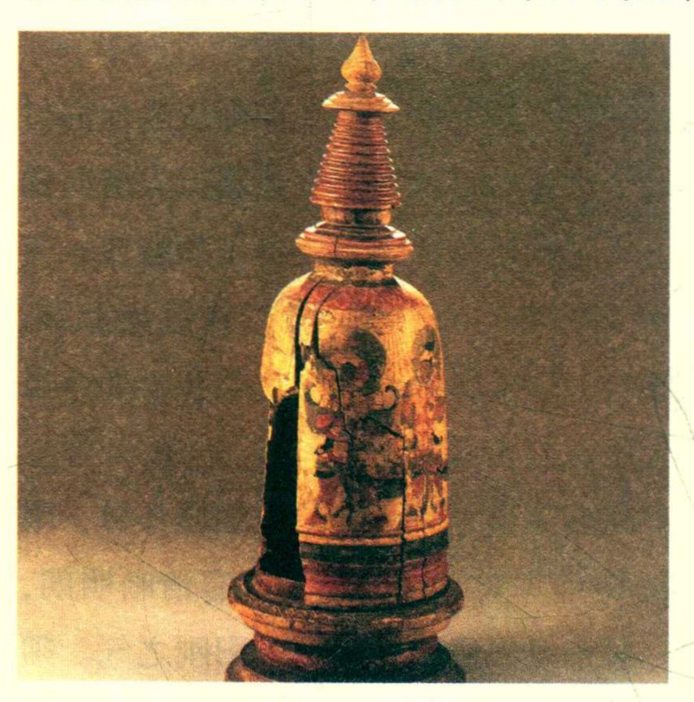
菩萨头像　鼻尖，嘴如弯月，嘴角起翘，下巴尖润，具有西域造像特征。

面相图 和中原“相面图”形制相同，西夏文草书标注，根据脸部各个特别的部位画成的，依序又根据五行、十二宫图、六天体或是五圣山等理论组成，代表出身名门（1、2、3、12、15）、高官（3、13、14）、长寿（2）；多子多孙（15、16）①。



俄藏黑水城出土面相图

舍利塔 木制，高度44厘米，用以放置遗骨，此形式可以追溯到佛教创立前的印度。舍利塔象征法身——即佛陀超脱世间的存在，亦是某些天神的传统持物，舍利塔被视为崇敬的对象，常常被描绘于唐卡中，或以木质、陶土制作。此特殊形状为典型的10至12世纪制作与东印度的舍利塔。画于此塔上的四大天王的图像，为典型黑水城出土的遗物所画之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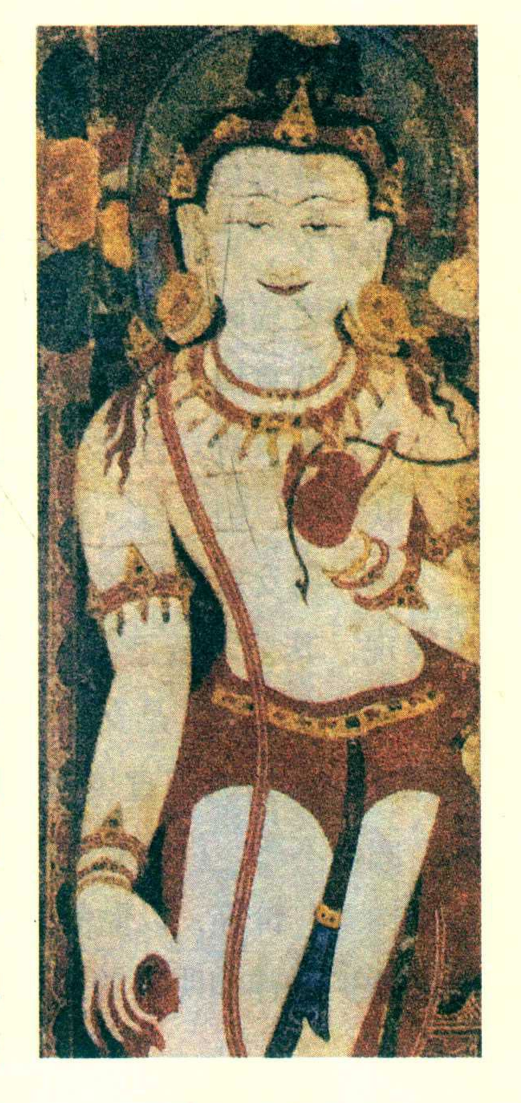
俄藏黑水城出土舍利塔

唐卡 唐卡，藏语音译，是指装裱成卷轴式的佛画，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学习经典和修行的工具之一，也是西藏绘画特有的形式。源自印度，是僧人传教所悬挂的绘画。通常将尊像绘于布帛或丝绢之上，装

①号码是指图上所标示的面相特征。

裱成轴，或挂于寺院殿堂、信众住所佛堂，或卷起由僧人带于身边，作布教时讲解教义的挂画。现存西夏唐卡，主要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佛塔有百余幅。唐卡表现题材广泛，包括佛、本尊、祖师，各种护法神像，曼陀罗等。其中表现释迦牟尼佛的唐卡有十余幅，其他佛的有如来佛、欢喜佛等。黑水城出土的代表性唐卡有：药师佛、盛乐轮威仪、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阿弥陀净土、十一面八臂观音图、金刚亥母、大黑天神等唐卡。

莲华手观音　11世纪末—12世纪初唐卡，棉质。此莲华手观音为上乘之作，OLdenburg认为此断片原为一大幅唐卡的左侧。主尊旁所残余的部分只有莲花瓣和深黑色衣服，是我们唯一用以猜测其身份的资料：深色衣服上有错综复杂的金色图案，衣长遮掩一膝。残存的断片本身是由几块碎片组成的。左上角缝着一块彩色莲花的布片，另有两块布缝在右上角和中央。缝补、磨损和残破不全的情形，或许正说明此件作品之年代久远，可能是12世纪前之作品。



黑水城出土莲华手观音

此尊菩萨是白色的，有一头、臂。是以正面所呈现，但却有一脚侧着。若他原本真的立于主尊右侧，那么此像乃黑水城出土文物中，唯一被画成正面的实例。右手下垂，所结手印不明，但左手持一白莲花花径，整幅像装饰华丽，身戴项链、耳环、手镯和长及过膝的璎珞。一条半透明的围巾，几乎横披胸部，置于左肩（参阅此书K.Samosyuk所撰的《西夏王国的艺术》一文）。此唐卡的简明十分迷人，尤其是他含笑的脸，躯干优雅的曲线，和典型风格的双手，是黑水城出土文物中最精致的收

藏之一。

绿度母　现藏冬宫博物馆圣彼得堡，绿度母端坐于一蓝色莲花上，左腿弯曲，呈自在游戏座的坐法，右腿下垂，过莲花座，踩着一莲花休憩，右臂向外伸展，姿势优美。左手持一蓝色莲花，与右侧所装饰的莲花相同，其头光及环绕的背光是白色的（可能是褪色所致），背光饰有双边，头光上有二个鹅，在中间有一个似狮的脸。宝珠垂挂于宝座周围，宝座在一莲花茎上，莲茎是由诸龙托住。诸山的表现技巧，与其他黑水城—西藏，或更精确地说，与印度—尼泊尔—西藏画派的唐卡相同。宝座上方有五如来，五如来之上有六棵树，共有三种不同类型，每一类有二棵。此唐卡的特征在于构图和线条优美，色彩清淡，技艺精巧，是黑水城出土文物中重要宝藏之一[①]。

黑水城唐卡人物造型的主要特点：

（1）佛陀造型特殊，形成西夏风格。头大，面部轮廓向下收缩，五官集中，脖颈短，螺髻高尖，尖顶上有红色摩尼宝珠，双眉犍陀罗袒前胸着通肩衣、裹衣博带、裸露较少的形象不同，与印度陀罗佛像脸作椭圆形、螺髻扁圆形也有不同。面部造型五官比例特殊与中原和印度风格略异，是西夏唐卡中佛造型的一个特色。

（2）唐卡有女性佛。佛母等女性佛形象红色身，长獠牙，发向上竖起，肤色蓝、白、红、黄等，是唐卡艺术在人物造型上的另一大特色。

（3）男女双身佛的图像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创造，在西夏唐卡中有突出表现。其艺术造型的特点是：裸体、宽肩、细腰、丰臀、臂长、腿长、突出性，尤其是女性造型突出丰乳，为印度湿婆艺术形象的传承和再创造。人物造型直接受印度密宗人物造像影响；面相愤怒，多目多臂，威而不恶，以粗犷的造型表现雄浑、刚硬；手持器物种种，有金刚杵、钩刀、铃等，以骷髅为冠，蛇为璎珞，脚踩魔，以复杂的佩饰及装饰衬托护法神和明王的威猛、神秘、奇幻；男性人物面圆、眼鼓俯视，

---

①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译小组《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140页。

目光有神，四肢肌肉坚硬，有的呈火焰状红色头发向上直竖，表现粗壮、结实、深沉、强悍；女性细腰，姿势优美同舞姿，有很强的律动感，将丑与美、狰狞与平和的对立通过男女的结合而达到高度统一，以生动的形象表现直率；用色红蓝白黄，色彩冷暖对比度强，设色厚重，浓丽不俗，以热烈的深色调表现人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人物线条勾勒粗细均匀，平涂色彩无立体感。

(4) 菩萨形象趋于印度风格。菩萨裸上身和大腿，用串珠等代替衣饰，肩宽腰细，肢体呈S形，脸部表情及头饰等外型更趋向印度风格。

(5) 唐卡中的天王、护法、本尊人物面部轮廓圆形，臂、腿粗壮，形象威武、怪诞、狰狞、有威慑力，与中原同类人物的武士装、帛带飞扬的威严平和相不同。

由于藏密直接由印度传入，印度的艺术对密藏艺术直接产生影响，因此在藏密中得到传承。西夏唐卡藏密人物造型既不完全同于印度佛教人物造型风格，也不同于中原的传统，而是具有藏传佛教传播地区民族人物特征的形象，同时融入了印度人物画、中原人物画的造型、线描、装饰等绘画元素，主要原因是密教在7世纪从印度直接传入吐蕃的时候，吸收了不少吐蕃原始信仰本教文化的艺术成分，在塑造崇拜偶像时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注入了本土民族风格而创造了新的艺术形象。据《贤者喜宴》（成书于1564年）记载，在8世纪中叶叶桑耶寺度母殿[①]建成后要塑佛像，当雕塑工匠手拿颜料钵问赞普，佛像按印度风格还是汉地风格雕塑时，来自印度的莲花生大师“正如佛出印度一样，当然按照印度风格绘画”。而墀松德赞赞普说：“我希望按藏族风格绘诸佛菩萨。”于是召集藏民百姓，以俊美男子鞠·悉诺察卜为模特塑造了卡萨巴尼观音菩萨像；挑选漂亮的女子交绕·布琼为模特儿塑造魔利支天；以美貌女子交绕·拉布美为模特塑造度母像；以塔桑·悉诺列为模特塑造了圣度母像；以梅·叶哥为模特儿塑造了护法神马头明王像[②]。这段史料说

① 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第2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第2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明，藏传绘画艺术有其固有的传统，其佛教人物的艺术造型是以藏人为模特创造，粗犷、厚敦、脸部圆形、精神饱满，目光热情有神，四肢肌肉坚硬有力，身躯雄健，体现了雪域高原人体造型特点的藏式风格。与印度尼泊尔造像的柔和、冥想式目光不同，与汉式脸型方颐饱满，以宽袖大袍遮体也有区别。

（6）出现上师人物艺术造像。

在11—12世纪印度波罗王朝统治时期，从金刚乘中又分出俱生乘、易生乘，提倡崇拜导师，在佛教偶像崇拜中出现了上师崇拜。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吐蕃王室后裔在阿里地区建立的古格王朝，藏传佛教唐卡中也频频出现上师形象，在佛、主尊为主要画面的唐卡中，上师作为眷属进入礼佛的行列。在西夏的唐卡中有以上师为主尊的画像出现，这与西夏晚期皇帝崇尚藏传佛教，高僧地位特殊，有上师、国师、帝师有关。明清时期的一些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曾有零星记载。

据《贤者喜宴》记载，西夏仁宗（1140—1193年）曾遣使到西藏粗朴寺迎请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00—1193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虽然未成行，但遣弟子格西藏波瓦前往西夏，被仁宗尊为上师。据《萨伽世系史》记载，扎把坚赞任萨迦派教主时，他的弟子觉本应邀担任了西夏国师。《红史》记载，应西夏邀请，蔡巴噶举创始人向蔡巴（1122—1193年）的著名弟子热巴和多巴雍苏萨哇分别担任了西夏的帝师和国师。

卷轴画 又称“行轴”，在五代以后逐步兴起，成为中国绘画的一种主要形式。卷轴画灵活多变的形式，很快被西夏所接受和流行。在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中，已发布的87幅绘画作品中有14幅是非常精美的卷轴画。在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中，内容基本都是宗教内容的绘画作品，以佛、菩萨、天王为题材的宗教人物画。每一幅作品以佛、菩萨为主要人物，配以星宿、天人等，因此有些宗教画不仅是宗教宣传品，同

时又具有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代表作有阿弥陀佛来迎、普贤菩萨图、文殊菩萨图、大势至菩萨图、观音菩萨图、水月观音图、毗沙门天王图等。

俄藏黑水城出土戴冠佛　现卷轴画现藏冬宫博物馆，佛陀立于一朵红莲花上，仪态如僧人，周围围绕有椭圆形的光圈。头戴一个镶有宝石的三面冠。内穿底部镶有金边的绿袍，外披红斗篷于左肩上，从右肩垂下。右臂垂于胸前，左手手持斗篷于胸前。手张开，手上持一硬币，上有文字，自右向左读，有三个象形字仍可读出：天元通，第四个字“寶”则被抹掉[1]。红底上饰以彩虹条饰和散落的花，再往下则有白色尖端的红色形状，此可做种种解释，或许是山川、海浪或云朵；底部是有花朵样的蓝绿色布料。

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星宿神》[2]　此卷轴的中尊，是帜盛光佛，纳夫斯基译作“光辉灿烂的佛”（1960，第一册）。此尊红色，双手交叠于周围布列星宿神，上色明亮，人物形象相对完整。帜盛光佛发螺髻，髻前绘出红色摩尼珠，面相方圆，颈绘三道，衣，外披袒右着袈裟，左肩浅色披帛下垂至膝间，结珈趺坐于宝座上。背光周围的祥云中有黄道十二宫和天人两组，是印度二十八星宿，着汉宫廷装，每组14人。佛座前方和两侧站立11个星宿神，以土星和佛连接成中轴线，画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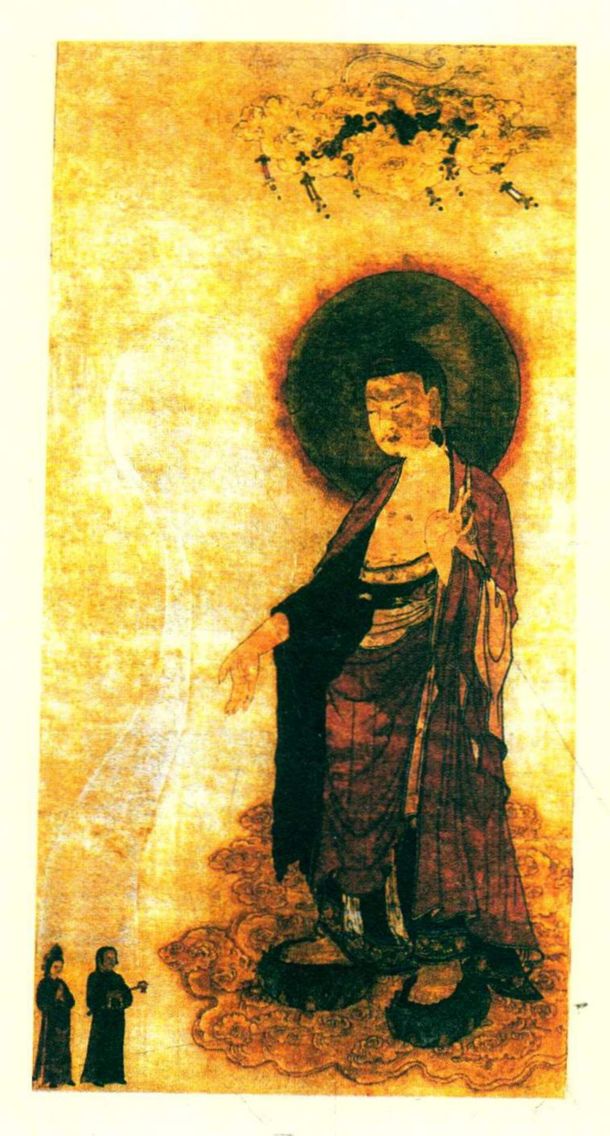


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星宿神》

---

①北京故宫的馆长杨新最早向我指出硬币上的铭文中的第一象形文字应是“天”。

②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译小组：《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228页。


俄藏黑水城出土阿弥陀佛接引图

物线条圆润，平涂色彩浓郁，缺少律动感，有中原人物画特征。但星宿神中有4位女性人物——月星、水星、金星、月孛，两颊涂椭圆形胭脂，突出了北方草原民族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妇女脸部化妆的特点。《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亡我祁连山，使人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自匈奴时起，北方草原民族及河西走廊一带的妇女有用胭脂抹脸化妆的习俗，后来也影响到其他地区。

阿弥陀佛接引图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经》称，在阿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以黄金铺路，天上飘着美丽的花朵，众生有非凡的智慧，住在鲜花绿水环绕的宫殿内，没有人间的苦恼和艰辛，人人都是幸福的。西夏人已经将西藏和中国的成分融合起来，发展出他们自己对同一主题的解释和画法。阿弥陀佛自天上或云朵往下俯视，一直看到下界，即卷轴底部。画中的男祈愿者或施主，会由于它的尺寸，而觉得被提升到天界，或更靠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立像又称"接引佛"，能接应众生往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与大势至和观音为西方三圣，其面部造型均为男性，有须髭。阿弥陀佛的造型：胸前有吉祥符号，面相方圆，有八字短须，袒胸，内着长裙或通肩重衣，外披袈裟或覆肩袈裟，双脚各踩一朵莲花。在背景处理上，有的阿弥陀佛头顶有华盖，有的绘出西方极乐世界宫殿建筑、自鸣乐器、鲜花等的庄严美妙。佛、菩萨乘莲而至，因此净土宗

又称“莲宗”。阿弥陀佛为主的佛画数量可观，可见西夏佛教净土信仰有广泛性。

以菩萨像为主的卷轴画 阿弥陀的信仰与观音信仰有密切的关联。观音菩萨自7世纪开始独受崇拜，许多见于祈愿文上。著此信仰，《妙法莲华经》传布更广，观音信仰也流传于西夏王国中。由于佛道离人间太远，而菩萨是通向佛道的中介，离世俗近些，保护一般人脱离苦难，每在人们遭遇不幸时提供帮助。故菩萨作为单独礼拜的对象，反映了民间对菩萨单身菩萨像中有普贤、文殊、大势至、观音，尤其是密宗菩萨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水月观音等题材十分丰富。在中国佛教的造像中，菩萨是辅助弘扬佛法的，更接近世俗，因此菩萨的造像世俗化、女性化，形姿丰富多彩。常见在释迦牟尼身旁的有文殊、普贤，在阿弥陀身旁的有观世音、大势至。西夏卷轴佛画中有以菩萨为主题的作品，这是西夏卷轴画的一个明显特点。

大势至菩萨图 观音像中间有一木刻本尊，并有侍从和二位女施主伴随，头戴镶有宝瓶的花冠，类同西夏妇女头饰“步摇”。右手持书，红绿披帛于胸前打结，画面顶端一朵祥云有盛开的鲜花组成华盖。人物形象富丽优雅，尤其是菩萨金身，工笔细腻，线条繁多圆润，裙边卷曲装饰细腻，着色平涂和晕染相结合，色彩艳丽。此幅作品和谐的色彩令人印象深刻，由其上铭文，可得知此画是中国白氏家族的一位富家妇女，以及来自高氏家族的一位新娘委托制作的。可以假设：这是一位婆婆及其媳妇为了婚事并祈求观音赐子而委托绘



俄藏黑水城出土大势至菩萨图

制的图画[1]。

水月观音图[2]　西夏卷轴画中刻画观音形象的作品有十余幅，其中《水月观音图》，颇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观音头戴化佛冠，面相方圆，裸上身，戴项圈、胸挂璎珞，下着白裙，红绿披巾缠身，坐于岩山一平台，细眉长目视水中之月。观音背后左侧有净瓶、柳枝，象征将甘露遍洒人间；右侧有山石和竹子，水边莲花牡丹盛开。坐前水面上有一朵祥云，一带黑冠老者身穿绿底团花炮，手持烧香供养，身后站一小侍。画面右上角一祥云上站一穿红衣小孩，秃发四角有小鬏 。观音对岸有一组党项族丧葬歌舞人物，向观音献歌舞，最前面身穿绿衣者脸朝观音，后垂两小辫，展上肢在跳舞；其身后一穿红衣者，秃发额前发分二缕垂于脸左右，做拍掌姿势，有二人伴奏，一旁站立二马，马后立一旗幡，地面有堆土。画面提供了党项族丧葬风俗的图像资料。观音的平静与歌舞者的节拍舞姿，形成动静结合之势，背景中的竹石、牡丹、莲花，既高雅清静又显富贵荣华。山石用皴擦笔法，体现岩石的阴阳立面，着色晕染，色彩有层次感。这是一幅十分珍贵的风俗卷轴画，保留了党项族的民情风俗，也体现了西夏绘画的水平，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俄藏黑水城出土十一面八臂观音图　《十一面八臂观音》，十一面观音为密宗六观音之一，是观音破“修罗道”三障之随缘化身。绘十一面象征能摧毁一切邪说、恶见，能灭一切恶事、痛苦，能显示种种身份来脱度众生苦难，其中有佛身，因此，藏传佛教还称之为“十一面佛”。十一面佛象征菩萨修完“十地”，达到十一地即佛地。为美化观音的功德品行圆满，绘出如此图像：观音垒头五层，自下往上一至三层各三面；正面慈相，分别代表释迦世界的能寂佛、安乐世界的无碍光佛 、袈裟幢世界的金刚坚固欢喜佛，表征菩萨见到善众时从大慈中生起欢

---

①供养人祈福的大约内容是依据类似敦煌的观音像中之祈愿文：以男供养人或女供养人，以及新娘为主。详细参阅M.I.Rudova.vol.XXVII,1989.

②汤晓芳、陈育宁主编：《西夏艺术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喜、安乐；左边怒相，分别代表不退轮音极妙圆满红莲敷身佛、绝世世界的无碍光佛、袈裟幢世界的金刚坚固欢喜佛，表征菩萨见到善众时从大慈中生起的欢喜、安乐；左边怒相，分别代表不退轮音极妙圆满红莲敷身佛、绝尘世界的法幢佛、灯明世界的狮子佛，表示菩萨见到行恶众生时从大悲中生起的威严；右边露白牙的三面，分别代表不退轮音极妙圆满红莲敷身佛、绝尘世界的法幢佛、灯明世界的狮子佛，表示菩萨见到行恶众生时从大悲中生起的威严；右边露白牙的三面，分别代表庄严世界的一切神通慧光佛、镜轮世界的月觉佛、普贤世界的贤首佛，表征菩萨见到其正修学佛法的众生，生起的赞叹、劝进。第四层为护法。第五层为无量寿佛，表征此十一观音像所显现的佛的身份，为一切众生所显的说法相。此身十一面观音有八臂，主臂双手合十施印，其余六臂持莲花，宝瓶、弓箭、法轮等法器。

道教作品卷轴　在黑水城西夏遗址和宁夏宏佛塔各出土一幅《玄武大帝图》卷轴画。

玄武　天界分五宫，中宫是天宫所住，位于北极星中央，其他四宫在四方。北宫的主神是玄武，赤脚，头发松开，右手持剑，如此卷轴所示[1]。穿盔甲，其下为有披肩的黑色飘动斗篷，坐于岩石上，头部有光圈。左下角有一舆蛇交配的——北宫的象征。此细部另中尊得以确认。



俄藏黑水城出土玄武图

①Sancaituhui,III,I。

其他图像，系北宫主神的随从，左上方有男女半身像，下半部为滚动的雾所遮。男持旗帜，上有北斗星座。画于底部的一施主，正向玄武跪求来世的幸福。此施主相貌粗俗，狮子鼻刮光胡须。前额缠着一条红巾，从脑的头饰部分类似直板。穿长靴，著骑装，外衣之裙褶起来，显出其下的宽裤。腰系宽带，披肩围着双肩。与玄武有关的青铜护符上的饰物，是剑、北斗、蛇。这些饰物每一个都与驱邪除魔，或建一朝北房时祈神庇护有关。

勾勒粗细均匀，平涂色彩无立体感。

这是目前留存本土宗教道教天神人物玄武图像的最早作品，玄武大帝披发、手持剑、赤足、身着黑衣，坐在岩石上。其中黑水城出土的《玄武大帝图》中主要人物玄武居中，内着武士衣，外披黑色斗篷，帛带从肩垂下，随斗篷飘动的下摆向上飘起，显得形象高大；在右前方草地上有一男子手持文书下跪在草地，头扎巾身着武士衣，黄色披肩，右后有一男一女在云中，显露出半身形象，手持黑色旗，男子头上扎巾，衣着武官服，旗上标有北斗等星座，女子手持彩色卷筒样物，头上发髻插花，搭巾表示侍者身份的绘画元素。整幅画像人物色彩鲜艳，平涂着色，是用线描定稿。

黑水城地区出土西藏风格的唐卡 黑水城出土的西藏风格的唐卡，如果只将它们视为西藏文化的产物，或许有助于了解西藏中部的艺术传统如何形成，及其与尼泊尔、琶拉（750—1155年）和塞纳（12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王朝的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关系。如果将它们视为西夏的艺术品，它们可以证明：在佛教的传播上，西藏文化的影响促使西夏文化迅速成长，以及10世纪后金刚乘遍布中亚。在黑水城出土的收藏品中，带西藏风格的唐卡，其背景平涂蓝色或绿色，饰有花朵。在彩色曼陀罗中，代表世界的四方、上方和下方同时几何式低地投射在一个平面上。将山峰描绘成一系列几何圆形的画风，构图讲究对称，画作中不只画一个画像，而常是一群神，处在相同的背景中抑或在相同的坐垫或座位上。并且，有一条厚毯从座位垂下，常是红色，上有花卉图案和蓝色

饰边。同时在唐卡中的尊像，都画出正面，通常具有一般公认的西藏特征，如圆形或近似方形的脸，配上一宽且勾画优美的鼻子，但鼻子只画出鼻头和鼻孔。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黑水城出土的西藏风格的唐卡，其制作时期不会早于12世纪中叶，但一直制作至14世纪末。

不动明王　OLdenburg,S.F.,1914,NO.60,p.53三眼四臂的不动明王，立于一三角形上，此乃火的象征，其尖端置于莲花座上[①]。竖立的头发上戴着冠，冠上有阿弥陀佛像，另饰有蛇和头盖骨。戴卷蛇状的耳环，其手臂、腿、头部皆有蛇。披长围巾，戴着断头编成的项圈，由虎皮缠腰布。上右手持一结有二果实的树枝，而上左手持一三叉戟。下右手持一剑，而下左手持一头盖骨作的钵。火焰升于其背后。在此唐卡的四个角落，更有小型不动明王像，在图像上完全一致，除了他们只有二手，以及直接坐在莲花座上，没有三角形外。右手上，分别持有一绳，一剑，一刀或斧。唐卡的上部是五禅定佛，代表五方，构成宇宙的主要部分。底部有五持贡品的女舞者，以花布为背景[②]，贡品有花、炷香，灯、贝壳和果盘。背景是饰有大朵长茎芍菊花的织品。底部两角落各有一比丘，坐于桌前地毯上，其中一位手结无畏印。

俄藏黑水城出土金刚座上的佛陀[③]　此唐卡的主尊是黄色的佛陀，穿红袈裟，发髻顶上有一红色摩尼宝珠。斜披红色袈裟，他以结珈趺坐于莲花座上，眉间有白毫，右手结触地印，左手掌向上置于盘着的腿上，即结禅定印。有一金色金刚置于前。袈裟上以勾金线花卉纹饰宽丝带隔成许多长方块。左手掌和右脚有金轮。莲花座的背部为蓝底勾金线花卉纹；在上方，佛陀头部左右，有蓝色金翅鸟，持细长鼓。此唐卡，

①此不动明王具有地方性。现有文献中，未提及一脸、三眼、四臂，立于三角形上的不动明王，而且也没有类似于他右手所持的水果。

②她们可能是西夏的女神或空行母。空行母由印度教传入西藏密教的神话后，在金刚乘信徒的瑜加行中开始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被认为具有唤起修禅者的潜能的力量。密教含有五高级空行母，此五高级空行母和禅定佛一起象征阴阳。

③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译小组《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110页。

除佛陀外，另有二十九尊像。有佛、菩萨、护法、高僧，从上至下五横排组成方阵画面。整幅唐卡构图清晰，上部是金刚乘曼荼罗中最高级的神，而下部是上师与保护神。反映的宗教特点是将宗派祖师的形象绘在唐卡佛、菩萨的队列中，这是西夏唐卡艺术人物的一大特色，也是藏传佛教将宗师作为偶像来膜拜的早期画像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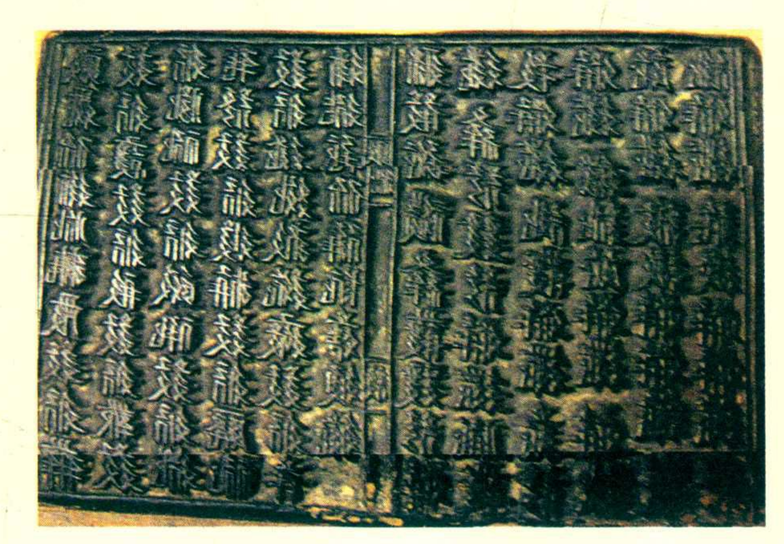
俄藏黑水城出土药师佛　药师佛身着鲜丽的朱砂红袈裟，此袈裟上有棕底勾金丝带状花卉纹饰将朱砂红袈裟区分成几个矩形区域。每个红底方块，以金线勾出象征佛物的八吉祥，和位于宇宙中央之须弥山宫殿等纹饰，这是僧衣的固定形式，根据早期印度佛教之戒律僧衣需用破旧布而缝制。

此画中药师佛的随从有39尊，主要的七佛位于画的上排其通常所在的位置，日光和月光菩萨分别立于药师佛的右边和左边。此二菩萨以其颜色、持物和中国传统里象征太阳和月亮的红轮和白轮来辨认。象征太阳的红轮上有一三足鸟，而象征月亮的白轮上有一玉兔，正在钵内持着长生不死药。根据金边黑帽高僧人物形象推测，此唐卡应是噶紨噶举派在西夏弘法的作品，最早是仁宗仁孝在位时期（1140—1193年）。画面中深色肤络腮胡子高僧（可能是印度高僧），其身后站一黑衣供养人，党项人服饰。佛座下横列有两排16身手持法器的供养天人，坐姿各异。此唐卡最显著的特征是极富装饰性：有耀眼的珠宝，以及红、白花苞的绿色嫩枝，填满神像四周的空白处。

俄藏黑水城出土大黑天神　《大黑天神》，大黑天即除障者，有三眼四臂。画面分为上、中、下三段布局，中间为一红色火光内置一大黑天神。皮肤蓝色，头发竖立，三面四臂，每个手臂执骷髅一蹲一展于莲花座上。两侧的上下左右四角布列四个各执法器的双臂大黑天神，置于燃烧的烈火中，其中有十位跳舞的空行母，中间五身供养天女各手持花、炷香、灯、果盘、骡，左右两黑地格内为冠山形帽的高僧，着白衣大袍，是噶举派高僧。

俄藏黑水城出土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　《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

罗密》，释迦牟尼脸稍微显得细长，身着袈裟，袈裟褶皱叠滑。双手结法轮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宝座由各种不同大小的长方形条板组成。两边有蓝色狮脸，具有荣耀貌容或胜利的意义。释迦牟尼佛的顶上有三个弧形的拱门，好像通往正面开着的佛塔。座前有一宝池，中间有一朵大莲花，莲花上升起金色的法轮，法轮上有红色火焰纹。画面描绘释迦牟尼在宫殿说法，参会人员有五方佛、菩萨、护法、供养人，还有密教高僧。唐卡中菩萨高髻，三角形饰件宝冠，除下身着短裙，其余部分赤露，形体宽肩细腰等特点显示，此唐卡的人物造型更多地受到藏西和克什米尔佛教艺术的影响。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雕版

西夏文木雕版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一般认为其发明年代不晚于公元7世纪初，该项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速度。西夏与两宋同时，正值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繁盛时期，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木雕版，内容均为西夏文佛经，西夏文木雕版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还在于雕版是印刷史研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实物例证。

黑水城地区出土木雕版　西夏木版画是绘在木板上的人物画。有两种，一种是作为随葬品置于墓穴内；另一种是黑水城出土的木版画，目前能见到完整的有两幅《佛顶尊胜曼陀罗》，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法物，尤其是在大法会时祈求神灵保护，诵经礼拜时必备的。




俄藏黑水城出土木雕版

黑水城地区出土版画　版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约在公元5世纪至7世纪。最早的版画是根据儒家经典制作的，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特藏部，其中汉文佛经版画插图大部分已收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至2000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至6册。目前能见到俄藏、中国藏西夏版画，汉文佛经中有25种30余幅经首版画，独幅和大型经首版画，西夏文献佛经中有18种27幅经首版画、独幅和大型经首版画约50余种，还有经内插图佛、菩萨、护法、高僧等人物尊像版画及佛塔、花草等装饰版画。黑水城出土的版画，除佛经插图外，还有十分精美的世俗人物版画。

官员和侍从　中间画一男子，坐在凳子上，其脸部四分之三朝向侧面，面无表情。头戴高帽，身着长袍，袖长而窄，腰系一带，脚穿黑色套鞋。帽饰以格式化的草木图案；绿色长袍有黑色圆形花样，或许是蜷缩的龙。一汉人立于其后，亦身穿长袍，双手紧抱胸前。长发梳成髻，长发及肩。眼半张半闭，宽鼻厚唇。这些相当特殊的面貌，在与面无表情的主人相对照下，显得突出。桌上有花瓶，瓶中插着盛开的芍菊，是地位显赫的象征。官员脚旁站着一鹿，鹿的头上系一铃——官位崇高的象征。又有象征财富的八宝，即珠宝、一串铜板和书本等。右上角有一棵松树，象征长寿。

俄藏释迦牟说法图　在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佛经中，释迦牟尼佛说法图放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无常经》《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等经首，属扉页插画，尤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丰富，其版本不同、插图也不同。目前能见到的约有五种不同人物布局的版画，刻画了释迦牟尼在不同地点、向不同人物说法的情景和场面。俄藏黑水城出土版画，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木刻本，经折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释迦牟尼在中间，双手结法轮印，版画描绘释迦牟尼早期初转法轮在王舍城郊灵鹫山向须菩提、舍卫国王布教的场景。人物造型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如佛的面相方颐、佛陀着棕色长袍，右肩坦露；菩萨头戴花冠、着宽袖仕女装；弟子光头着交领袈裟；护法神均身着甲胄武将装，其他人物宽衣大袖、交领袍服等。这是一幅受隋唐文人画影响，体现中国传统人物画技法比较成熟的一幅佛教版画。

《俄藏黑水城文献》及《中国藏西夏文献》中收集西夏时期刻印的经首版画汉文、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版本较多，每种版本的版画插图各异，其中说法图有特色的有5种。虽版本不同、版画作品不同，但人物形象及人物布局都受到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刚般若经引首版画的影响，都是中原传统风格的版画。西夏在散施《金刚经》时，插有如此繁多的版画作品，与西夏佛教禅宗的发展有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佛经般若类的主要经籍，魏晋南北朝时期般若类经籍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后秦鸠摩罗什译经达到高潮，隋唐形成禅宗类经典为理论基础。宋以后禅宗发展，手写、印刷及流通般若类经典成为社会风气，也影响到西夏社会，这也是西夏佛经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汉文、西夏文版本与版面作品繁多的一个因素。从各种版本不同的发愿文可以看出既有民间画刻，也有官方散施。

第二节 英藏黑水城文献文物

一、英藏黑水城文献

1914年5月，英国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结束敦煌沿线烽燧考察之后，取道玉门、酒泉、沿着额济纳河到达黑水城挖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他做得比较细致、规范，基本按出土地址标上号码。根据斯坦因对黑水城测图的标识可知，城内为K.K.I,其址在西墙内，又有K.K.III和K.K.II、和iii等处，K.K.II在西城墙外400米处，实际即是科兹洛夫发现的辉煌的塔遗址；K.K.III在城外东北角；K.K.IV在城西南角外；K.K.v在城外西北角外。斯坦因的功夫并未白下，各处都有些收获，但他没有科兹洛夫那样幸运，未能一下子掘出一座文物宝库来，所得文献多数是些残叶、残片，很少见成本成册的书籍。其中仍以辉煌的塔的所出最多。斯坦因记载道："我们把塔底部和寺院里面地下室所堆积的沙土仔细清除以后，发现很多西藏文和至今尚未能辨认的西夏文的佛教写本和刊本典籍。"还在"城中那些很大的垃圾堆中，也找出不少用汉文、西夏文、回鹘文以及突厥字字体书写、印制的各种残纸"。共计发现了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如同斯坦因各次探险的报告系列一样，一般都有一个简略的旅行记，一份详细的研究性质的报告，前两次中亚探险发表了《沙埋和阗废墟记 Sand-buride Ruins of Khotan.》和《古代和阗 Ancient Khotan.》《沙埋契丹废址记 Ruins of Desent Cathay.》和《丝绸之路 Serindin》，第三次中亚探险则是首先完成详尽的考古报告《亚洲腹地 Innermost Asia.》。在《亚洲腹地 Innermost Asia.》的第一册第十三章中，介绍了对黑水城记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情况。

斯坦因将1914年发掘的黑水城遗书按中亚探险获得资助的比例，分别交送给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其中的艺术品包括绢画、版画、木雕等归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1917—1922年发掘

的文献资料由斯坦因全部转交给大英博物馆，并委托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进行分类整理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分立，文献资料全部移交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一）汉文文献

包括汉文写本59本件、印本19件。1920年沙畹Edouard Chavannes著名的学生马斯伯乐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书中按照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黑水城顺序，对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部奠基性的成果。马斯伯乐对黑水城文献的介绍从473号到607号，473号是KK.VI.02.a号，为唐永泰二年（766年）六月出版，这是将其他地方文书混入黑水城文书，还是本身就是黑水城出土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英藏《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170）残状》，是迄今所见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中最早的一个西夏年号[①]。对判断西夏黑水城修建的起始年代十分重要。同时在这批文书中，年代最晚的为K.K0118.gii号文书[②]，为“奉至正三十年四月收麦领人麦”。至正三十年即年，是元顺帝脱欢帖睦儿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号的最后一年，这说明直至元末，虽然社会动荡，但黑水城地区仍有着正常的粮食收支活动。编号KK.II.0253.a和KK.II.0270.xx.i文献是契丹（辽）天庆十一年的15件典押文书。479号以下则是元代官私文书、四部书、日历，其中KK.II.0238.k《景德传灯録》和俄藏文献Φ.2299V同出于著名的辉煌舍利塔。英藏黑水城文献最受关注的是《西夏天庆年典当契》，20世纪80年代陈国灿先生考释复原，广为西夏学界参考引用。

（二）西夏文佛教文献

目前所知英藏西夏文献共4000多个编号，有的编号下附有多件残片，即总共有7300多件，也有少量汉文文书编入西夏文序列中。和俄藏

---

①郭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乐刊布的部分》，第145页。

②Henri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l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p.209.

黑水城文献一样，英藏还有为数可观的藏文、回鹘体蒙文文献。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有的译自汉文，有的译自藏文，有些已经无法找到汉文、藏文的原本，内容包括佛经经颂、佛经经疏、佛经科文、佛经论释、陀罗尼咒语以及各种佛经，现已考顶出的有《大方等大集经》《大般涅槃经》《佛名经》《金光明经》《般若波罗蜜多经》《种咒王荫大孔雀经》《妙法莲花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寒林经》《慈悲道场罪忏法》《维谟诘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养云总持咒》《阿含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本生经》《大宝积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密相法印赞庆》《华严经》《三身亥母记》《莲华冠及本续》《上义解说具》《佛说斋经》《圣广大宝楼阁善微王总持经》《最上护法神赞礼敬顺》《唐长国师光殿众人佛义二十五问答》《法念处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大密咒受持经》《顶尊相圣总持咒》《佛说父母恩重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咒》《菩提心及常可做法事》《吉祥勇识大虚空显颂》《大孔雀明王经》，等等。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简称《圆觉经》，该经为华严宗的重要经典之一，残存8行，上下单栏。经文正文部分满行12字。

《正法念处经》 残片，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讲述三界六道种种情况，宣扬随顺正法、舍恶修善以及报父、母、如来、法师四恩①。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有《正法念处经·观天品》汉文本残片②，法藏敦煌文献中有该经西夏文本卷六十七尾题③。英藏文献中发现的两件残片分别出自《正法念处经》卷十二与卷十八正文内容。

《发菩提心经论》 印本残片，原题佛经，共12品，分上下两卷。天亲菩萨造，后秦龟兹国三藏鸠摩罗什译。在已知的西夏佛经中尚未见

①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②束锡红:《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4页。

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有该经，英藏黑水城文献中这几件残片是西夏文本《发菩提心经论》的首次发现。

《方广大庄严经》 残片，唐地婆诃罗译，该经共十二卷二十七品，主要宣说佛降生、出家、成道、转法轮等八相[1]。该件残片仅残存2行共10字。

《佛说最上意陀罗尼经》 为印本残页。

《尊者圣妙吉祥之智慧觉增上总持》 刻本残页，正反面皆印，装帧方式不详，上缺，下双栏，残存部分每面4行，所存字数不多，有梵文、西夏文经题的下半部分。

《十二缘生祥瑞经》 残片，是以佛教的基本理论“十二因缘”断人吉凶，并非阐述深奥佛理，易为信众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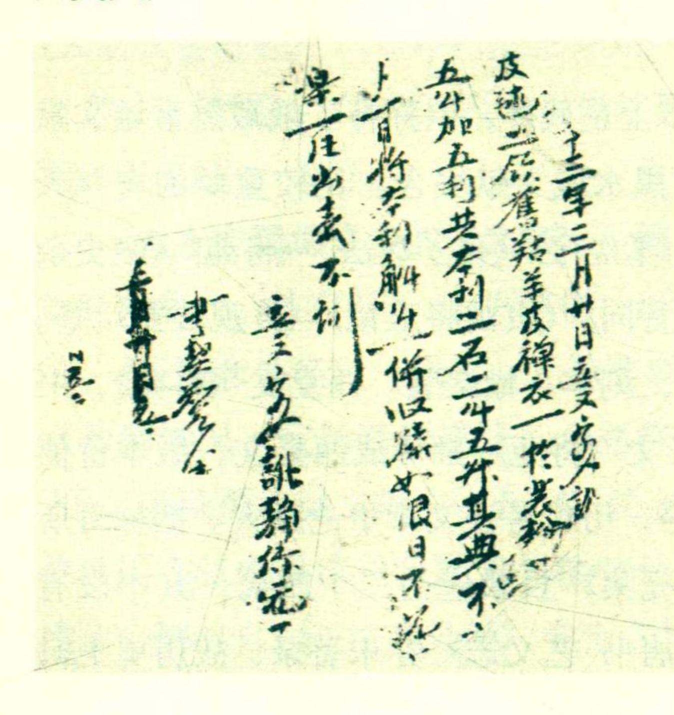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 写本残片。

(三)世俗文献

英藏黑水城世俗文献虽然基本上是残件，但弥补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不足,有的可以和俄藏和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缀合。比较重要的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新集锦合辞》《孝经序》《孙子兵法》《将苑》《经史杂抄》《新集碎金置掌文》《碎金》《音同》《贞观将玉镜》《贞观政要》等。西夏文《贞观政要》为残存220片，刻本，蝴蝶装。西夏文《将苑》，书名直译为“将军木林根”，根据汉文《将苑》翻译成西夏文，版本价值高。汉文《将苑》传为诸葛亮所著，历代考证文章争论颇大。据陈寿所撰《上诸葛氏集表》所列《诸葛亮集》目录应为二十四篇，其中没有《将苑》，《隋书·经籍表》及《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故历史上对《将苑》称诸葛亮撰，伪也”。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袭姚说，认为是伪作。但陈寿所撰《三国志》一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很难说其中对诸葛亮的文章就没有遗漏。《隋书·经籍志》在“别集”中载《诸葛亮集》二十五卷，然在

①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兵书类”的《孙子兵法杂占》四卷下注云：“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说明在梁代就有不载于《诸葛亮集》的单行的《诸葛亮兵法》五卷行世，其中是否有《将苑》，也不得而知。《宋史·艺文志》亦载“诸葛亮《行兵法》五卷”，可见直到宋代亦有诸葛亮兵法传世。所以《诸葛亮将苑》最早见于宋代尤袤《遂初唐书目》，郑樵《通志》亦记录武侯《将苑》，或许是事出有因，且《将苑》中的某些篇章的内容，被唐代的著名军事家李靖就引用过，如《将苑·习统》篇的观点就见于《唐太宗李卫问对》。即使《将苑》各篇不是诸葛亮亲自所著，但就内容与军事思想而论也是与诸葛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观点思想是相承的。《将苑》也被称作《新书》或《心书》，共五十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为将的道理，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来进行研究[1]。（插入图片27英藏西夏文）



英藏西夏文文献

英藏西夏文献一直没有被系统地全面介绍过。2001年史金波将在俄国得到的部分英藏西夏文文献复印做了初步翻译和考证，对其中价值较高的世俗等文献分别做了介绍。[2]《英藏黑水城文献》于2005年出版，为西夏研究增添了一批重要资料，胡若飞先生因较长时间亲自著录和研究这批英藏文献，他的《英藏黑水城文献

①《俄藏黑水城文献》7~11册西夏世俗文献“著作提要”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史金波：《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概述》一文，比较全面、准确、客观地介绍这批文献[①]。一些专家利用其中的文献进行专题研究，史金波在肯定其文献价值的同时，对其定名进行了补正[②]。对327种文献进行梳理，其中军籍21件，佛经30件，契约25件，贷粮契49件，监军司告碟2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5件，还涉及藏传佛教文献、佛经残片、发愿文等。其中首次发现有填字刻本文书，但残留文字较少，而且字迹浅淡。此件文书或与公家放贷有关，唯其有刻版文书，只续填写数量、利限和时间即可。

二、英藏黑水城文物

斯坦因原籍匈牙利，长期任英属印度文化官员，1914年5月27日斯坦因到黑水城，进行了为期8天的发掘，所获文献外，还有建筑构件、佛像、绘画、纸币、旗幡等。

建筑构件　多为瓦当、瓦片，均施釉彩,有的表面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枝叶花卉及装饰图案，有的是兽头形筒瓦。类似的物品在建国后内蒙古考古队的考古结果中也可以看到,如一面贴塑浮雕饰飞龙纹，另一面为飞凤纹的屋顶脊饰，还有立于筒瓦之上的力士脊饰等。[③]斯坦因搜集品中的木制品为建筑用的梁、柱、擦、椽、仿、替木、斗、拱、立颊、栏额、雀替等，这些用于斗棋形制的建材完全是中原传统的风格，由此可见，虽然该佛寺形制为藏传佛教寺院早期的形制，但仍受到了中原很大的影响，这正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同中原建筑融合的一个结果。

男女双身佛　双身佛的男身代表慈悲，称佛父；女身代表智慧，称佛母，慈悲和智慧是佛法的两条根本，因此这种双修造像也有人叫“父母佛”，但此并非人间的男女关系，而是密宗佛像，是密宗六度修身法中最后的两个阶段——即禅定与智慧的化身，名叫定慧双修法。此双

---

①胡若飞:《英藏黑水城文献概述》,《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5期。

②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补正刍议》,《西夏学》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第9页。

身佛有脚踏两头怪兽，态如湿婆的神像。

供养塔 1座，底部刻有婆罗密文字。

佛画像 1幅，亚麻材质，具有西藏风格，颜色极好。斯坦因报告目录记述编号K.K.I.ii.01，画布长8.4 厘米,宽5.9 厘米。画面有坐佛像，佛像脚掌脚心朝上，手做训示状。头部微微下俯。大耳，黑色短发，长鼻，嘴型呈微笑状。肉色粉红，深粉色上绘黑色边线。右臂似乎被遮挡，右上臂戴臂。一根开花的树枝似乎是由左臂处而出。颈部绕念珠。佛像身着三件衣服，里面着浅色可能是白色，朱红袍，灰边黄带。朱红色马蹄形背光，中央绘绿色头光、近头处光线阴暗。绿色拱肩，且绘有朱红色花朵。头光上部横穿黄色窄线，窄线上部为朱红色边缘。画面下部，一直排连续莲花座，绘有阴影。整个画面在风格上十分藏式化。画面上色十分细致，且颜料与水混合。背面上灰色，可能混合有蜡或油，还书有几枚秀美的朱红色吐蕃文文字。边缘被裁。从整体来看，该像应为自然人的形象。从藏传佛教中有将高僧绘于壁画、绢画供奉于寺院中的传统来判断，该像很有可能是一位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

佛塑像 斯坦因考古报告记录，寺庙中正面佛坛上残留有一个主尊基座，主尊基座两边又各有两个基座，正面佛坛上原应为一铺五身塑像背面佛坛上残留一个主尊基座，两个侧佛基座，可以看出造像应为一铺三身，但是在坛前还有两个基座，斯坦因推测为力士像基座。再从背面佛坛侧佛基座上残留的芦苇捆绑的树枝，以及各处散落的塑像黏土残块可以看出，这几尊塑像为木骨泥塑像，是以木骨骨架作内部支撑物，然后在木骨架上捆绑芦苇等做成草胎，再用粗泥塑造基本形态，最后用掺有麻或棉花的细泥塑出塑像。在泥塑制品中，有塑像的手及手臂残件。这些残件大致为小佛像手部残件、巨型塑像手指残件、等身塑像手指、前臂残件和相当于真人三分之二大小的塑像手部残件。等身泥塑佛像手腕处有木钉连接，手指中间没有中心骨架，有指甲。这些大小塑像造型丰富，有的胳膊上举，有的手握器物,还有的手施法印。

版画 编号K.K.II.0248.a残片为表现菩萨尊相的版画，画面为单尊

菩萨像，菩萨面部丰胶，坐在岩石平台上，平台底部对称下收至一茎，而后又铺开成一基座。水占据了画面的下半部分。菩萨像左腿以通常方式平行折叠，但右腿直立，脚置于岩石之上。其精美头饰可能是金刚杵或是火焰，但也可能是花朵和树叶，两耳上各有一个三面弓形的物件，并从中垂下一长飘带于肩后，目光下投。有大痣且其轮廓呈莲花形。双手已失。右边立细高花瓶，内插柳枝。整个菩萨像和平台都被单线背光包围，其上和周围都是重重叠叠的云彩。编号K.K.II.0262为表现法慧菩萨尊相的版画，菩萨坐于莲花座上，头部向左微转，呈训诫状。宽松长袍于胸处开口，从很高的发式处似发出一束光波。身体背光为单色双边,三条向上曲线几组重叠。单色头光。斯坦因记录残片顶部右边有一条西夏文题记，实为汉文题记，即为画面中的菩萨名号“法慧菩萨”。上述两者都是印制而成。编号K.K.II.0275.c残片为手绘菩萨尊相，菩萨斜卧且姿势优美，单线描绘，绘工精致，可能是尊相画稿。诸如这种表现尊像的绘画品还有表现佛像、金刚力士、高僧等尊相的情况。这些尊相画有些作为供养之用，有些为发愿而作，也有些作画稿用来摹绘。除了这些尊相画外，数量不少，护世者、佛陀、菩萨等。

擦擦 编号为k.k.va塔内出土一座完好的砖佛（擦擦）和几尊尖端有金属装饰的供养塔（擦擦），斯坦因收集到了三件供养塔（擦擦），一件圆顶塑起于四层八边形塔基上，塔基每面的正面是薄浮雕的小型佛塔，八边形下面有一个环形高台，高台圆珠围绕。表面多处磨损①。该件是传世塔擦中较常见的八塔擦，另外两件形制较大，高约10.6厘米，直径约10.2厘米，形制也同于八塔擦。供养塔（擦擦）凸起棱角之间的地方有几组不连贯的文字，可能是经咒。

中统宝钞 元代中统元年忽必烈下诏制造的，中央政府以丝为本，每50两银兑换宝钞一千两。

水墨画 仿宋元山水画而创作的水墨画，画中有云烟缭绕的巍峨山

---

①A.Stein,Innermost Asia,I,p.469.

峰。在绘画品当中，还有一些被镂空的绘画品，这些绘画品被作为画样画稿来使用。据沙武田博士学位论文《敦煌画稿研究》，此类画稿在敦煌也有出现，且通常用于壁画的绘制而不用于绢画或纸本画的绘制，斯坦因搜集品当中有两幅，一幅为编号K.K.II.077，画面为镂空花样及涡形图案；另一幅编号K.K.II.0275.f， 画面为花样装饰，镂空后作为镂花模板。花形似为牡丹。各边皆残损且呈褴褛状。纸质较厚实且极其易碎，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褪色且被黑色的粉扑弄黑。

镂花装饰模板 通常用于壁画的绘画而不用于绢画或纸本画的绘制，画面为镂空花样及涡形图案，镂空后作为镂花模板。

壁画 属科兹洛夫剥下而无法带走的大量顶棚板画、在佛殿的墙壁和影壁上都残留有壁画。斯坦因记载两件壁画残片，一件有绘涡卷纹，一件有绘兽脸。内蒙古考古队的《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中也记有殿内西墙和北墙西段以及东墙的北段残留壁画西壁南段绘千佛和童子观音等中段已难辨认北壁西段绘千佛东壁依稀可辨有一佛交脚跏趺坐于莲台之上[①]。

旗幡 用于宗教或丧葬，彩绘，为旗幡近上右部。画面为一尊十分精美的天女直立漂浮于半空中，头部向中心佛像下弯，流苏罩蓬下有火焰纹背光。天女身着宽松短袖衫，衣衫开型至腰际，并累至臀部形成优雅褶皱，前面低垂。左手展开托一小水果盘，上举右手中有一枝花。粉色紧身长袍上饰有螺旋形饰点，且有绿色边缘，露出赤脚长袍正面，腰带的两条长头在大约与膝盖平行的地方打结。用黑色随意绘制轮廓。

第三节 中国藏黑水城文献文物

1927年中瑞（瑞典）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达内蒙古时，中方团员黄文弼考察了额济纳旗黑水城及附近遗址，在城内采集到数百件文书，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考察黑水城[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水城所在的额济纳旗先后归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1962年和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调查古居延时，在黑水城采集到少量文书[②]，现藏内蒙古博物馆；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到黑水城调查，分别采集到少量文书[③]，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下拨专款，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1983年和1984年两次发掘，基本上将全城勘察完毕，重点发掘面积11000平方米，揭露出房屋基址280多处，探明了古城的布局和沿革。出土近3000多件文书，主要是汉文文书，约占3/4以上，其余为西夏文、畏兀尔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书，现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④]。本书所收的汉文文书主要是这两次考古发掘所获。另外1983年、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发掘的西夏文献收编在《中国藏西夏文献》“内蒙古编”中[⑤]。蒙古文及其他民族文献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蒙古学研究所联合整理译释。

一、中国藏黑水城文献

（一）汉文文献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约4000多件，孟列夫统计的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488件，如果加上混入敦煌文献与后来揭下的写有文字的裱糊用纸，

---

①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旗沙漠中古庙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③陈炳应:《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书》,《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7期;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雄山阁,2008年3月。

⑤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史金波、陈育宁主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也就500多件。《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集4213件，其中宗教文献只是很少一部分。专家根据种类和数量编成10卷，卷一为农政文书，212件；卷二为钱粮文书，387件；卷三为俸禄与分例文书，203件；卷四为律令与词讼文书，415件；卷五为军政与站赤文书，600件；卷六为票据、契约、卷宗、书信，277件；卷七为礼仪、儒学、文史，278件；卷八为医算历学、符占秘术、堪舆地理及其他，99件；卷九为佛教文献，223件；卷十为图画、印章及其他文书，1509件。卷十的内容残失严重，有的所存文字不多，难以贯通文义；有的只有年款、署名、押印，而无具体内容。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全卷

《文献通考》 刻本，残存4卷56面，其中卷四十六存14面，卷四十七存17面，卷四十八存15面，卷四十九存10面。每面13行，满行26字。两面中缝刻书名、卷次、页码。卷首首行刻书名、卷数、次行刻“阳马端临贵舆著”。该刻本为研究《文献通考》的版本流传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大元通制》 残件，竹纸印刷，版心为粗边栏，通高19厘米，宽13厘米。每面刻文10行，加细栏，满行23~25字。残存文为《大德八年正月恤省刑诏》的后半段。《大元通制》编纂历经成宗、英宗两朝，英

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行。该书是继《至元新格》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分诏制、条格、断例和分类四部分，元朝印本早已散佚，现在见到的是1930年北京图书馆根据内阁大库藏明代写本《通制条格》影印本与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显然，元刻本残件的发现，在版本学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至正条格》　残件，雕版印刷，版心高约22.5厘米，宽约14厘米，四周粗栏，每页8行，满行18~20字。两面间中缝有刻工姓名与总页码。通过残件的版心与天头地脚推测，原书通高约34厘米，宽约17.5厘米，比前述《通制条格》的版本宽大。李逸友先生把该残件和《通制条格》《元典章》进行对比，发现“这些条格仍保留了原有条款”[①]。

《失林婚书案卷》　失林婚姻诉讼系列案卷，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架阁库遗址出土文书中保存文字最多的一份文书档案。它是一件以婚书为中心的婚姻案件，反映出婚书在元代婚姻中的重要性以及婚书对夫妻双方的约束作用。《失林婚书案文卷》中有原告的诉状，有传讯被告和证人时记录的取状，有被告的识认状，还有收管犯人的承管状和责领状，完整地保存了元代不同状子的书写法式，同时它也记录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府办案的司法程序，反映出即使在元末红巾军起义不断、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亦集乃路官府审理案件仍较认真和有条不紊。

《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卷》　共5件，文意基本能够连贯的残件有4件，十几字的残屑有1件。其中用麻纸书写两件，用竹纸书写的文书有3件。书写字体有行书、草行书及行楷书。均出自亦集乃路管府阁架库，文卷中记录的时间是元至正廿年（1350年），为麦足朵立只答因其驱口亦称布不为其服站役上告官府，由投下官乔昝布、赵答麻进行劝说。在这组文书中可以看到“劝说”“劝付”“劝道”等词，文书中的投下官乔昝布、赵答麻充当的是劝和人的角色。反映出劝和人在元代民事纠纷的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①李逸友:《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至元四年十月二十日韩二欠钱契》 元代写本，行书，共九行，基本完整。只是尾部纸张残，不知“知见人葛二”后是否还有文字。全文为“立欠钱文字人亦集乃路耳卜渠住人韩二，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今欠到石巡检中统宝钞贰拾柒两五钱。其钱本人自限正月终交还，如至日不见交还，系同取代保人一面替还。无词，恐失，故立故立文字人为用。至元四年十月廿日立文字人韩二［押］，同取代保人张二［押］，知见人葛二 ［押］”。

《至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陈山和借钱契》 行草书，共十三行。背墨书“细辛”二字。契约已残，但内容基本完整，如“不令拖欠，或钱主用钱，至日即便将本利归还，或本人走在东西，虽在无钱归还，系同取代保人一面替还。无词，恐人失信，故立此借钱文字为凭照用”等文字和“至元四年十月廿九日立借钱人陈山和”［押］，有“同取钱人陈某某、同取钱人陈拜住、同取代保人翟敬甫、代保人董德先、知见人程二、知见人翟典”画押。文末书“大吉利”三字。

《李闰通与赵译史合火契》 元代写本，行草书，共18行。文书左上角有祝福语“后吉利”三字。“後吉利”是契约上的祝福语。“后吉利”的说法又出现黑水城出土《至正二十五年东关住人张宝奴借小麦契》契约尾部。元末的朝鲜汉语教材《朴通事》中赵宝儿求“秀才哥”为自己写一纸借钱契约，写完后“空处写‘大吉利’，或写‘余白’两字着”[①]，说明将祝福语写在契约空白处是元代较为普遍的行为。合伙契约写明合伙双方（立契人和同立契人）的住址姓名、各自责任、利益分成、违约处罚等，契尾由合伙双方（立契人和同立契人）共同署名画押。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诸多类型的契约中，仅有婚书与合伙契为“合同”立契。这种形式在先秦为“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者，谓前后作二

①《朴通事谚解》，汪维辉主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245页。

券，中央破之，两家各得其一”[①]。后来发展为抄写一式两份，需要时予以对证。但随着历史发展，这种立契方式使用渐少，以借贷契约为例，立契本用以维护债主权益，防止债务人赖账，故仅需债务人自身署名画押，由债主收藏，不再需要双方共同署名“合同”。唯有合伙契约双方职责基本均等，契约需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故而仍然是采取着“合同”这种古老立契方式。

《戴四哥等租田契》　元代写本，麻纸。行草书，文献右上部分残缺较多，契约尾部纪年、署名、画押等项亦残缺不见。内有“唐来渠西”“东至唐来为界，南至民户地为界，西至草地为界，北至本地为界。四至分明，租课天雨汗种壹年，承纳糜叁硕，平旧方四大斗刮量，不致短少”等语。戴四哥等租到的土地位于“唐来渠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距亦集乃路千里之外的宁夏有一条流传千年的名渠唐来。唐来渠，又名唐徕渠、唐渠，相传始凿于汉代，唐复浚，为流经西夏都城兴庆府最大的干渠，也是西夏境内最大的干渠，西夏《天盛律令》在谈到灌溉渠道时，常以唐徕、汉延二渠概之[②]。《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指出：“先是，古渠在中兴者，一名唐来，其长四百里，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长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守敬更立闸堰，皆复其旧。”[③]郭守敬修复的唐来古渠在宁夏境内，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黑水城文书中的本渠、合即渠、额迷渠、吾即渠（吴即渠）、沙立渠（沙刺渠，可能又称沙尔渠）、耳卜渠、玉朴渠、泉水渠、屯田渠等都在亦集乃路，这也是没有疑问的。至于租田文书中的唐来渠是不是也在亦集乃路，换言之，黑城文书中所记的唐来渠是原西夏境内的唐来渠，还是黑水地区有一条渠道也叫唐来渠，目前还不能确定。

《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赁房契》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

---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③《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46页。

内有“立赁房文字人亦集乃路住人”“无房具[1]住，今赁到本城东关外王［某］土房一间，门窗具[2]全，仪定每月[3]房钱小麦伍升，案支取，不令拖［欠］，如住房人自不小心走失火烛，并不［干］房主之事，系住房人一面修补无词。恐后无凭，故立此赁房文字为照用”。契尾有至正廿年四月初一日立赁房人马□画押。

《皇庆元年正月任黑子借麦契》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基本完整，仅有前半部分上部及文中少数几个字残缺，记录“［立］文字人任黑子今为大麦使用，别［无］借处，今问到别尚拜延处，借讫收□大斗内四石。限每月每石上行息一斗，利按月计算交还数□，不令拖欠。如本人见在不办，闪趟失走，一面同取代保人替还无词。立此文字为凭照用”。契尾有皇庆元年正月初一日立文人任黑子画押和同取人敢的、代保人安通、知见人猪乃、知见人景直你的画押。

《至正二十五年东关住人张宝奴借小麦契》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共10行。

记录“立借小麦亦集乃东关住人张宝奴，今为缺少口粮，别无借处。今于赵译使处借到谷行利市斗小麦伍斗，每月伍升，逐月支取。本人要物之日即便归还，如物人东西，代同人替还，恐后凭，此为用”。契尾有至正二十五年借麦人张宝奴画押，代保人和同借人姓名画押残缺。并在契纸最左上角书写“后吉”等文字。

《至正元年八月初四日小张雇身契》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稍残。记录“立雇身文字人小张，今为身闲，别无营生，自愿雇与古二处作杂色，酒店内使唤。每月言定工钱中统钞贰拾两，按月计算。如人天行时病，逃亡走失，一切违碍并不干雇主之事，同雇人一面承管。一写已后，各无番悔，如有先悔者，罚钞壹拾两与不悔之人受用。恐后无凭，故立此雇人文字为照用”。尾书至正元年八月初四日立雇身人小张

---

①具，当为“居”误。

②具，为“俱”误。

③仪，为“议”误。《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88页释“议”。

和同雇人太黑奴，缺画押。

《何教化卖马契》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残件。记录“立卖马文契人何教化，见在亦集乃路正街住坐。今为缺钱使用，别无得处，今将元买到这烈特扇马壹疋，年当十岁，当众面议，依时价钱中统宝钞柒拾伍贯壹□与同街住人李拜延帖木为主，其马好歹，买主［自见］”，若“马来处不明，卖主一面承当，并不干买主之事。一卖已后，两无番悔”。

《至正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大吉合同婚书》　元代写本，麻纸，行草书，记录“立合同大吉婚书文字人，领北傀列地面，系太子位下所管军户脱欢等。今为差发重，军情未定，上马不止，盘缠厥少，无可打兑照期。今有弟脱火赤，军上因病身故，抛下伊妻巴都麻，自为只身难以独居住坐，日每无甚养济。今凭媒证人帖哥做媒，说合与亦集乃路屯田张千户所管纳粮军户吴子忠家内，存日从良户下当差吴哈厘抛下长男一名，唤哈立巴台，说合作为证妻。对众亲眷，言定财钱市斗内白米壹石，小麦壹石，大麦壹石，羊酒筵席尽行下足。脱欢一面收受了。当择定良辰吉日迎娶到家。诚[①]亲之后，并不欠少分文不尽财钱。如有脱欢将弟妻巴都麻改嫁中内别有不尽言词，前夫未曾身故，慢妹改嫁。一切为碍并不干吴子忠之事。系脱欢等一面证人无头词。如哈立巴台将伊妻不作妻室台举，罚小麦壹石。如巴都麻不受使用，非理作事，正主婚人罚白米壹石充官用度。恐无凭，故立大吉合同婚书文字为用”。契尾有至正廿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正主婚人脱欢、付主婚人[②]巴都麻、同主婚人塔义儿、同主婚人帖木儿、知见人李住哥画押。

《管都火儿等户纳粮文卷》　元代写本，麻纸。行草书，残件。存亦集乃路人户纳粮情况，其中“玉朴渠一户管都火儿粮一石五斗，小麦壹石，大麦伍斗；沙立渠一户台不花粮壹拾壹石一斗，小麦柒石四斗，

---

①“诚”，当为“成”误。

②“人”，《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第134页误释为“要”。

大麦叁石七斗；吾即渠一户任思你立布粮壹石伍斗，小麦壹石，大麦伍升；耳卜渠一户任三保粮叁斗，小麦贰斗，大麦壹斗；吾即渠一户任不花粮玖斗”。有朱笔勾画。

《元统三年三月初六日俵水文书》 元代写本，竹纸。行书，残件。元统三年（1335年）亦集乃路总管府关于社长、俵水及其他官吏灌溉职责与分俵河水方面的告谕。盖朱色印章。

《天字号收米文书》 元代写本，麻纸。行书，残件存“天字十七号”“忙古歹米壹伯式拾”“天字拾捌号”“初一日收米肆伯陆拾石”“何惠月米捌”“天字号拾玖号”“文进米陆拾玖”“天字式拾号”等文字。

《刘连代郑忠充任扎黑税务副使文书》 元代写本，竹纸，行草书。记录至大四年六月郑忠任扎黑税务副使满十二月，中间并无隐虚漏报不实，亦无侵系官粮，乃由刘连于至大四年七月一日接任。

《至大四年七月阿黑不花宁肃王分例文卷》 元代写本，竹纸。行书，基本完整。记录亦集乃路总管府据都思帖木畏兀儿文译读出阿黑不花宁肃王分例米面，下广积仓半印勘合。广积仓照验无差，放支白米一十二硕等。尾有至大四年七月吏刘大明、提控案牍史□□、经历亦黑迷失等人画押，多处盖有朱色印章。背书“领帖人月鲁帖木”七字。

《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文卷》 元代写本，竹纸。行楷书，残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畏兀儿蒙古文和汉文结合处盖浅墨色印章；第二部分为汉文译写，存“亦集乃路总管府”“桑哥失里大王的分例羊酒”“三个月的全得了也”“三月终通闰四个月的分例”“延祐四年正月 日译”“初九日”等文字。“初九日”上盖朱色印章。有画押。

《甘州路录事司关于不兰奚人口头疋保结状》 元代写本，竹纸。草书，首尾完整。存“皇帝圣旨里，甘州路录事司照得至顺四年正月至六月终上半年，不兰奚人口头疋已行具申。揔府照验外，据七月至十二月终下半年照勘，得本司并无拘收到不兰奚人口头疋，如申已后却有隐

漏拘收到不兰奚人口头目，依例当罪无词，卑司官吏保结，合行具申，伏乞，照验者”等文字。有勾画修改。

《广积仓收到大不花下徐大纳大小麦凭据》　元代文书，竹纸。行书，首尾完整。有“元统三年十月卅日”落款和付使杨猪儿、监支纳八察的画押。右上书“白贴”二字，当指该凭据在纸上手写，而不是在印刷的票据上填写。

《祭祀宣圣三皇与节日给假文书》　元代写本，麻纸。行楷书，残件。存宣圣祭祀、三皇祭祀、巴思麻帝师祭祀日期；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正旦给假三日，元正、寒食各给假三日，立春、重五、立秋、重九各假一日等。有朱笔点画。

《宣光元年更换亦集乃路儒学教授文牒》　元代写本，桑皮纸。行草书，微残。宣光元年十月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亦集乃路分司副使哈剌哈孙移牒亦集乃路总管府，提出该路儒学教授邢守善“非教养之才，冒膺师儒之职，耽误后进，玷污儒风”。前教授易和敬“行止端方，操履笃实”，可使取代。三处盖朱色印章。文末有年款、书吏名，木刻戳印朝列大夫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亦集乃分司付使哈喇哈孙画押。

（二）西夏文佛教文献

1983年至1984年发掘出土西夏文书均为残页，共计279纸，能考证出的有西夏文刻本《大悲总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调伏集义补》《地藏菩萨本愿经》《佛顶心陀罗尼经》，另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慈悲道场忏罪法》《圣胜慧集颂经》等封面或封面题签。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首页的右半面，在右下角有墨书“大夏圆寂寺”“贺家新施经”两行小字，由此得知该经为西夏印本。2006年专家学者在编撰《中国藏西夏文献》时，绿城出土的一部分佛经，也属于黑水城文献的范畴。

《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　简称《佛顶无垢总持》，宋朝时北印度僧人施护由梵文译成汉文。西夏文《佛顶无垢总持》没有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译者款识，译者失名。缝缋装，有封



《中国藏西夏文献》全卷

面，题签“佛顶无垢总持二卷”，卷上18面，卷下20面，连封面共39面。有时末行小字多达18、19字，甚至20余字。卷尾经题后有西夏文小字题款1行，译文为：“亥年二月六日日写竟。末页背面西夏文提款2行，译文为：宝塔匠人及发愿者行善康监富真智”，“大宝［藏］上师①”。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 西夏文刻本，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卷首有西夏文译梵文经名和西夏文经名，经名后有传、译者题款两行，译文为：“西天大波密坦五明国师功德司正授善式沙门 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授利益沙门周慧海译”，中、后皆残。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 西夏文刻本，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卷首有西夏文译梵文经名和西夏文经名，经名后有传、译者题款2行，译文为：“西天大波密坦五明国师功德司正授善式沙门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授

①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84—12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4—122页。

利益沙门周慧海译”。中、后皆残。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简称《金刚经》，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此经有的版本分为32分，每分前有小各分的内容，其中有9个分题。第2种为刻本，经折装，存3面。内容为第13分的大部分和第14分的前部。第3种为刻本，经折装，内容为第9分的中间部分。第4种为刻本，经折装，存2面，内容为第19分的一部分。第5种为写本，残存一面，内容为第14分的开始部分，这些版本皆为国内首次出土。

《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　木刻本，残件，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两种相连佛经的共同发愿文，文中保留了很多重要内容，文中称朕，可知是一篇御制发愿文①。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又称《大般若经》，属佛教大乘藏，西夏文刻本，单页。页面右侧有汉字“大若二百二十三巳”字样。

《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　写本，存14面，经折装。主要内容为：若人不能全诵此经，可先说神咒及诵持三种皈依佛名，亦可消除疾病及一切灾祸。此忏经在国内首次发现，虽有残损，但内容较为完整。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西夏文刻本，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经折装。存经文6面，仅1面较完整，其余5面上部残。面6行，行13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黑水城出土，国家图书馆馆藏，卷一八、二一、二二、二六、二七、三四、七一、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一〇三、一〇四、一一二、一一三、二八一、二八三、二九三、二九四、三五五，共21卷，写本，这些写经字体各异，出自不同抄经生之手，皆是七八百年的古本，在该经卷第18卷首发现有泥金写经题签，纸

①史金波等:《中国藏西夏文综述》《西夏学》第二辑，第56页。

质高雅，缮写精致，是稀见的题鉴。通过这些印本可研究西夏印刷和元代的印刷和版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黑水城出土，国家图书馆馆藏，共67卷，木活字本。西夏文活字印本，该经不少页面中有字形歪斜现象，有不少常用字与上下左右墨痕深浅差别明显，在经纸背面可见到以字为单位透墨深浅不一。这些都是初期活字印刷时特有现象。特别是此经卷40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在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此经卷5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碎字”，即为活字。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是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的确凿证据[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活字印本卷首前三行不是活字版，而是镶嵌在活字版中的小型雕版。这三行是经名、译经和校经题款，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唐于闻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鼓恭皇帝御校”。因为这些字在各卷首都相同，雕刊一次可以用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80卷，即可使用数次。确实是省工省力的方法，表明西夏人应用活字印刷时灵活操作，以方便印刷为原则，反映了西夏活字印刷的特点和水平[2]。

（三）西夏文世俗文献

中国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有字书、蒙书、契约、律令、诉讼文书等，虽然大多已残，但仍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

《同音》 西夏文词典，收录全部西夏字六千字左右，以声类排列。每字下皆有简短的释义。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刻本，中国藏主要是乙种本，共29纸。

《诉讼文书已卯年告状》 编号F79：W88，大小两件，书法、字体

①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第4期。

②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相同。皆残，大残片保存三条10行，前后两条残，小残片仅存3行，文末有年款“已卯年腊月二十九日”以及立文人的部分款识。内容为立文人叙述婚嫁中婚嘉纠纷，列出婚状总数，包括家中撒10石种子的耕地一块、牛马（马可能为衍字）10头、羊35只、马5匹，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习俗[1]。

《三才杂字》　简称《杂字》，其内容以天、地、人分为三章，天章包括天体星辰、雷电风云等；地章包括地山河海、宝物、动植物、衣饰等；人章包括姓名、亲戚、身体、屋舍、饮食、器皿、诸司、军杂事项等。中国藏2残纸， 编号F57:W1/0849存西夏文6行，前4行系“地章”的末尾，内容为“昆虫爬虫”类的一部分，后2行是“人章”的开始。编号F6:W13存西夏文2行，每行4字。两字一组。从其字词排列方式和词义内容看，是《杂字》“地”类的一部分。

《新集碎金置掌文》　简称《碎金》，是类似于汉文《千字文》一类的通俗读物，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编者巧妙地将1000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内容开始是序言，简述编书目；正文开始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后为人事，包括帝族官爵、蕃姓、汉姓、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社会杂项等。此书对西夏的社会、民族、文学、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藏《碎金》为3纸残页，一为序言，二为正文。

《乙亥年借麦契》　该契约较完整，立契时间是乙亥年二月五日，因无年号，所以具体年代不明确。借粮人即立契人拶移功合，拶移是西夏蕃姓之一，文末签字画押处为“借麦接收者”，即此借贷人，他因需要麦而借贷；借贷者拶移阿胜，借麦一石五斗；每月一斗中有一升半利，即月息15%，如借半年利息即高达90%，差不多翻了一番，这是典型的高利贷。契末记相借者子功合犬巴，即父亲借债，家里儿子也签字

①《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4、158、159页。

画押，若父亲外出或亡故，要父债子还。最后还有担保者名字。借者、相借者和担保者都要画押[①]。此文契真实地反映了西夏的借贷方式和借贷关系，是西夏黑水城一带社会借贷的真实写照。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刻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裱褙用纸，残片，上有单栏，下残。存文字3行，行5字。

《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诉讼文书》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四裱褙用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行书9行，上下皆残。

《军抄人员装备文书》 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九十三裱褙用纸，共两件，黄薄麻纸，每行皆有朱笔点画。内有正军、辅主、“项五，背一，胸前三，喉二”，“马头笼头缰绳”等语。

《大轮七年占卜文书》 编号F220:W2，残页，行楷书，存西夏文6行，有“命男丑岁十月二十四夜丑时承庆也”“三命依本根四柱”“丑木”“自身成柱”“亥水苗”“日戌午火花”“胎甲寅水根”“大轮七年权巨蟹今记”“木官住”等字词。西夏占卜由来已久，早期党项人迷信鬼神，崇尚诅咒和巫术，盛行占卜，西夏立国后又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占卜方法。此件中“大轮七年权巨蟹今记 木官住”即12年中的第七年，是巨蟹星宫，住木宫。此法源自中原，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二、中国藏黑水城文物

建筑构件 包括砖类、瓦当、滴水等各类脊饰构件，多为素烧，少部分挂釉，这些建筑构件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中也可看出原来车帐为家、逐水草而居的党项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

①《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黑水城出土虎头兽面瓦当(中国藏)

虎头兽面瓦当　陶质，圆形，正面装饰兽面纹饰，眉弓粗壮，双目圆睁，两腮面部夸张，鼻孔张开，龇牙咧嘴，颧骨凸起，造型奇特，整体有残损[①]。

乳钉草叶纹滴水　陶质，左右对称呈为弧形，上面装饰有乳钉纹及草叶纹饰，侧面垂直呈直角，整体有残损。



中国藏黑水城出土

莲花纹滴水　面呈三角形，顶部略呈弧形，腰边显现连弧状，构件中部装饰莲花幔枝卷叶纹，略有残损。

在造像绘画文物中，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有泥塑、描金彩绘、铜像擦擦等，这些精美的造像艺术与西夏文献都是西夏佛教研究的重要资料。

供养人像　共有五尊塑像，身材适度，衣纹流畅，造型精工，其中一老者，身高1.29米，束发连冠，脸面清秀，髭须修长，身披宽袖大衣，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70页。

下穿长裙，裙间下垂，有花纹饰带，神态自然，另一中年女像，身高1.23米，方圆脸，簪发贴花，眉清目秀，脸庞圆润，身披宽博大衣，胸着璎珞，下穿长裙。力士像比较奇特，上身裸露，披巾结于胸前，下穿彩裙，面相严峻，鼓腹挺肚，很像一个蒙古摔跤手，与一般力士像风格完全不同[①]。

彩绘泥塑佛像

彩绘佛头像　佛头整体面部慈祥，泥塑成型，发髻高束，通体呈红褐色。

彩绘泥塑菩萨像　泥质彩绘，菩萨呈半跏趺坐，面部圆润，有胡须，头戴花冠，上部半坦露，头部饰有花冠，颈部装饰有璎珞串珠，肩部和腰部斜系有红绿相间的带子装饰，右手搭在右膝上，左手着地。菩萨像低眉垂目，神态安详。

彩绘泥塑弥勒像　泥质彩绘，弥勒半跏趺坐，上半身坦露身体微微前倾，左手持袋，右手捧腹，面容充满笑意，右袖边和后领有残损，塑像身上有裂纹。



黑水城出土彩绘泥塑弥勒像（中国藏）

木雕菩萨像　木质，雕像头戴冠，端坐，结半跏趺坐木龛内，左手撑身后，右膝上翘，右手置膝上，双足足掌相对，木龛左侧雕有宝瓶，右雕玩耍的孩童，形象活泼自然。

白釉武士造像　武士面部丰满，鼻梁微微上挺，嘴小厚唇，眉毛上扬，双臂放置于胸前，身穿铠甲，颈前系有飘带，双肩上垂幔，双手和

①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旗沙漠中古庙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双脚有残损，整体部分有脱釉现象。



中国藏黑水城出土白釉武士像

擦擦 擦擦指一种模制的泥佛或泥塔，又称“模制泥佛像”或“拓模泥像”，陶制泥擦是最普通又最常见的一类，用普通的红陶泥巴制作，有时放入青稞粒或者有吉祥意义的物品，以朴实、平凡的信仰之心表达对佛的敬仰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黑水城出土擦擦体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佛陀题材造像，另一种是观音像，分别介绍如下：

佛陀题材擦擦 有单佛、三佛、五佛、八佛、九佛、十佛造型，以及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佛二护法等组合神像表现形式。有些与佛教经咒文字、符号结合在一起，表达不同的宗派思想或者教义。佛像基本形象为高髻、尖顶，斜披袈裟，袒胸，右臂手持各种手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置于龛内。龛成尖宫门形，喻义对释迦牟尼初转法轮为弟子说法等四相成道佛本行的纪念，素泥无彩，为藏传佛教艺术风格。

桃形单佛擦擦 陶质，高6.9厘米，宽5.2厘米，模制，呈桃型。正面塑佛像一尊，头戴宝冠，身披璎珞，结珈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施智拳印，身后背光。背面压印布纹[①]。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91页。


黑水城出土桃形佛造像擦擦(中国藏)

桃形佛造像擦擦　陶质，高7.1厘米，宽5.2厘米。模制，呈火焰形。正面塑佛像一尊，头戴宝冠，身披瓔珞，结跏趺坐于兜率天宫宝座上，右手作说法印，右手持宝物，背后背光，背面压印三个梵文①。

连弧桃形单佛擦擦　陶质，高4.9厘米，宽3.9厘米。模制，整体呈连弧桃形。正面塑佛像一尊，高髻束发，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手坐说法印，左手持金刚杵②。

一佛一度母一金刚擦擦　陶质，连弧桃形，高6.8厘米，宽1.7厘米。模制。正面塑佛像三尊，均头戴宝冠，身披瓔珞，结珈趺坐于莲花座上，有身光头光。上部佛像双手托钵，似乎为药师佛。下部度母和金刚分居左右两侧，中间为覆钵式喇嘛塔；下部右侧佛像三首八臂怒目，两主手左手无畏印，右手与愿印；六副手各持宝器，似乎为金刚护法。左侧度母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手与愿印，右手说法印③。

一佛四塔擦擦　陶制，直径2.4厘米，模制，圆形，正面为一尊佛像，高肉髻束发，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有身光头光，双手施禅定印。佛左右两侧头褐腰处分别各置两座佛塔。背平，侧边一周有梵文④。

观音题材擦擦　内蒙古出土的西夏擦擦中，观音的形象也较为丰富，有十一面八臂观音立像，有千手千眼观音等。观音双腿刻画图案曲线，似着很薄贴身的褶线花裤，很有质感。观音的脸型较饱满，为藏传

---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93页。

②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02页。

③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98页。

④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88页。

佛教分格造像特征，衣饰有印度、尼泊尔风格。

观音像，陶质，高6.9厘米，宽5.2厘米。模制，呈连弧桃形，正面素一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瓔珞，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手施触地印，左手持金刚杵，身后有背光[①]。

千手千眼观音，红陶质。高11.8厘米、宽7厘米。长方形连弧圆顶内主尊塑立式十一面八臂观音，站立于莲花座上。正上方为一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持钵，有头光身光。佛的左右两侧为两菩萨，左侧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手高举持法物，右侧菩萨坐于莲花座上双脚下垂，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施变身印。下方右侧为度母，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侧为一护法金刚，站立于莲花座，脚下踩一小鬼，双手持法器[②]。观音上方和下方布置的五身佛像代表了观音的多面，周围圆形点线代表了观音千手千臂姿态，造像简单明了。在如此小的空间内布置了六身人物，可见设计创作者别具匠心，技艺精湛。[③]

十一面八臂观音，陶质，高10.8厘米，宽6.9厘米。长方形连弧尖顶龛内塑十一面八臂观音一尊，双手合十，立于须弥座上，观音四周有许多小佛塔和法器，199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④]。黑水城还出土一件白陶质西夏十一面八臂观音擦擦，高



黑水城出土擦擦十一面八臂观音（中国藏）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90，12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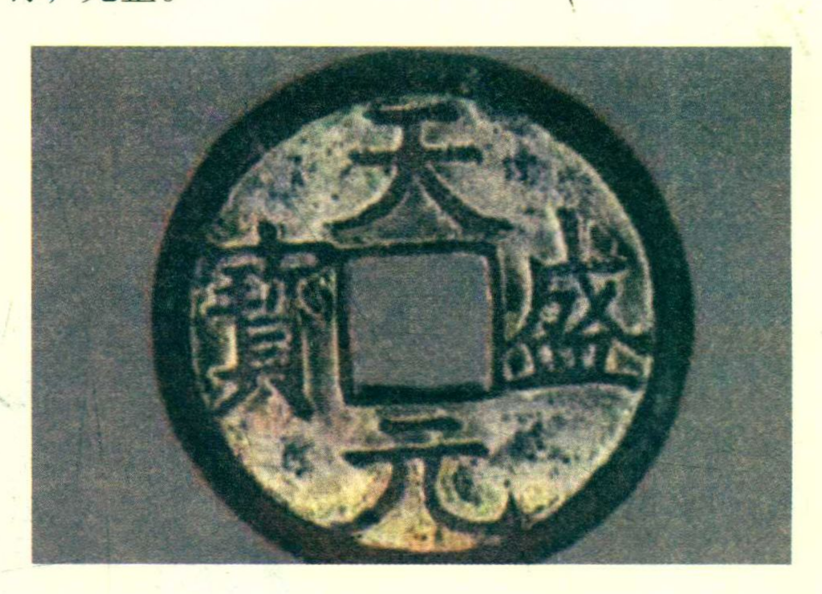
②汤晓芳、陈育宁：《西夏艺术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③汤晓芳《西夏艺术》，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④汤晓芳：《西夏艺术》，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9.5厘米，宽6.2厘米，长方形连弧尖顶龛内塑十一面八臂观音双手合十立于莲花座上[①]。

货币　中国藏黑水城出土货币有汉文西夏“天盛元宝”，铜质。直径2.5厘米，孔0.5厘米×0，5厘米，厚0.1厘米，重4克。方孔圆钱，正面铸汉文“天盛元宝”4字，平背，完整[②]。汉文西夏“光定元宝”，铜质。方孔圆钱，正面铸汉文“光定元宝”4字（“光定”为神宗年号，1211—1223年）平背，完整。[③]



黑水城出土钱币(中国藏)

铁器　中国藏黑水城出土铁器有单执铁壶、车毂 、铁蒺藜等。单执铁壶，三合模浇铸，侈口，颈较长，溜肩，鼓腹，圈足，短直流，短柄，平底，单耳，完整，采集于黑水城遗址[④]；铁锤，锤面直径8.6厘米，腹径9.9厘米，高16.2厘米。生铁铸造。圆柱状。平面锤，中间略鼓，开孔，完整[⑤]。

车毂　内径11.2厘米，外径21.2厘米，厚5厘米。生铁铸造，圆形，

---

①汤晓芳:《西夏艺术》,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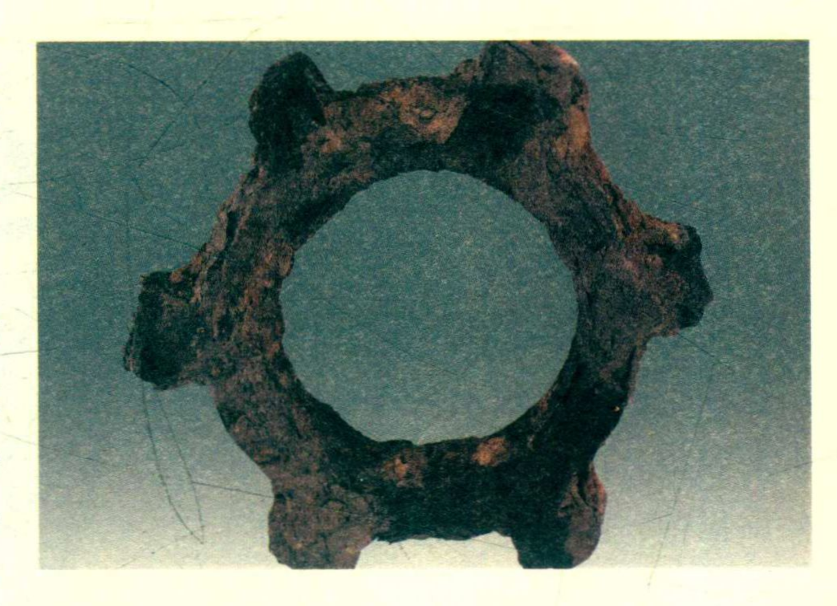
②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23页。

③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32页。

④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6页。

⑤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5页。

外侧有6个等距方齿，齿均向外凸出，铁锈严重，基本完整，1989年采集于黑水城遗址①。



黑水城出土车毂（中国藏）

铁蒺藜　在古代战争中，将铁蒺藜撒布在地，用以迟滞敌军行动，有的铁蒺藜中心有孔，可用绳串起来，以便敷设和收取。一般直径在20厘米左右，表面有十几个突出的尖角，胎质里面加水钢胎质粗瓷，腹内空，其腹内可容纳一斤左右火药，有近1厘米的通眼，有平足。此件高3.5厘米，4铁钉连铸，锈蚀，完整②。



黑水城出土铁蒺藜（中国藏）

瓷器　中国藏黑水出土瓷器有褐釉刻花缸、褐陶骨朵、褐釉弦纹梅瓶、白釉敞口鼓腹缸等。褐釉刻花缸，通体施褐釉，口齿露胎，口沿下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8页。

②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12页。

周刻卷草纹，腹部剔刻花卉图案。

褐陶骨朵　整体呈瓜棱形状，中间有孔，胎色为红褐色，完整[①]。

褐釉弦纹梅瓶　形体较完整，口唇部略有磕损，肩部装饰有弦纹，小口双折唇，束颈，丰圆肩，肩以下渐收敛，内圈足，瓶体修长，通体施褐釉，圈足内不施釉。装饰工艺采用刻花技法，纹饰质朴自然。



黑水城出土褐釉弦纹梅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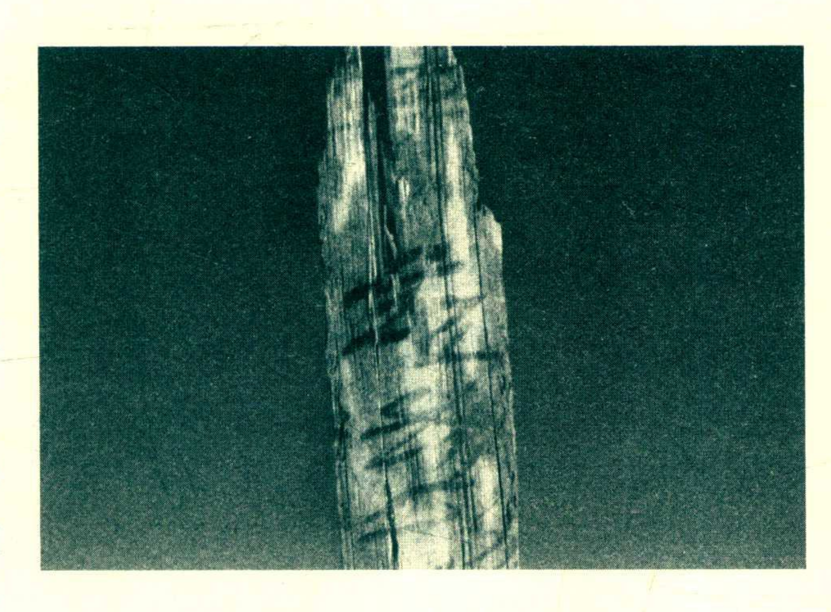
白釉敞口鼓腹缸，呈侈口台唇，束颈溜肩，鼓腹斜壁，卧足平底，轮制，内外施灰白釉，口沿露胎，近底部有1处小孔，完整。在东西经贸和文化交流中，对西夏瓷器釉色的影响，首推白色。早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王朝（亦称“翁米亚王朝”“倭马亚王朝”）就是与中国最早通商的国家。因其旗帜尚白，中国史籍成为“白衣大食”，其崇尚白色，直接影响中国瓷器出口的颜色，西夏白釉瓷器估计与对西域的出口有关。



黑水城出土白釉敞口鼓腹缸（中国藏）

木印模板　1989年从黑水城遗址附近采集，此件模板为长方体，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编》，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58页。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木简(中国藏)

正面、背面刻有梵文，有一些破损，文字未识。此模板对于我们了解西夏境内的民族情况、文字种类、刻印技术有一定的意义。

西夏文木简　内蒙古额济纳旗文管所共收录三件木简，其正面皆墨书西夏文，木简上端有些残损，竖行行书，部分文字已辨认不清，据专家学者推测，这三件木简可能是为当时祭奠亡灵所用。其中木简一，正面墨书西夏文九字，文字模糊，第一、二字似为“竃跦”（“身转”，即转身，意为死亡）第七字似为“罍”（“母”）字，可能死者为立简者之母；木简二，形状呈梭形，一侧残损，另一侧有裂纹，第五、六字可能是“藹貥”（“耶和”，西夏党项姓氏）；木简三，正面墨书西夏文八字，第五字似为“继”（“浑”，西夏姓氏），第六字为“氏”（已婚女性），竖行行书①。

①塔拉：《西夏文物·内蒙古卷》，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06—1208页。

第四章　百年展望：黑水城文献文物研究与西夏学

第一节　俄罗斯、日本及欧美的研究

黑水城文献是近代中国继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简牍之后又一重大出土材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特别是西夏的珍贵资料。由于这批文献绝大多数是西夏文，因此，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以来发现的考古新材料的宝库，还催生了一门新兴学科——西夏学。由此闻名世界的西夏学也借此揭开了序幕。一百年来，西夏研究经历了文献编目、译释、考证、整理出版到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一、俄罗斯的研究

俄罗斯的西夏学自20世纪初黑水城文献发现，迄今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这期间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西夏学的发展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到1920年为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

1909年岁末，俄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堆成山的黑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汉文和西夏文的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学习对照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这本词典的发现，成为破解黑城

文献之谜的钥匙。至此，他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用骆驼驮回来的是中国西夏王朝190多年的历史！在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字典中，人们解读了西夏文，给后人更完整地诠释了神秘的西夏国。伊凤阁利用其广博的的学识，对西夏文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还选阅了《音同》《文海》《义同》，并考证出一些佛经名称，同时还编辑了西夏文字典，为解读西夏文文献带来了曙光。伊凤阁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西夏研究。1912年伊凤阁教授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1页以示罗振玉先生。罗先生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以此书9叶影本石印流传。1922年罗先生自伊凤阁教授处见全书影印本，为之惊喜，借机抄录，于1924年影印出版，学人才得以见完壁。

1920年到1937年为第二阶段，也是俄西夏学的初步发展时期。

早期西夏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是由俄学者进行的，俄学者凭借占据大量黑城西夏文献的优势，得以通过初步识读而写出了一些对西夏文献进行评价的文字。自20世纪20年代起，又有一批学者加入研究西夏的行列，主要有阿列克赛耶夫、龙果夫、聂力山等。《夏汉文对照〈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916年）、龙果夫鉴定了41种西夏文献，登记了2720项西夏文献，发表了《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藏西夏文书籍目录》（1930年）、《西夏——汉文字典中“尼”+卒式双字标音》（1929年）。聂历山登录了955项西夏文献，发表了《谈西夏字典》（1926年）、《藏文注音西夏字简介》（1926年）、《唐古特语言和文字研究概述》（1929年）、《西夏文字及其特藏》（1935年）、《西夏国名考》（1933年）、《西夏语文学》（1960年）。聂历山教授以其辛勤的劳动、很高的学术造诣和扎实的汉学功底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第一个受命编制所藏西夏文文献清册，他在清理文献的同时对文献进行拼合、摘录和研究。他还在黑水城文献中找出并初步解读一些重要文献，皆学术界闻所未闻，如西夏文诗歌、《掌上碎金》（碎金置掌文）、《贤智集》《孙子》《六韬》《三略》《孝经》《论语》《三略》《十

二国》《慈孝记》《义海》以及卜辞、历书、医方等。俄学者的西夏学研究是以西夏语文学为核心的，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子系统这一角度讲，他们的西夏语文学研究，本来就属于西夏文化研究的范畴。其实，俄学者并不仅仅是研究西夏的语言文字。克恰诺夫说得很清楚“西夏具有独特的文化”①，并说，他们所进行的是有计划的西夏文献研究。

然而好景不长，俄罗斯肃反扩大化，杰出的西夏学先驱伊凤阁、聂斯克死于冤狱。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西夏学步入低谷。

二次大战后结束后至今为第三阶段，俄恢复西夏研究，也是西夏学大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尤其繁荣。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龙果夫又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1960年，俄政府为聂斯克平反昭雪，并编辑出版了他的论文和西夏字典手稿，《西夏语文学》于1962年荣获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年轻的专家克恰诺夫开始从事西夏研究，1963年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全面地著录出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目录，其中对世俗文献著录详备，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出土的珍贵文献有400余种。②

从20年代末起，俄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的研究，并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孟列夫、科洛科洛夫等。这一阶段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从而奠定了世界西夏学的领先地位。

其一，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考定、编目和叙录。戈尔芭切娃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954年）、《苏联

①见《民族史译文集》，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1979年。

②杜建录：《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学家档案西夏文资料（聂历山档案）》（1956年）、《列宁格勒的西夏学史略》（1960年），还有戈尔芭切娃、索夫罗诺夫合著的《西夏语语音研究》（1963年）、1963年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公布了科兹洛夫劫走的部分西夏文献目录，计有佛经345种、政治、法律、军事、语文学、医卜、历法等著作60多种，合计405种。克恰诺夫、柯拉科诺夫、克平合著的《西夏文译汉文古籍——论语、孟子、孝经》（1966年）、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1968年）。1963年，戈尔巴切娃和克恰诺夫合作完成《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现已考定的60种世俗著作作了叙录，并将370种佛教典籍进行了初次编目。此后，克恰诺夫继续对370余种佛经进行整理和研究，其最终成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馆藏西夏文佛教典籍目录》（俄文版），于1999年在日本京都出版，此书是对1963年发表的“书目”中佛经文献的进一步研究。这样，俄国几代学者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艰辛努力，完成了近3000件共430余种西夏文献的书目考定和内容叙录。但这只占全部登录的8090件西夏文献的38%，还有62%的西夏文献尚待考定。而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的残片部分，至今仍未经过系统和准确鉴定。

其二，俄藏西夏文文献研究。1964年，格烈克、吉亚科诺娃、克列托娃、鲁勃——列斯尼钦科和鲁多娃合作给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学术年会提交研究该馆所藏西夏文献的报告提要。1964年到1969年，克平、克恰诺夫、科拉克洛夫、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等人组成研究小组，对西夏文献藏卷进行研究，先后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的译注本《西夏文译中国古典作品〈论语〉、〈孟子〉、〈孝经〉》[①]和《有真迹复制和俄译〈文海〉、〈文海杂类〉》[②]（两卷本）等书。克恰诺夫在出版个人专著《圣立义海》的同时，对一些西夏文文书进行专门研

①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

②《东方的文字奏折：历史语言学研究1969年手册》，莫斯科，1972年。

究，《对黑水城出土的第8203号西夏文书的释读》、《吴兢〈贞观政要〉的西夏译本残叶考》[1]克平发表《孙子兵法的西夏译本残叶》《西夏文译本所存已失传的汉文类书》《梁武帝发愿文的西夏翻译》《〈十二国〉——保存在西夏译本中的汉文著作》《汉武帝〈秋风歌〉的西夏语翻译》等论文。1987—1989年克恰诺夫相继出版四卷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第一卷为研究篇，是他对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三、四卷为法律条文的俄译本和西夏文影印件。该书刊布并翻译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识别的《天盛律令》刻本，但缺少卷首《名略》及部分尚未释出的叶面。克恰诺夫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译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献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译文一同刊布的影印件让更多的人见到了《天盛律令》的原貌，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底本。

其三，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基本上是与西夏文文献同时进行的。苏联的伊凤阁、弗鲁格和法国的伯希和都进行过这项工作。1911年伊凤阁在《皇家科学院通报》第11期发表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这批汉文文献。1910年访问圣彼得堡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阅览了黑城文书，1914他发表《科兹洛夫黑城探险所获汉文文献》[3]，对科兹洛夫所获的23件黑城汉文文献作了介绍和研究。弗鲁格在长期整理编目的基础上，1934年发表《关于西夏刻印的汉文经文》《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写本非佛经部分概述》，1936年发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写本佛经简明目录》[4]。

系统整理、介绍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的是苏联的孟列夫，他充分利用列宁格勒（圣彼得格勒）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资料，在从事敦煌

---

①[俄]克恰诺夫《吴兢〈贞观政要〉的西夏译本残叶考》,《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

②[俄]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③《亚细亚杂志》1914年5—6月号:1—20页。

④《东方书目》第2—4辑,1934年;《东方书目》第7辑,1935年;《东方书目》第8—9辑,1936年。

文献研究的同时，整理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从1957年开始，孟列夫重新对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系统进行整理与研究。1961年，他发表了《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①]，1984年孟列夫出版《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科兹洛夫藏卷）[②]，该书的汉译本以《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为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孟氏将俄藏黑城出土的488件汉文文书拼合成375序号，进行了系统分类和详细叙述，不仅是对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所发掘的11—14世纪的汉文写本和木刻本的首次完整叙录，而且是孟列夫对藏卷内容分11类分别进行论述，对藏卷年代、性质、用途的考释既注意纸质、书法、术语、人名、地名等诸多方面，也与历史文献进行对比，得出许多中肯的结论。

其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这一时期，克平教授致力于西夏语言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她相继发表了《西夏语的范畴》（1968年）、《西夏语的及物表达》（1968年）、《西夏语的主格名词》（1969年）。1970年出版了她的硕士论文《带有三家注释的汉文兵书〈孙子〉西夏译文的版本考订和语法研究》。之后她又相继发表了《西夏语的希求结构》（1973年）、《西夏语动词的主宾语一致关系》（1977年）、《西夏语的主动结构》（1979年）、《西夏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1980年）、《再论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1982年）。1985年出版了她的西夏语言学研究专著《西夏语形态学（词法）》[③]，这部学术专著系统研究西夏语法（词法）的学术专著，尤为突出的是此书直接引用西夏文原文语句1001条，不仅是她的学术观点的有力支撑，同时也便于其他学者的引用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她发表的《西夏语的结构》

---

①[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聂鸿音：《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1989年)、《西夏语的动作趋向范畴》(1994年)、《西夏语成吉思汗名字的语源》(1999年)等,克平教授对西夏语法的研究,是20世纪西夏语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她对西夏语动词趋向范畴的发现和分析,在西夏学界和藏缅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力[①]。除克平教授外,其他学者也成绩斐然,如1964年出版了索弗罗诺夫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语语音研究》,用俄藏西夏文文献系统地研究西夏语音。1966年出版克罗科诺夫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译汉文经典》,介绍并刊印了俄藏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1968年克恰诺出版了《西夏国史纲》,1969年出版克平、克罗科洛夫、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克恰诺夫著的《文海》,俄译并刊印了俄藏西夏文韵书《文海》,为西夏学术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②]。

其五,西夏历史文化研究。1964年,克拉乌孙的《未来的西夏研究》[③]一书出版。该书包括“西夏语言”“西夏历史”等章节;1968年,鲁勃·列斯尼钦科和萨弗拉诺夫斯卡娅合作出版了《死城哈拉浩特》[④]。同年,克恰诺夫出版了他在西夏学方面的代表作《西夏史纲》[⑤],此书主要依据《西夏纪》等汉文史籍,并引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资料,对党项及西夏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汉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对党项族的影响、西夏国家的社会性质等,做了全面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同时,克恰诺夫还发表了许多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史料中关于唐古特人的民族学资料》《论唐古特人的起源问题》《西夏文化在亚洲中部文化中的地位》《作为历史资料的黑城西夏文

---

①《学术年会报告提要》,列宁格勒,1964年,第59—61页。

②[俄]索弗罗诺夫,克恰诺夫《西夏语语音研究》,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4年;克罗科诺夫,克恰诺夫:《西夏译汉文经典》,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6年;克平,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文海》(第1、2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9年。

③[俄]克拉乌松:《未来的西夏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

④[俄]鲁勃.列斯尼钦科等:《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

⑤见史金波、白滨:《国外研究西夏文、西夏史简况》,《民族译文集》1978年第3辑。

献》《论成吉思汗入侵后西夏人的历史命运》《哈拉浩特发现的1224年的西夏文文件》等多篇著作。

其六，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艺术品的研究。早在1909年，鄂登堡发表《黑水城出土的佛像》，并和伊凤阁、考特维奇合作出版《科兹洛夫黑水城所获文物》①，鄂登堡发表《黑水城佛教造像学资料：藏传风格图像学》②一文，其价值在于将藏传作品从整个黑水城出土的绘画中区分出来，同时依照佛教图像学，特别是藏传佛教图像对这些图像进行身份辨识并简略地分析风格流派，现在俄国学者对黑水城唐卡图像神灵身份的鉴定，大多遵从鄂登堡的解说③。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主要围绕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进行，通过对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登录、编目、序录，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对西夏文重要文献的译释、公布和对黑水城出土文物艺术品的研究等多方面的探讨，拓宽了俄国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随着西夏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日本、欧美一些国家也加入西夏学研究行列。

二、日本的研究

日本的西夏研究开展很早，19世纪末就有专家开始关注西夏，此后有许多著名学者也加入到西夏研究的行列里。目前收集到最早的论文是东洋史学的代表性人物白鸟库吉的《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④。在日本真正开始西夏研究，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著名学者石滨纯太郎，他在1925年首创"敦煌学"一词，并对西夏学也有开拓作用，成绩斐然。石滨纯太郎与苏联聂历山交往甚好，能通过聂历山看到西夏文献资料，为研究西夏文献洞开方便之门。1915年石滨纯太郎发表题为《科兹洛夫蒐集》的鲜为人知的西夏资料。⑤此后，陆续发表《西夏学小记》（读书

---

①《俄国民族学资料》第2卷，第79—157页，1914年，圣彼得堡。

②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③《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风艺术和文化部学刊》1940年第4期。

④[日]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学杂志》9编，11、12号，1898年。

⑤[日]石滨纯太郎：《科兹洛夫蒐集》，《东亚研究》5卷，5、6号，1915年。

随笔之二)、《西夏学小记小续》《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西夏文般若经的断片》《西夏语研究的话》《西夏文外典》等论文，对西夏文献进行深入研究[①]。石滨纯太郎还与聂历山合作，发表论文有《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国名补正》《西夏语译大方广佛寺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等[②]。西田龙雄是语言学家，他从掌握西夏语言文字入手，在日本开展西夏研究，收获颇多。他于1980年发表《幻的楼兰黑水城》，1981—1983年发表《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利用抄自苏联的资料，深入研究《五音切韵》，推动了西夏语的研究。1988年发表了《西夏语〈月月乐诗〉的研究》，对西夏文《月月乐诗》作研究。他又陆续推出《西夏文华严经》3册，翻译、注释了西夏文《华严经》卷1至卷11，并介绍和研究了其他一些重要西夏文佛经[③]。另外，日本宋辽夏金元史学者利用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的资料，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文书本身和相关问题进行探索，相继发表一批成果，著有《西夏纪念考》西夏语研究新论，发表《西夏语研究》(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西夏文华严经》《西夏文字》，还涉及西夏人生活习俗等方面研究；2003年近藤一成主持“黑水城出土宋代军政文书之研究”申请到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后，专门到中国陕北实地调查，并发表《〈俄藏黑水城文献〉宋西北边境文书裁判案件译注稿》(一)~(三)[④]，左藤贵保发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研究——以西夏榷场使关连汉文文书群为中心》。荒川慎太郎重点研究西

---

①《支那学》1卷3号，1920年；3卷2号，1922年。《龙谷大学论丛》，1923年。《艺文》18卷，1927年。

②《史林》15卷，1930年。《龙谷学报》1933年。

③[日]西田龙雄：《幻得到楼兰黑水城》，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0年10月；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期1986年。

④分别载《史滴》25号，早稻田大学东洋史垦话会，2003年12月；《史滴》26号，2004年12月；《史滴》27号，2005年12月。

夏语音，他在1997年著《西夏语通韵字典》，其中有105韵韵母推定音对应表、声母推定音对应表、包括1至105韵的通韵字典和《文海杂类》平声、上声的通韵字典，此外还有附录，诸如梵文音与西夏文字对应表、真言注文字一览表、反切上下字合成一览表、西夏语音节、声母加韵母结合表[①]。其他的日本学者长部和雄主要研究西夏历史文化和宋夏、辽夏关系，松田政著《西夏故城哈拉浩特调查概况》；松井太著《黑水城出土蒙汉合璧税粮纳入薄断简》[②]；刚崎精郎著有《党项古代史研究》，这些佳作的面世，为西夏学的研究锦上添花。

三、欧美研究

欧美学者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晚于中国，但较其他国家较早，是他们最先将西夏文字公之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1911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发表《A.I伊凤阁西夏史述评》，1914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撰文《科兹洛夫探察队在黑城所得汉文文书》，介绍俄藏黑水城文献。1950年，法国人史泰安发表《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对7—14世纪“弭药”这个词从指称党项人到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谓的漫长演变过程做了基础性的研究[③]。1961年，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新西兰人格林斯坦德，据以撰文《英国博物馆藏西夏文残卷》，介绍该馆收藏西夏文献情况。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发表有关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1年，新西兰人格林斯坦德出版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集中刊登了很多重要西夏文佛经。1972年，又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除文字分析外，还把西夏文《孝经》草书转写成楷书，他是第一位探讨西夏文草书的学者[④]。匈牙利学者玛利亚·范凌思（Maria Ferenczy），1989年《宁夏文史》第四辑刊出了她的《中国吏官

①《言语学研究》16号，1997年。

②《侍兼山论丛》第31号，大阪大学文学部，1997年12月。

③《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

④《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3—264页。

眼中的西夏国》一文的译文[1]，作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汉文史籍中的记载，认为这些记载可用来诠释许多西夏佚文残卷。美国学者邓如萍曾在1986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习西夏文，史金波先生担任她的导师，她专门系统地上了三个月的西夏文课，1996年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综合十多年个人研究成果，出版专著《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2]。作者大量利用西夏文原始资料，论述了11世纪下半叶的西夏前期史，认为"早期党项佛教史与西夏建国及夏主登基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分析其间的关系乃是理解党项佛教史或西夏政权史的前提"，提出把佛教和西夏政权的关系摆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她同时对1094年的西夏文、汉文碑铭分别进行了英译和详注，并设专节分析了碑文题款中人名和称号所反映的西夏官吏组织和民族成分。

第二节　中国大陆及港台研究

一、西夏文文献整理研究

我国对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罗振玉将《番汉合时掌中珠》照片于1913年在东京翻印，随后罗福成、罗福苌即对西夏文字着力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以《西夏译莲花经考释》（罗福成1914年）、《居庸关石刻》（罗福成，1932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罗福成，1932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西夏学论著，以及《番汉合时掌中珠》手写影印本（罗福成，1924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手写石印本（罗福成，1935年）。

1928年斯坦因出版了他在第三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四卷，在该书的第一卷第十三章中，介绍了对黑水城及周边地区

---

①玛利亚·范凌思著，霍升平，杨建明译：《中国史官眼中的西夏国》，《宁夏文史》1989年第4辑。

②《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的考察与发掘情况，并详尽介绍描述了数百件文物。1932年向达先生节译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取名为《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刊登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文末附有“斯坦因氏黑水所获西夏文书略目”，主要是带有佛画内容的残片。在同年出版的王静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辑中还收录了陈寅恪先生和王静如先生关于斯坦因黑水城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的残卷译释考证的文章。陈寅恪先生《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和王静如先生《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大般若经残卷考》，首次在国内披露、考证、整理了英藏黑水城文献《大般若经》的部分残卷。陈寅恪先生是在王静如先生对英国所藏文献译证研究基础上，简述了佛经译夏为汉的浩繁艰难、以汉证夏的勤苦精诚，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对译和意义的不同方法、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等和外国学者一起，共同把西夏学研究推向新阶段。正如俄国西夏学专家戈尔巴切娃所说的，西夏学的新阶段“是同聂历山、王静如、罗福苌和石滨纯太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令人遗憾的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使已经繁荣发展的西夏文化研究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西夏学逐渐得到复苏，20世纪60年代，西夏学家王静如先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出史金波、白滨等著名专家。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国学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开，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同音研究》（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类林研究》（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西夏谚语》（陈炳应）、《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译）、《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林英津）、《圣立义海研究》（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贞观玉镜将研究》（陈炳应），《夏汉字典》（李范文）。其中，《夏汉字典》是我国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学习

和研究。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天盛年间颁行的一部法典，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版本[①]，汉文本已佚，西夏文本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该法令共20卷，150门，1461条，没有注释和案例，全部是律令条文，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是研究西夏社会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资料。1987—1989年克恰诺夫相继出版四卷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②]，第一卷为研究篇，是他对法典的研究成果，第二、三、四卷为法律条文的俄译本和西夏文影印件。该书刊布并翻译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识别的《天盛律令》刻本，但缺少卷首《名略》及部分尚未释出的叶面。克恰诺夫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译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献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译文一同刊布的影印件让更多的人见到了《天盛律令》的原貌，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底本。

1988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克恰诺夫译本进行翻译，出版《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③]，遗憾的是只出版了前七章，后面的工作没能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专家利用克恰诺夫的影印件直接汉译，完成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1994年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出版[④]，从此中国读者能够看到这

---

①“西夏文专号”，193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西夏语研究小史》，《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律表”记载：合汉文奏副中兴府正汉大学院博士杨时中；译汉文者西京尹汉学士讹名□□；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通判芭里居地；译汉文者番大学院士磨勘司承旨学士苏悟力”，第108页。

②[俄]克恰诺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③[俄]克恰诺夫著、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7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部法律的全貌。

1998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八、九两册刊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刻本和五种写本，另收录二卷名略以及刻本零叶和写本残件[①]。史金波等先生据此对1994年出版的汉译本《西夏天盛律令》进行了五方面的修订：(一)补译了原来所缺的内容，包括卷首《天盛律令》名略二卷，卷十四《误伤杀与斗殴门》中新识别出的二十三条，以及少量刻本零叶和据写本新校补的残字；(二)删除了原汉译本中关于西夏字意的大量注释，仅在原件残缺或意义不明的地方出注；(三)参照当时西夏文献释读新成果改译了一些词语；(四)对一些句子的语序和标点进行了调整，以求译文顺畅；(五)将出现较多的法律术语和专有名词编成“译名对照表”，便于查阅[②]。

汉译本《天盛律令》开创了直接将西夏文法律文献译成汉文的先河，难能可贵的是，史金波等先生利用整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便利，通过西夏文佛经发愿文、夏译汉籍、西夏文字辞书、类书、诗歌等文献中的资料，解决了大量西夏法律术语和名物制度的翻译，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汉字诗歌等文献中的资料，解决了大量西夏法律术语和名物制度的翻译，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汉字译本，而且为后来翻译西夏文《亥年新法》《法则》等法律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解读西夏社会文书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迄今通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1993年陈炳应出版了《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将俄藏西夏文谚语《新集锦合辞》全部译成汉文，并用以研究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

199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后更名东方文献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整理

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八、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99年。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前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到21世纪初，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相继推出《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北方民族大学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也相继出版。

在文献的整理出版的同时，专题研究也全面展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学联合为基础，出版《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开展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宁夏大学以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为平台，积极开展联合研究，相继推出《西夏文献研究丛刊》，目前已出版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杜建录、波波娃主编《〈天盛律令〉研究》，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潘洁《〈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即将出版的有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研究你》、于光建《〈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翟丽萍《〈天盛律令〉职官门整理研究》、尤桦《〈天盛律令〉武器装备条文整理研究》、张笑峰《〈天盛律令〉铁箭符牌条文整理研究》。宁夏大学组织出版的《西夏研究丛书》，也有不少文献研究成果，加上没有纳入上述丛书的成果，有近百种之多，如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西夏文献论稿》《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等。

二、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

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相比，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研究较晚，这是因为，一方面学术界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兴奋点在西夏文文献上，另一方面没有公布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影印件，对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977年陈高华发表《亦集乃路河渠司文书和元代蒙古

族的阶级分化》[①]，这是对黑水城文献较早的研究成果。1980年陈国灿发表《西夏天庆典当残契复原》[②]，运用文献学方法，复原斯坦因所获的西夏天庆典当残契。近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也有“西夏天庆典当残契”，可以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1983年陈炳应发表《黑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书》一文[③]，对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到黑水城调查采集到文书进行了探讨。1983年和1984年两次考古发掘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着手文书的整理修复，198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文物》第7期发表《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同期发表的还有李逸友《黑水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

1991年李逸友集中发表了《元代文书档案制度举隅——记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元代文书》《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黑城出土的元代律令文书》[④]，同年他还出版了《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⑤]。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黑城出土文书综述”，包括黑城出土文书概况、亦集乃路的居民和建制、亦集乃路的农业和商业、亦集乃路的财政经济、亦集乃路的站赤、亦集乃路的社会情况、亦集乃路的儒学和文化、亦集乃路的宗教信仰及其他、元代的诏赦律令、元代的票引契券、北元初期的新史料等方面。下篇为“黑城出土汉文文书录文”，分卷宗、人事、民籍、军政事务、农牧、钱粮、俸禄、诸王妃子分例、军用钱粮、官用钱粮、律令与词讼、站赤、票据、契约、书信、儒学与文史、杂类、佛教等19类，收录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760件。另附191件黑白影印件。

这是对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释，功不可没，

---

①《文物》1977年5期。

②《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

③《考古与文物》1983年1期。

④《档案学研究》1991年4期；《中国钱币》1991年3期；《文物》1991年7期。

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许多研究者根据该书的录文与影印件，发表相关研究文章。若从文献资料上看，该研究成果还有许多不足：第一，在2200多件汉文文书中，它只选录了1/3，即760件，缺乏完整性；第二，它只附了191件原件，大部分录文无法根据原件校勘；第三，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191件图版均不太清楚，特别是文书上墨印与圈点的色彩，一件文书上前后不同时间的书写，都无法表现出来。所有这些，极大地限制了对这批文献的研究与利用。

但它毕竟公布了191件原件和部分录文，这是对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功不可没，许多研究者根据该书的录文与影印件，加之1996年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出版[①]，学界掀起了一个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小热潮，先后发表的论文有近百余篇，如张培瑜、卢央《黑城出土残历的年代和有关问题》[②]，杨选第《元代亦集乃路的民间借贷契约》[③]，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述要》[④]，刘晓《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户籍制度》[⑤]，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义〉残片考》[⑥]，邱树森《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⑦]，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⑧]，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⑨]，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⑩]，吴宏岐《〈黑城出土文书〉中所见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渠道

---

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年。

②《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

③《内蒙古师大学报》1996年3期。

④《宋史研究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⑤《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6期。

⑥《北方文物》2001年1期。

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3期。

⑧《敦煌研究》2001年1期。

⑨《文物》2001年10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5期。

及其相关问题》[1]，王铭《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上总管府具保结呈考辨》[2]，金滢坤《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3]，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4]，马彩霞《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经济文书的考释》[5]，陈志英《〈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十二月亦集乃路刑房文书〉初探》[6]，石坤《从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的西夏遗民》、马格侠《俄藏黑城出土写本〈景德传灯录〉年代考》[7]，段玉泉《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243号残页补考》《黑水城文献〈初学记〉残片补考》《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8]，杨浣《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9]，张廷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佚词》[10]，汤君《黑城文献〈庄子义〉考》[11]，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12]，惠宏《英藏黑水城文献Or8212/1343号脉法残片考——兼论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的互串问题》[13]，刘秋根、杨小敏《从黑城文书看元代官营酒业的变化》[14]，杜建录《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考释》《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刘寨杀了人口状考释》《西夏乾祐五年验伤

---

①《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2期。

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2期。

④《敦煌研究》2004年2期。

⑤《西域研究》2004年4期。

⑥《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5期。

⑦ 均载《敦煌学辑刊》2005年2期。

⑧《文献》2005年4期；《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1期；《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3期。

⑨《中国史研究》2006年1期。

⑩《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1期。

⑪《敦煌学辑刊》2006年2期。

⑫《历史研究》2006年5期。

⑬《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⑭《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1期。

单考释》《西夏天盛十五年贷钱文契考释》[①]，陈瑞青《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贴黄制度》《关于一件宋代军政文献的考释》[②]，崔为、王姝琛《黑城出土的〈伤寒论〉抄页》[③]，邓文宽《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1210）具注日历〉残片考》[④]，张国旺《俄藏黑水城TK1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⑤]，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⑥]。

孙继民以黑水城文献为对象，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独立或合作发表《黑水城所出宋赵德诚家状试释》《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王庶被拘事件》《试释几件俄藏黑水城宋鄜延公文草稿》《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俄藏黑水城金代毛克文书初探》《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等文章[⑦]，并提出了"黑城学"的观点[⑧]。《河北学刊》2007年4期以"异军突起的黑水城文献学与宋夏金元史研究"为题，发表系列文章[⑨]。

---

①《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2期；《西夏学》第四辑。

②《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2期；《文物春秋》2007年4期。

③《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年3期。

④《文物》2007年8期。

⑤《西域研究》2008年2期。

⑥《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2期。

⑦分别见《敦煌学辑刊》2002年2期；《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西夏学》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2期；《历史研究》2007年4期；《中国史研究》2007年4期。

⑧《黑城学：一个更贴切的学科命名》，《河北学刊》2007年4期。

⑨史金波：《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白滨：《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孙继民：《黑城学：一个更贴切的学科命名》；杨倩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

杜建录主张“大西夏学”研究，认为党项与西夏的发展壮大与消亡与唐五代宋辽金元诸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和汉、吐谷浑（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立起多方面的联系，西夏统治敦煌200年，敦煌西夏艺术是西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西夏的国教，上层僧侣被尊为帝师，保存下来的西夏文献，佛经占了绝大部分；敦煌归义军政权的政治、经济制度对西夏占领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反之，元朝亦集乃路的社会生产与经济关系，无不打上西夏黑水城的烙印。因此，西夏学的研究离不开唐五代宋辽金元史、藏学、蒙古学、敦煌学、佛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支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积极实践这一主张，在鼓励研究生毕业论文以西夏文文献研究为题的同时，还支持以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为题[①]，并得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塔拉所长的支持，搜集到该所收藏的资料数据。随后在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高国祥主任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批珍贵文献的整理出版。

近年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发表的有关黑水城文献研究论文有潘洁《黑城分例文书中的属相纪年》《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初探》《元代亦集乃路大王妃子分例文书复原》《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②]，侯爱梅《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③]，徐悦《黑城所出F116W115号提调农桑文书考释》《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④]，王亚莉《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件站赤文书考释》[⑤]，刘永刚《对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婚

---

①潘洁：《黑水城赋税文书研究》；侯爱梅：《失林婚书案文卷研究》；王亚莉：《黑城出土元代站赤文书研究》；徐悦：《从黑水城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的农业》；尤桦：《从黑水城文献看元代亦集乃路地方文书制度》；王艳梅：《元代亦集乃路地方政府建制研究》。

②《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4期；《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2期；《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1期；《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2期。

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2期。

④《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4期；《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3期。

⑤《内蒙古师大学报》2008年1期。

姻文书的考释》[1]。

2010年在文献整理出版基础上，杜建录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2009年承担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项目“黑水城文献与西夏文化研究”，2011年承担中俄人文合作研究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子课题“黑水城汉文出土社会文书整理研究”，目前《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即将付印。另外，杜建录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最终成果《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西夏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的西夏历史早在宋辽夏金时期就已开始，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史研究起步较晚，黑水城文献出土后，学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文献上，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门从事西夏历史研究只有吴天墀先生，他历经磨难，直到80年代初才出版《西夏史稿》。20世纪80年代，我国西夏史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西夏专史研究成果除吴天墀《西夏史稿》外，还有林旅芝《西夏史》，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编），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伟洲《唐代党项》，李蔚《西夏史研究》《简明西夏史》，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西夏学概论》，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经济史研究》，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全卷）。另外，《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

[1]《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4期。

夏纪事本末》等几部重要的汉文史籍相继点校出版。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21世纪初，我国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也有大量成果，如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干问题探索》，汤晓芳《西夏艺术》，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会》《西夏文化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书校补》，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蔡崇榜、王曾瑜《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李华瑞《宋夏史研究》，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杨浣《辽夏关系史》，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鲁人勇《西夏地理志》，于光建《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聂鸿音出版《塞北三朝》，《中国风俗通史》西夏风俗卷。

《西夏史稿》是在西夏史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系统介绍了西夏王国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社会形态，深刻剖析了西夏王国前后期的政治概况及其与两宋、辽、金之间的军事战争和对外关系。作者超越了前人狭隘的民族观念，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为原则，审慎采择既定史料和前人成说，合理运用最新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发表了诸多独具慧眼的新见。该书在判定史实时力求言必有据，征引了大量旧集，叙述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流畅，至今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夏研究史重要著作。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中下三卷，共计9册，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传记类，收集党项、西夏专传和碑传，第二部分是人物传志，收集党项、西夏人物的传记、碑铭、墓志等，第三部分为散见资料编年辑录，收集散存资料，按年代编纂。前两部分约占全书总篇幅

的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均为编年辑录。《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在编纂上有三个特点：一是搜集史料广博，从数百种文献中选取资料，二是在史料的抉择去取上精审，三是校勘、考订缜密，或将记载同一件史实的不同史料互相对照，订正某些史料的错误；或对史料进行分析，指出其中误记之处；或通过分析、对照，订正某些史实发生的时间；或引证多种史料，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考证。

《西夏经济史》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西夏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和以生产资料占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全书十一章，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党项建国前社会经济和夏州拓跋政权奴隶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形态；第二部分从自然环境、气候、物产、交通、人口、民族以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讨论了西夏的生存环境与立国规模；第三部分论述了农牧业的发展状况与发展原因，认为农牧并举的半农半牧经济构成了西夏的经济基础。

《西夏社会》是一部反映西夏社会面貌的历史资料大全集。它探讨了我国古代西夏社会的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商业、借贷、社会结构、法律、职官、军队、文化教育、艺术、科学技术、宗教信仰、饮食、服饰、居室、行政区划和交通行旅、婚姻、妇女、生育和医疗保健、丧葬、礼仪风俗、西夏后裔等内容，历史文献丰富，内容翔实，真实再现了西夏社会的全貌。

《西夏艺术史》是目前关于西夏艺术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通过系统整理资料，第一次构建了西夏艺术体系，深入解读和分析了西夏各类具有代表性艺术品的内容和特征，从理论上深化对艺术史的认识，从而深刻阐明了西夏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既折射出众多民族艺术元素的交流与融合，又充分体现了西夏艺术内涵丰富的民族个性。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合作出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该书跨越西夏学、突厥学和印刷史学，利用藏于中国和俄国的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和藏于法国和中国的1000多枚回鹘文活字印刷实物系统论述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问题，在学术探讨的

同时，维护了中国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①。

四、台湾西夏研究

台湾的西夏学专家多年来对西夏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民信教授研究西夏历史，发表论文多篇。龚煌城教授致力于西夏文字、语言的研究，发表论述多种，他结合西夏语法研究西夏语音，取得重要成果，如1982年发表的《西夏文字结构》、1985年发表的《西夏文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9年发表的《通过西夏音韵转换的考察构拟西夏语音系统》，都很有学术价值，可以说他对于西夏语音的研究取得了最好的成就②。林英津是龚煌城博士，1994年出版了《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两册，翻译、考证了西夏文《孙子兵法》残卷，并从语言上进行分析、研究，深化了对西夏语的认识③，另发表系列论文。张榥琪是龚煌城博士后，专注西夏语言研究，发表系列论文；胡进杉专注西夏佛教文献研究，出版《西夏佛典探微》④，围绕西夏佛教文献，发表系列论文。

五、西夏文物考古与研究

20世纪以来，我国西夏文献发现层出不穷，继1908—1909年沙俄大佐科兹洛夫和1914年英籍斯坦因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掘走大量西夏文献。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两大箱西夏文经卷。1941—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挖掘中，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献。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亥母洞中发现西夏时期夏、汉文书、佛画、发愿文、医方、占卜辞、日历、以及牛皮靴、石纺轮等近百件文物；1972—1975年

---

①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龚煌城：《西夏文字的结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2年；龚煌城：《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6本第4分，1985年；龚煌城：《通过西夏音韵转换的考察构拟西夏语音系统》，《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6本第1分，1989年。

③林英津：《孙子兵法西夏译本中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8本第2分，1987年；林英津，安可思：《〈类林〉西夏译本之研究》，《大陆杂志》第84卷第5期，1992年；林英津：《〈孙子兵法〉研究》（上册、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

④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以及近年对银川西夏王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基本上考订出帝陵9座，陪葬墓140余座，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金银饰物、竹木雕刻、丝绸织物以及鎏金铜牛、妙音鸟等珍贵文物；1964年与近年两次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遗存进行了全面考察，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确定了百余座西夏时期妆饰或开凿的洞窟；1983—1984年对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出土近3000份文书；1984—1986年宁夏灵武磁窑堡西夏窑址的发掘，出土生活器皿、文房用具、娱乐用品、建筑材料、生产工具等2500余件；1990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大量西夏文雕版、彩画版等珍贵文物；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口方塔出土9册10万字西夏文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还发现了许多西夏时期的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窖藏，出土了大量钱币、瓷器、官印、符牌、壁画、岩画、版画、碑刻、佛经、雕塑等文物。

如果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之前出土的文献除1917年宁夏灵武县外，大部分流失域外，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等。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及建国以后出土的西夏文献主要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及相关省（区）、市、县（旗）文物考古部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和西夏学界围绕上述考古发掘，发表文物考古文字数百篇，出版李范文《西夏官印汇考》，李范文《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马文宽《宁夏灵武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考古发掘报告》，韩小忙《西夏王陵》，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宁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甘肃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编《西夏文物》（多卷本），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宁夏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管理处《西

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西夏陵管理处《西夏陵》等著作。

第三节　西夏学研究机构

我国历史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在历史上存在时间长短，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为中华文明的多彩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西夏文化就是为中国文化研究增砖添瓦。西夏学不仅可深入认识西夏本身，还能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做出贡献。正因为西夏文化是中华多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和西夏文化有某种亲和力，西夏研究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

1997年成立，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心聘请国内外西夏专家为学术委员、编辑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西夏学领军人史金波教授任中心主任。20世纪60年代，著名西夏学专家王静如先生招收研究生，培养年轻一代西夏研究人员，经过50多年不断发展，成为西夏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培养出史金波、马忠建、孙伯君等一批硕博士生，接受美国、俄罗斯的专家和国内学者研修，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等一系列国家和院研究课题，整理出版大型文献著作《俄藏黑水城文献》，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宁夏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编纂出版《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西夏文物》《西夏学文库》，先后推出《文海研究》《西夏佛教史略》《类林研究》《西夏文化》《党项史研究》《元昊传》《西夏社会》

《西夏文献论稿》《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重要著作，其中《西夏经济文书研究》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是和学院平行的实体学术单位，“长江学者”、西夏学领军人杜建录教授任院长，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7人，兼职研究人员16人。其前身是1991年成立西夏研究所，2001年更名西夏学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教育部批复更名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设有中国少数民族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国古代史硕士点、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少数民族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和自治区重点学科、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学人才高地，牵头建设“中国民族史学理论与回族西夏史”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和自治区“民族学国内一流学科”，接受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研修。

研究院以教育部人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平台，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博物馆、宁夏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完成教育部系列重大重点项目，编纂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等大型文献丛书。组织出版《西夏研究丛书》《西夏文献研究丛刊》，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出版《西夏文物》《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西夏学文库》。编辑出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科刊物《西夏学》，出版《西夏学概论》《西夏经济史》《党项西夏文献研究》《西夏艺术史》《西夏社会文书研究》等百余种著作，其中《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慈悲道场忏法〉西夏译文的复原与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在杜建录院长的主持下，完成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史学文本创作，出版《神秘西夏》与《正说西夏》系列丛书，使西夏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目前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夏通志》（杜建录）、教育

部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大辞典》（史金波）、《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陈育宁）。

三、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

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是中俄人文合作框架下研究机构。2009年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中方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亲切关怀下，按照教育部国际司的要求，宁夏大学成立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分别挂靠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方所长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俄方所长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合作研究、举办国际学术论坛、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等等。以中俄（俄中）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为平台，组织两国学者开展"黑水城出土社会文书整理出版""俄藏西夏文献文物整理研究""西夏研究资料数据库""俄文西夏学著作汉译""汉文西夏学著作俄译"等项目。

迄今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为依托，连续举办5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出版《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西夏社会文书研究》《西夏文献论稿》《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天盛律令〉研究》《西夏佛典探微》《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即将出版的有《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研究》《〈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天盛律令〉职官门整理研究》《〈天盛律令〉武器装备条文整理研究》《〈天盛律令〉铁箭符牌条文整理研究》。

四、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宁夏社会科学院成立时就设立历史研究所，西夏学研究是其重要研究方向，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曾任所长，建所几十年来，承担一系列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出版《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西夏语比较研究》《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夏汉字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西夏通史》《西夏研究》，正在进行《西夏学大辞典》

编纂。《夏汉字典》荣获第四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西夏通史》荣获第五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主办《西夏研究》学术刊物。

五、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虽然成立较晚，但21世纪初该校就大力支持回族研究、西夏研究的支持，相继整理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日本藏西夏文献》等大型文献著作，现有多名专门从事西夏研究的专家，招收西夏学硕士研究生。

六、阿拉善盟西夏研究中心

2015年6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教学科研基地在阿拉善博物馆挂牌成立。2016年 8月，阿拉善盟西夏研究中心成立。在盟委、行署和盟文广局领导的重视下，阿盟西夏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项目研究、学术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人才培养方面：利用中组部“西部之光”人才培养项目，选派学术骨干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修，随后继续选派骨干到西夏学研究院访问学习；在项目研究方面：积极利用出土文献和西夏学研究院的资料，开展《百年西夏学》等课题研究，时机成熟后积极申报自治区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学术交流方面：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黑水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教育部）重要学术活动，通过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将国际学术品牌引进阿拉善，提升了阿盟的国际影响。在成果出版方面：编纂出版《黑水城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初步确定《走进黑水城》（大型图录）、《阿拉善西夏遗址调查研究》《百年黑水城》《内蒙古西夏遗民研究》四种著作，打造阿盟自己的历史文化品牌。

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教学科研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不仅重视学科建设，而且积极纵向与文博部门、西夏遗址点紧密联系，先后与宁夏博物馆、银川西夏博物馆、武威

西夏博物馆、银川贺兰口岩画管理处、统万城遗址、黑水城遗址、阿拉善博物馆等建立教学科研基地关系，从而使这些承载着千年、万年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文化共享资源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更多人了解神秘西夏王朝的一扇悠远而深邃的窗户。

第四节　西夏学园地

一、学术期刊

1.《西夏学》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辑刊，2007年创刊，一年出版2辑，每辑50万字左右，杜建录教授主编，是西夏学研究唯一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现出版14辑。集中发表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艺术、文献、语言、文字、文物、考古以及西夏学学术史与黑水城研究等方面的文章。《西夏学》纸质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网络版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www.sinoss.net；www.sinoss.com）发表。“中国知网”（中文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

2.《西夏研究》　每年发行4期，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设西夏历史、西夏文化、西夏语言文字、西夏文物考古、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西夏移民调查研究、西夏人文旅游、宋辽金元史、北方边疆民族史等栏目，主要刊登国内外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宋辽金元史研究、民族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3.《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水平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为“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综合全文数据库CNKI》来源期刊”。1982年创刊，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设有哲学、西夏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十多个栏目。内容主要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学、教

育、管理、书评等。

4. 《宁夏大学学报》　宁夏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为“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固定辟有西夏研究栏目，定期定量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西夏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代表了国内西夏研究的基本水平，被称为中国西夏学的窗口。

5.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固原师专学报》）一家长期发表西夏研究成果的学术信息载体。创刊于1980年，1984年正式介入西夏学科建设。1987—1993年是其迅速发展的时期，六年间共发表西夏论文35篇。1994—1996年，呈现徘徊状态，1997年以后，进入繁荣时期，研究的范围也由最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20年来，其西夏研究始终坚持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宗旨，坚持学术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独特风格，为西夏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赢得学术界的关注和赞誉。

二、西夏学丛书

1. 《西夏研究丛书》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是西夏学界最早的研究《丛书》，先后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选题包括西夏学学科概论、西夏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文献、诗歌、出版、印刷、西夏文献数字化以及明清西夏研究著作整理点校。1995年出版的第一辑和1998年出版第二辑，均为宁夏大学研究人员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立后，面向国内外西夏学学界征稿，现已出版5辑27种。

2. 《西夏研究》　宁夏社会科学院编，李范文主编，出版8辑，第1辑是由李范文、韩小忙合著的《同义研究》，第2辑是李范文《五音切韵与文海宝韵比较研究》，第3辑是《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辑是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罗福颐父子四人西夏研究专辑，第5辑是王静如西夏学专辑，第6辑是苏联西夏学专家聂历山《西夏语文学》，第7辑是日本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第8辑是台湾西夏学专家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和林英津《西夏语译

〈真实名经〉释文之研究》。该丛书最大亮点是整理、翻译罗氏父子、王静如等第一代西夏学专家的成果和聂历山、西田龙雄、龚煌城等俄、日和中国台湾著名西夏学专家的成果。

3.《西夏文献研究丛刊》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开始出版，杜建录主编，2013年又将中俄人文合作研究课题“西夏法律文献研究”“西夏文献专题研究”纳入《西夏文献研究丛刊》出版计划，由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长杜建录教授和俄方所长波波娃教授共同主编。目前相继出版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杜建录、波波娃主编《〈天盛律令〉研究》、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潘洁《〈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即将出版的有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研究》、于光建《〈天盛律令〉典当借贷门整理研究》、翟丽萍《〈天盛律令〉职官门整理研究》、尤桦《〈天盛律令〉武器装备条文整理研究》、张笑峰《〈天盛律令〉铁箭符牌条文整理研究》等。

4.《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史金波主编，杜建录常务副主编。该《丛书》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成果汇编，由资深专家史金波、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以及和彭向前、杨志高、梁松涛、佟建荣、王培培等中青年专家撰稿，集中推出西夏文教程、西夏建筑、西夏佛教文献、夏译汉籍、西夏医药文献等领域研究成果。

5.《西夏学文库》　分著作编和论文编，著作编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编，杜建录、史金波主编，论文编由《西夏学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编，史金波、杜建录主编，全书共100册，首辑20册。结合新出土西夏文献，以系统详尽的学术考察和多方论证，立足西夏研究领域的新史料和新问题，对西夏王朝兴衰演变的历程及西夏文明的概

貌作了全新的研究。全书是多视角、多维度、全方位展现西夏文化的精品力作，对于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推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 学术会议

一、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 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5年8月22日至26日在西夏古都银川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把西夏学研讨会规模从国内扩展到国际。研讨会由宁夏社科院牵头，与宁夏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银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俄、日、美、韩、德、法等国的学者和我国大陆及台湾学者共150多人聚集西夏故都，与会的著名西夏学专家有俄罗斯的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克平，美国专家林瑞宾、邓如萍教授，日本的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中国的史金波先生、白滨、李范文等。时任银川市委书记、学者陈育宁教授参加了会议，他在开幕式上提出“把宁夏银川变成西夏学研究中心”的设想，让与会者很受鼓舞。

大会安排了四次学术交流，各国学者的报告既有宏观的深入讨论，也有某一方面微观分析，研讨视角从族源族属、兵制战争、民族关系、宗教人口、社会文化等八大领域，进行认真又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

2. 第二届西夏学国际研讨会 2005年8月17日至19日在银川举行。这次研讨会由宁夏社科院主办，银川市人民政府、宁夏人民出版社、宁夏博物馆、圣雪绒国际企业集团协办，并得到了银川西夏王陵管理处、沙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宁夏西夏贡酒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及宁夏正丰建设集团的大力支持。来自俄、美、德、法、日、韩和国内以及台湾的学者14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化研究进行热烈讨论，比较集中关注的话题主要有西夏国兴盛的历史原因，关于西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问题，有关佛教文化与西夏的关系，关于西夏法律制度对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西夏文献研究问题、西夏语言研究问题。台湾著名西夏学专家龚煌城先生在研讨会上指出，应把西夏语也放进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原则上应尽量取材于保存最古老阶段文献的语言。他认为，西夏语是已经消亡的古语，根据文献资料研究古代语言，与调查研究现代语言各有各的优点和困难。研究西夏语最大的困难，便是受到现存文献材料的限制。西夏国曾集国家之力编写字典、韵书，大规模地翻译佛经与汉文典籍，有大批的文献，这是西夏语研究的优势。

3. 第三届西夏学国际研讨会　2008年11月8日至10日，第三届西夏学国际研讨会在黄河岸边的西夏城景区召开。研讨会由宁夏社科院主办，宁夏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国际西夏学研究所和宁夏西夏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来自俄、德、日、蒙古、澳大利亚等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代表116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国际著名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索弗罗诺夫、荒川慎太郎等，大陆西夏学著名学者李范文，台湾地区西夏学专家林英津、胡进杉等与会。

如何把西夏文化与旅游开发联系起来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代表们认为西夏文化具有多元性、神秘性、鲜明的地域性、多民族性，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与会学者对西夏历史在中国历史和宁夏历史上的地位给予新的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各民族一起创造辉煌的华夏文明，研究西夏文化对于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团结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回顾历史服务现实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会议上，为设在西夏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夏学研究基地和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学研究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二、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重要学术活动，得到中俄合作委员会（副总理级）国际合作

项目的支持。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

1. 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0年10月15日至10月18日“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揭牌仪式”在宁夏大学召开，有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莫斯科大学、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及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社科院单位的近一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宁夏大学教授陈育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等百余位代表应邀出席，“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中方所所长杜建录教授与俄方所所长波波娃教授共同为联合研究所揭牌。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90余篇，经过主办方的悉心筛选，入选论文内容涉及广泛，如西夏佛教文献、世俗文献研究，西夏佛教史研究，西夏职官制度研究、西夏军事研究、西夏考古研究等领域。原始资料的刊布和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此次论坛有多位学者对黑水城出土文献进行了介绍和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117号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进行了翻译、校注，并对卷尾发愿文进行了考证，指出这部佛经是以贺宗寿为首的西夏大臣们于1193年11月3日出资刊印的，目的是在纪念仁宗皇帝的“三七”法会上散施。每场会议发言结束后，都预留有自由提问讨论时间，不少青年学者积极踊跃向专家学者探讨学习，会场学术气氛浓烈。

2. 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1年8月17日至21日“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西夏文化产业研讨会”在甘肃省武威市召开。这次国际学术论坛是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和甘肃武酒集团联合主办，来自俄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国内各省的120多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06篇。围绕西夏民族、地理、社会、宗教等各方面及西夏文化产业开发等内容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论坛分西夏历史文化、西夏语言与西夏文文献、西夏汉文文献与文物考古三个小组对涉及西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碑刻绘画艺术、宗教等方面研究进行了讨论和交流，这次会

议使用大量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进一步推动西夏研究的国际化、规范化。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西夏文化产业化座谈会，企业家、政府领导、西夏学专家学者三方围绕西夏文化产业化展开对话，探讨了近年来西夏文化产业的成功和不足。

3. 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3年9月18日至21日，“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及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与台湾、澳门地区的100余位西夏学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受邀参加论坛。论坛上共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包括西夏文献资料整理研究、西夏文物艺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专题研究、西夏学学科地位暨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西夏文献数据库建设、王静如教授学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主题内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西夏学研究领军人物史金波教授介绍，西夏学是一门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结合的交叉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有新研究成果出炉或新的研究材料出土。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及研究界新人辈出，西夏学与敦煌学一样进入了持续发展繁荣期。他说：“我国西夏学界正在研究最难啃的西夏文草书文献，取得了初步成果，无疑走在国际西夏学研究的最前沿。”

4. 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5年8月16日至18日，“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河西历史文化研讨会”在甘肃省张掖市召开。本次论坛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河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河西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来自俄罗斯、日本、法国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120名专家参加会议。论坛围绕西夏文献资料整理研究、西夏历史文化专题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西夏文物遗址研究、西夏文献数据库建设、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六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次论坛最显著的特点是专家们利用新发现的西夏文献、文物考古资料，提出了许多新的真知灼见。同时，本届论坛主办方之一的

河西学院，在基于河西走廊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其在中国历史、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多年来在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特色学科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提出了建立“河西学”构想，得到中外与会专家的积极响应，并就有关构建“河西学”的合理性以及当前需要克服的困难展开了热烈交流。有关人士指出，本届论坛的成功召开不仅进一步推动了西夏学研究的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同时对今后深入研究“河西学”也大有裨益。

5.第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　2017年8月11日至16日，“第五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黑水城历史文化”在阿拉善盟召开，会议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由阿拉善盟文物局、阿拉善博物馆承办。来自俄罗斯、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120名专家，围绕西夏历史文化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西夏文献整理研究、西夏文物考古研究、西夏学数字化建设、阿拉善盟及黑水城历史文化研究展开热烈讨论。会议期间实地考察黑水城文献发现地。

三、其他学术会议

1.首届西夏学研讨会　1981年8月，宁夏社科院与宁夏历史学会在宁夏宾馆召开首届中国西夏学研讨会，这是首开先河，具有第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出席大会70余人，提交论文40余篇。它开拓与推动作用已载入西夏学研究的历史。

2.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西夏建都兴庆府960年学术讨论会　1998年8月在银川举行，中国宋史研究会、宁夏大学主办，本次会议议题除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还集中讨论了西夏历史文化及其贡献。

3.“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9月16日—19日，在黑水城文献出土地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召开。此次会议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额济纳旗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美国、

日本、俄罗斯和国内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额济纳，围绕黑水城历史文献与考古、黑水城地理环境与水文水利、黑水城文化艺术、黑水城与居延文明、黑水城与额济纳社会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

4. “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　2007年4月13日至15日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在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黑水城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衔接、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研究等方面展开讨论。纵观此次研讨会，有一大亮点，就是利用黑水城汉文文献对宋夏金元史诸朝的一系列问题，如宋代历书形成时间及性质、宋代西北军事形势、西夏时期的奴隶制度、元代俸禄制度等方面展开讨论。且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所收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论文时间跨度大，涵盖广；二是这批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论文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职官、隶书等诸多方面；三是与会学者年龄梯度合理，可以预期，大批青年学者投身于黑水城文书研究中，为以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5. 丝绸之路与西夏文明国际学术会议　2007年4月24日至30日在俄罗斯院圣彼得堡召开，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英、俄、印度、匈牙利等国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丝绸之路与西夏文明展开热烈讨论。

6. “黑水城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8年4月7日河北社科院举办了“纪念黑水城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就黑水城文献发现的意义、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趋势、黑水城文献的性质，以及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整理和出版过程展开热烈的讨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华瑞认为，西夏文文献的发现有几点意义。首先，从宋史的角度说，黑水城文献发现之前，西夏史研究主要依据宋人编撰的文献。宋人很关注西夏，不管是国史还是文集笔记都有很多资料。宋和夏灭亡后，元朝修的《宋史》中有《西夏传》，辽金史立有外纪。到清朝，陆续出现了《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等著作。清人编写的书，大部分都是根据宋人文献，这样会影响

到我们对西夏的认识程度。黑水城文献的出现，为利用西夏自己的文献、文物解读西夏历史，提供了条件。随着黑水城文献的解读逐步深入，对西夏史的研究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7.纪念黑水城文献出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8年12月16日至17日在银川举行，研讨会由宁夏大学主办，来自北京、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就会议，研讨会围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展开热烈讨论。

8.“黑水城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2009年7月是黑水城文献主体发现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重大发现，从而进一步推动新时期黑水城文献研究向纵深发展，2009年7月21日至23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河北社会科学院联合在石家庄召开这次研讨会，并同时举行黑水城学研究中心挂牌仪式。来自俄罗斯、中国台湾、北京、宁夏、陕西、甘肃、湖北、山东及河北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共提交48篇论文。研讨会围绕黑水城考古与发现、黑水城文献的史料价值、黑水城文献与唐、宋、夏、金、元史研究、“黑城学”提出的意义及其理论价值、“黑城学”研究展望、唐、宋、夏、金、元社会历史研究几方面展开讨论。

9.“韩中第四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大会”　2011年11月11日至17日在韩国首尔召开，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韩国中央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与会50多位专家围绕宋辽夏金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献等领域展开热烈讨论。杜建录教授发表“党项西夏文献研究”学术报告。

10.“西夏与契丹文献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2012年3月22日至26日在东京召开，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邀请和资助，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专家2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杜建录、索罗宁等作为自由评论员，应邀出席在学习院大学召开的“第十二回辽金西夏史研究会大会”。

11.“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2年7月

30日至8月4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在山东烟台隆重召开“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北等专家学者20人参加。研讨会围绕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展开讨论。

12. 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在成都召开，研讨会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本次会议聚集了西夏学、宋史、元史和其他学科的众多一流专家和中青年优秀学者，阵容强大。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等40多个研究、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吴先生亲属及生前友好共12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共收到交流文章90篇，内容涉及对吴先生生平的追忆与思考、吴先生做出巨大学术贡献的西夏学和宋史领域及其他多项专题，内容丰富，质量很高。本次大会的成功召开，是对这位长期辛勤工作在四川大学的历史学家的告慰。

13. “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博士后论坛　2014年10月11日至13日在宁夏大学召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主办，宁夏大学承办，来自俄罗斯、中国北京、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江苏等省区的70余名博士后、博士、青年专家与会，会议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由著名学者史金波、陈育宁、波波娃、杜建录讲座，第二阶段是青年学者围绕黑水城文献与西夏社会历史研究展开热烈讨论。

14. 党项史迹与陕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5年8月3日至5日在陕西榆林召开，由陕西省横山县主办，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和榆林学院政法学院协办，来自全国6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党项与陕北文化、陕北地区党项史迹的探讨、陕北地区党项遗存的保护与开发、党项及西夏研究中的其他问题的探讨等四个研究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党项族是唐宋时期活动于我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在陕北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与宋、辽、金鼎立的西夏王朝。其中今天的横山县一带是其在陕北的落脚点和根据地，盘踞这里近500年，横山是党项人

的第二故乡，西夏政权的发祥地，给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李继迁的出生地古银州，闻名遐迩的神奇的李继迁寨，宋夏对峙的著名古战场永乐城、狄青塬、种鄂台，无不诉说着传奇的党项史。研讨会希望横山能够珍惜交流成果，要在党项民族在陕北地区的史实和史迹的探讨和梳理上多下功夫，并加大横山党项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横山政协党项文化研究小组认真做好汇集编排，真正让此次研讨会转化成为横山打造地方党项历史文化名片的有影响力的推手，为陕北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横山党项文化的研究，点燃一盏学术的明灯，指引这项研究工作不断深入，逐步唤醒横山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而能够细分总结陕北区域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汲取历史养分，继承优秀文化基因，为新时期社会建设和地方综合发展提供积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著名学者陈育宁、高建群、周伟洲、杜建录参加参加研讨会及相关活动。

15. “北方民族与丝绸之路”博士后论坛　2015年10月9日至12日在宁夏大学召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主办，宁夏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社会科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上海传媒研究院、天水师范学院、宁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80多位博士后、博士以及青年教师提交的论文50多篇，论坛围绕北方民族与丝绸之路进行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本届论坛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教授、宁夏大学陈育宁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宁夏大学杜建录教授等著名学者分别就草原民族与丝绸之路、中国民族史与丝绸之路、宋辽夏金元时期的丝绸之路等问题进行专题讲座。第二部分是与会的博士后、博士及青年学者就北方民族史、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交通、城镇、商业、农业、中外交流等相关问题展开深

入探讨。

16.“北方民族数字化与西夏文献研究”国际研讨会　201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联合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在银川举行此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爱尔兰、俄罗斯、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分两部分，一是北方民族的数字化。二是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来，我国民族古文字的数字化取得了很大发展。在信息产业部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组织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的有关专家，先后向国际编码组织提交了西夏文、契丹大字和小字、女真文的编码方案。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多年的讨论与修订，目前西夏文编码已经正式通过国际编码组织的审核。研讨会在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与会专家主要就西夏语言与西夏文献的解读等进行热烈讨论，通过学术研讨，充分展示了北方民族文字数字化与西夏文献解读的最新成果，同时，此次会议最大亮点，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在会后举办了“西夏文解读研讨班”，来自全国各所高校的40余名人员参加培训，充分显示青年学者对北方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浓厚兴趣，也表明西夏学发展具有美好的前景和独特魅力。

结　语

位于黑水河下游的黑水城，历史上农牧业发达，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乃至西域中亚文明的联结处。元朝灭亡后，黑水改道，古城废弃，留存至今的城垣遗址诉说着昔日的辉煌。1908、1909年这里出土的文献文物，催生了一门国际性学问——西夏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俄人文合作研究的深入，黑水古城和黑水城文献文物成为国际学术关注的焦点，作为黑水城的守护者，阿拉善人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主动参与文献文物保护，寻找阿拉善文化的边疆，用民族文化的独特禀赋和国际文化的大视野，构筑阿拉善未来的梦想和发展道路，这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参考文献

一、传世古籍

[后晋] 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宋] 欧阳修.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宋] 薛居正.旧五代史 [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元] 脱脱.辽史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元] 脱脱.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

[清] 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 [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

[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宋] 马端临.文献通考 [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清] 吴广成.西夏书事 [M].北京：清道光五年小砚山房刻本.

二、出土资料

1.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 [M].（1–20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

2. 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 [M].（1–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3.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 [M].（1–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6.

4. 谢玉杰、吴芳思主编.英藏黑水城文献 [M].（1–4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

5. 塔拉、李丽雅主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M］.（1–4册）.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6. 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三、研究著作

1. 史金波.西夏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白滨.党项史研究［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4. 周伟洲.唐代党项［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5. 李逸友.黑水城出土文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

6. 汤晓芳、陈育宁、王月星.西夏艺术［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7. 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9.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10.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12. 国立历史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M］.台湾：1996.

13. 慧宏、段玉泉.西夏文献解题目录［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

14. 杜建录 .二十世纪西夏学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15. 陈育宁 汤晓芳 雷润泽.西夏建筑研究（书评、序跋）2016.

16. 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7. 潘洁.《天盛律令》农业门整理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8. 杨志高.《〈慈悲道场忏法〉西夏译文的复原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9.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M］.文献（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

20. 杜建录.西夏史论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四、研究论文

史金波、吴峰云.元代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J］.银川：《宁夏大学学报》，1985，（2）.

聂鸿音.党项人方位概念的文化内涵［J］.银川：《宁夏社会科学》，1999，（3）.

杜建录.西夏的内宿制度［J］.银川：《固原师专学报》，1997，（4）.

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藏族史论文集》［J］.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历史地理》［J］.1989，（6）.

陈庄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J］.拉萨：《西藏大学学报》，2000，（5）.

石坤.斯坦因喀拉浩特遗址所发掘诸废墟及其出土文物对应关系［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史为民.党项拓跋部的迁移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J］.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史金波，杜羽.西夏文献新发现［N］.光明日报，国图新征集的西夏文献.

于熠.西夏法制的多元文化属性地理和民族特性影响初探讯［N］2016-8.

五、考古报告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立江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R］.1–3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J］文物.1987（7）.

附：20世纪黑水城文献文物研究及相关论著索引

一、国内研究

1.著作（含译著）

［清］张澍著：《西夏姓氏录》，罗振玉,雪堂丛刻本，1909年；林旅芝《西夏史》后附，影印本，1975年。

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版本有：日本京都初印本，1914年；东山学社铅印本，1919年；亚洲学术杂志，1921—1922年；待时轩丛刊本，1937年。

罗福成著：《西夏译莲花经考释》，成都：贞松堂印本，1914年。

罗福成著：《西夏国书类编》，广州：东山学社油印本，1915年。

戴锡章著：《西夏纪》，重要版本有：京华印书馆铅印本，1924年；

［俄］聂历山（著）、张玛丽（英译）、向达（汉译）：《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罗福成辑：《西夏国书字典音同》，沈阳：辽宁库辑整理处，1935年。

罗福颐录：《西夏文存》，待时轩丛刊本，1935年。

［清］吴广成著：《西夏书事》，重要版本有：1935年重印道光五年刻本；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3；龚世俊等校证本，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李蔚点校本，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山东：泰山出版社，2000年。

［俄］戈尔巴切娃、克恰诺夫合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见

《民族史译文集》第3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译，1978年。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罗矛昆点校本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李蔚点校本 ，《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山东：泰山出版社（山东），2000年。

李范文著：《同音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范文著：《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西夏］骨勒茂才编著：《番汉合时掌中珠》，整理本有：罗福成抄录重校本，1935年；罗福葆抄百衲本；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清］佚名氏编 ：《西夏志略》，胡玉冰校证本，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0，3。

甘肃图书馆藏：《西夏语文研究杂钞》，钞本，1990。

李逸友编著：《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西夏］北王兼中书令嵬名氏主修《西夏天盛律令》整理本有：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1—7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5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修订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华传世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著：《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西夏］梁德养、王仁持编著、［俄］克恰诺夫（俄译）、陈炳应（汉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

陈明猷著：《贺兰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汉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序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林英津著：《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单刊之二八，1994年。

［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俄］比奥特罗夫斯基编、许洋主汉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

史金波、魏同贤、［俄］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世俗部分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年。

史金波、魏同贤、［俄］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0年。

李范文、［日］中岛干起合著、大塚秀明、今井建二、高桥真理代协力：《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东京：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出版，1997年。

［清］张鉴著：《西夏纪事本末》，重要版本有：1903年重印光绪十年刻本；田禾等白话精评本，辽沈书社，1994年；龚世俊等校证本，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罗矛昆点校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李蔚点校本，《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济南：泰山出版社（山东），2000年。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汉译）：《西夏书籍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史金波、［日］中岛干起合著大塚秀明、今井建二、高桥真理代协

力:《电脑处理西夏文文海宝韵研究》，东京：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出版，2000年。

陈育宁著:《民族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著:《西夏美术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聂鸿音著:《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谢继胜著:《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杜建录著:《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万辅彬、杜建录主编：《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杨积堂著:《法典中的西夏文化》,《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杜建录著:《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

杜建录著:《天盛律令与西夏法制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史金波著:《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博物院、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史金波、黄润华著:《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韩小忙著:《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8年。

史金波、杜建录主编:《西夏社会文书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杨浣著:《辽夏关系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陈育宁 、汤晓芳著：《西夏艺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杜建录著:《党项西夏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漆侠著:《辽宋西夏金代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内蒙古博物院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日］井上充幸、加藤雄三、森谷一树著:《黑水城二千年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杜建录主编:《黑水城文献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

杜建录著:《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杜建录著:《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2.论文

王静如:《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及西夏民族与语言之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临时刊》，1930年。

罗福成 :《文海杂类》,《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罗福成:《杂字》,《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周叔伽:《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俄］龙果夫（编），王静如（译)：《苏俄研究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文书目译释》，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俄] 聂历山、石滨纯太郎（著）、周一良（译）:《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瑞典] 斯文赫定（著）、侯仁之（译）:《黑城探险记》,《禹贡半月刊》（第1卷9期），1934年。

陈寅恪:《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西夏研究》（第一辑），1932;《金明馆丛稿》（二编），1980年4月。

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分;《陈寅恪先生论集》（史语所特刊之三），1971年。

[俄] 克恰诺夫（著）、史金波（译）:《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杂类及其西夏辞书的地位》,《民族史译文》（第3辑），1978年。

史金波、白滨:《国外研究西夏文、西夏史简况》,《民族史译文集》（第3辑），1978年。

桑明峨:《我国西夏文辞书文海及其他》,《辞书研究》，1980年1月。

白滨:《西夏文字典文海的史料价值》,《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5月。

史金波:《简论西夏文辞书》,《辞书研究》，1980年2月。

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2月;《西夏史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史金波，白滨:《西夏文及其文献》,《民族语文》，1979年3月；白滨，《民族语文》，1979年3月；白滨，《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7月。

甘为:《西夏重镇黑城》,《宁夏日报》，1981年2月。

布鲁南:《西夏谚语管窥》,《宁夏日报》，1981年4月25日。

[日] 仁井田升（著），姜镇庆（译）:《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文书与马伯乐的研究——特别是唐代有关马政文书与西夏高利贷

文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4月。

胡戟：《黑城行》，《西北历史资料》，1982年2月。

李蔚：《番汉合时掌中珠初探》，《西北史地》，1982年3月。

马曼丽：《科兹洛夫与哈拉浩特文化》，《西北史地》，1983年1月。

史金波：《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月。

史金波：《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辞书研究》，1983年6月。

杨文光：《黑水故城》，《宁夏日报》，1983年6月。

黄振华：《 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献看西夏社会》，《中亚学刊》，1984年1月。

［俄］克恰诺夫（著），霍升平（译）：《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典押借贷文书》，《宁夏社科通讯》，1984年2月。

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2月；《西夏史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白滨：《西夏文献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1月；《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白滨：《从西夏文字典文海看西夏社会》，《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月；《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吴峰云：《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日］西田龙雄（著）、史金波（译）：《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民族语文研究情况资料集》（第5—6集），1985年。

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年3月。

［俄］克恰诺夫（著）、姬增录（译）：《十二世纪西夏法典》，《西北史

地》，1985年4月。

白滨:《1982—1984年我国西夏研究概述》,《宁夏社科通讯》，1985年6月。

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音同研究之一》,《民族古籍》，1986年1月。

陈育宁:《哈拉浩特与外国探险家》,《北方文物》，1986年1月。

王守轮:《苏联的西夏学研究》,《民族古籍》，1986年1月。

[俄] 克恰诺夫（著）、霍升平（译）:《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贞观玉镜统》,《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2月。

霍升平、胡迅雷、李大同:《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3月。

姜椿芳总编:《黑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罗矛昆:《西夏谚语译释》,《中国谚语集成》（宁夏卷），北京：中国ISBN出版社，1987年。

[美] 鲁斯·唐纳尔（著）、方骏（译）:《苏联的西夏学》,《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1月。

聂鸿音:《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符号研究》,《语言研究》（北京），1987年2月。

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宁夏艺术》，1987年4月。

史金波、黄振华:《黑城新出西夏文辞书音同初释》,《文物》，1987年7月。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7月。

史金波:《西夏文本类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亚西亚语言和历史研究》（西田龙雄教授60寿辰纪念文集），东京，1988。

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续）《民族艺林》，1988年

1月。

霍升平：《关于西夏新集锦合辞的几个问题——新集锦合辞的作者、编纂情况、版本与苏联学者的研究现状》，《民族艺林》，1988年1月。

霍升平：《苏联新出的西夏学专著《西夏国的书籍事业介绍》，《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1月。

史金波，聂鸿音，黄振华：《黑水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2月。

陈育宁：《黑城探幽》（上、下），《宁夏日报》，1988年3月。

[俄] 克恰诺夫（著）、胡迅雷（译）、胡若飞（校）：《关于俄译本西夏谚语集的简介》，《宁夏社科情报》，1988年4月。

[苏] 缅什科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敦煌研究》，1988年4月。

黄振华：《评李范文著同音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4月。

李范文：《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吗？——答黄振华评李范文著同音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4月。

周群华：《迷人的古城——哈拉浩特》，《文史杂志》，1988年5月。

[俄]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霍升平（译）：《苏联西夏学研究的历史与形状》，《宁夏文史》（第4辑），1989年。

罗矛昆：《关于一段西夏诗歌的考辨》，《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2月。

[日] 西田龙雄（著）、赵汝清（译）：《黑城与西夏语文献》，《陋名理论家》，1989年2月。

赵汝清：《西夏古城哈拉浩特调查概况》，《宁夏社科情报》，1989年2月。

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一》，《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5月。

罗矛昆：《研究西夏社会制度的珍贵史料——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5月。

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二，《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6月。

史金波:《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民族语文》，1989年6月。

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聂鸿音:《论文海第一摄及有关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苏] 缅什科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二、三),《敦煌研究》1989年1—2月。

李范文:《西夏法典》,《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1月。

王克孝:《苏联藏西夏汉文佛经刊本述略》,《文献》，1990年1月。

聂鸿音:《列宁格勒藏本西夏词书残叶考》,《民族语文》，1990年1月。

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1月。

李范文:《西夏法典》,《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1月。

李温:《〈西夏法典〉述评》,《法律科学》，1990年2月。

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3月。

[日] 野村博(著)、陈建玲(编译)、何荣(校):《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4月。

史金波:《一部有特色的历史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西夏文本类林译文试析》,《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2月。

李温:《〈西夏法典〉述评》,《法律科学》，1990年2月。

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3月。

聂鸿音：《文海探源》，《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3。

［日］野村博（著）、陈建玲（编译）、何荣（校）：《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4月。

聂鸿音著：《西夏文献研究小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3月；《人大宋辽金元史》，1990年4月。

史金波：《一部有特色的历史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

孙寿岭：《再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陇右文博》，1991年1月。

龚煌城：《类林西夏文译本汉夏对音字研究》，《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1991年。

王静如：《西夏法典序》，《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1月。

聂鸿音：《孟子传西夏文译本 》，《民族古籍》，1991年3月。

孙星群：《西夏汉文杂字"音乐"部之剖析》，《音乐研究》，1991年4月。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周群华（节译）：《苏联西夏学研究的历程》，《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4月。

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月；《人大宋辽金元史》，1991年5月。

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马忠建：《从掌中珠夏汉对音看十三世纪前后汉语西北方言纽系统若干特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4月。

刘鑫明：《西夏伦理道德的化石——西夏谚语研究之一》，《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4月。

刘鑫明：《黑城考古和西夏学的兴起 》，《历史大观园》，1992年9月。

黄振华：《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孙子研究札记》（之一），《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聂鸿音:《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音同研究之二》,《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聂鸿音:《西夏文天盛新律进律表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林英津、安可思:《类林西夏译本之研究》,《大陆杂志》(台湾)第84卷第5期,1992年。

王静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主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庆祝蔡元培先生65岁论文集》(下册)外编抽印本,1993年;

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略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1月。

陈炳应:《西夏兵书贞观玉镜将》,《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1月。

孙寿岭:《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2月7日。

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3月。

陈庆英:《从西夏文海看西夏语与藏语词汇的关系》(一、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月—4月。

李温、罗矛昆:《一部罕见的中世纪法典》,《宁夏法学》,1994年2月。

王新元:《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4月。

胡若飞:《西夏军事重典贞观将玉镜考》,《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6月。

庄电一、汤晓芳:《失传700年的类林重现原貌》,《新闻出版报》,1994年6月。

李之勤:《关于苏联列宁图书馆藏西夏地图册手稿的作者和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问题》,《西北史地研究》1992年3月;《东北亚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考补》,《民族语文》,1995年1月。

白钢：《佚匿异域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光明日报》，1995年3月。

胡若飞：《贞观将玉镜正文译考》，《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3月。

唐栋：《走进黑水城的俄国人——西域的愤怒》（之六）《丝绸之路》，1995年3月。

景永时：《俄国的西夏学》，《宁夏学刊》，1995年3月。

聂鸿音：《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西夏研究》，《民族语文》，1995年4月。

聂鸿音：《类林研究札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5年5月。

马文宽：《从居延到灵武》，《文物天地》，1995年5月。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6月。

史金波、聂鸿音：《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2月；《人大中国古代史》（二），1995年9月。

史金波：《寻找流失在异国的珍宝——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历史月刊》（台湾）第95期，1995年12月。

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月。

汤晓芳：《西夏史研究的两部重要史料——圣立义海、贞观玉镜将简介》，《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1月。

［俄］玛丽娅·鲁多娃（著）、张元林（译）：《哈拉浩特发现的中原风格的绘画作品》，《敦煌研究》，1996年3月。

王克孝：《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敦煌文物收藏品概况》，《敦煌研究》，1996年4月。

聂鸿音：《六韬的西夏文译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5月。

李玉：《黑水城出土西夏弥陀画初探》，《故宫学术季刊》（台湾）1996年6月。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10月。

聂鸿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韵书残叶考》,《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聂鸿音:《贞观政要的西夏文译本》,《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1月。

聂鸿音:《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蔚:《略论贞观玉镜统》,《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5月。

王静如、李范文:《西夏文杂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2月;《人大语言文学》,1998年4月。

霍永杰:《西夏古遗址——黑城》,《甘肃画报》,1997年1月。

木子:《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大型珍贵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民族研究》,1997年6月。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心得》,《古籍整理情况简报》,1997年6月。

王民信、林英津:《夏译〈孙子兵法〉研究评介》,《中国书目季刊》(台湾),1997年9月。

王民信:《评介三部西夏字书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研究、文海研究、同音研究》,《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1997年9月。

史金波、聂鸿音:《俄藏西夏文文献世俗目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2月。

张珠梅:《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汉字添加符号诠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4月。

李温:《西夏法典——研究西夏历史的珍贵资料》,《丝绸之路》,1997年6月;《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史金波、聂鸿音:《西夏文纂要释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之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聂鸿音:《文海韵的内部区别》,《民族语文》,1998年1月。

史金波:《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

《今日印刷》，1998年2月。

聂鸿音:《俄藏6965号天盛律令残卷考》,《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3月。

韩小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所反映的西夏道教》,《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3月。

刘菊湘:《关于天盛律令的成书年代》,《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4月。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成书年代辨析》,《寻根》，1998年6月。

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法律史论集》（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

罗矛昆:《圣立义海与西夏人的哲学思想》,《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陈炳应:《天盛律令·物离库门译释》,《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胡若飞:《西夏法典"比附律"考要》,《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马雅伦、郑炳林:《西夏文相面图研究》,《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史金波、白滨:《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释读》,《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2月。

史金波:《西夏文写本文海宝韵》,《民族语文》，1999年4月。

孙颖新、宋璐璐:《西夏天盛律令·亲节门辨正》,《民族语文》，1999年5月。

史金波:《西夏文书和西夏史》,《日本早稻田大学》，1999年12月。

白滨:《被遗忘的旷世奇珍——黑水城与西夏遗书》,《瞭望新闻周刊》（第51期），1999年12月。

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述要》,《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谢继胜：《西夏唐卡中的双身图像内容与年代分析》，《艺术史研究》（第二辑），2000年。

聂鸿音：《关于黑水城的两件西夏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李习文，景永时：《西夏书籍业及其特点——西夏书籍业提要》（上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1—2月。

杨志高：《西夏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

张珠梅：《〈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汉字添加符号诠释——尼×》，《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杨蕤：《黑城——西夏文献的宝藏》，《华夏文化》，2000年3月。

陈炳应：《西夏律令中水利资料译释 》，《陇右文博》，2001年1月。

史金波：《发现最早的活字印本——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学术动态》，2000年4月。

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3月；《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10月。

杨志高：《西夏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概述》，《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1月。

孙颖新、宋璐璐：《俄藏4429号西夏文类林残页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1月。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经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1月。

聂鸿音：《西夏文曹道乐德行集初探》，《文史》，2001年3月。

魏灵芝：《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世俗部分叙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3月。

史金波：《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4月。

[俄] 萨莫秀克（著）、杨富学（译）：《冬宫博物馆藏西夏壁画风格特征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史金波：《简介英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李范文、韩小忙：《西夏文义同辞书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张竹梅：《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语七品正齿音的音值构拟》，《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1月。

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1月。

张如春：《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医药文献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年1月。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年10月；《人大宋辽金元史》，2002年1月。

谢继胜：《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2年1月。

谢继胜：《黑水城西夏唐卡中的释迦牟尼佛像考》，《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1月。

谢继胜：《黑水城唐卡中的护法与空行母图像考》，《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3月。

聂鸿音：《西夏本十二国考补》，《文史》，2002年3月。

聂鸿音：《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的西夏书籍业及其中译本》，《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4月。

赵彦龙：《西夏时期的契约档案》，《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4月；《人大宋辽金元史》，2002年2月。

萨摩斯卡·吉拉（著）、郑国穆（译）：《西夏的行星崇拜——圣彼得堡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黑水城遗物》，《陇右文博》，2002年2月。

王元林：《西夏光定未年借谷物契考释》，《敦煌研究》，2002年2月。

林英津：《西夏语译六韬释文礼记》，《辽夏金元史教研通讯》，2002年2月。

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3月；

《人大宋辽金元史》，2002年4月。

聂鸿音：《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5月。

［俄］吉拉·萨玛秋克（著）、崔红芬（译）：《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馆藏黑城文物记述》，《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6月。

史金波：《西夏文文献的价值和整理出版的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史金波：《流失海外的西夏文明》，《寻根》，2003年。

李范文：《西夏文同音与同义比较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2月。

张竹梅：《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语有无舌上音》，《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3月。

聂鸿音：《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4月。

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5月。

［俄］吉拉·萨玛秀克（著）、王帼艳（译）：《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十二世纪时期的"星魔圈"》，《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6月。

庄电一：《西夏珍贵文献流失俄英九十年》，《光明日报》，2003年6月14日。

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孙颖新：《十二国的西夏文译本》，《民族语文》，2003年6月；《人大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10月。

克恰诺夫著、崔红芬译：《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5期。

杨满忠：《黑水古城及其历史文化特点》，《西夏学》，2006年第1辑。

孙继民、陈瑞青：《试释几件俄藏黑水城宋鄜路公文草稿》，《西夏学》，2006年第1辑。

史金波：《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孙继民:《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命名》,《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杨倩描:《黑水城出土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聂鸿音:《英藏西夏文海龙王经考补》,《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孙继民、杜立晖:《俄藏黑水城金代毛克文初探》,《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杜建录:《西夏乾祐二年材料文书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白滨:《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贾常业:《西夏词典的注字及构字特点》,《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陈瑞青:《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帖黄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

陈瑞青:《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汤君:《西夏全真教佚词十一首考释》,《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崔红芬:《英藏西夏文圣智慧到彼岸功德宝集残叶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杨志高:《英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误定之重考》,《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潘洁:《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张国旺:《俄藏黑水城TK1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王亚莉 :《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8年第1期。

王艳云：《西夏黑水城与安西石窟壁画间的若干联系》，《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杜建录：《黑水城汉文文献综述 》《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孙伯君：《黑水城出土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译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彭向前、李晓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合璧历日考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黄杰华：《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慈乌大黑要门试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许伟伟：《天盛律令·节亲门对译与考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慧宏:《黑水城出土尚书句解残页考》,《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钱粮房照验状考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潘洁:《黑水城出土元代赋税文书研究》,《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徐悦:《元代亦集乃路农作物种类考述》,《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王亚莉:《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八站”考释》,《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杜立晖：《黑水城F114:W3元代选充仓库官文书初探》，《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陈艳：《俄藏黑水城TK318号文书题名及版本问题》，《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束锡红:《黑水城河边大塔的性质及断代——以考察队的地图和照片为中心》，《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辑。

史金波：《英藏黑水城文献定名刍议及补正》，《西夏学》第5辑，2010年9月。

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金狮子章云间类解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

王爽、蒋厍勐：《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看西夏的婚姻法律制度》，《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22期。

克恰诺夫著、韩潇锐译：《俄藏第8203号西夏文书考释》，《西夏学》第五辑，2010年9月。

王使臻：《俄藏文献 Цх.2822字书的研究》，《西夏学》第5辑，2010年9月。

李娜：《论西夏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天盛律令为中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杜建录：《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杜建录：《俄藏西夏天庆年间典粮文契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

王培培：《俄藏西夏文维摩诘经考补》，《西夏学》第5辑，2010年9月。

孙继民：《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集意义》，《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

邵方：《西夏法典对中华法系的传承与创新——以天盛律令为视角》，《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薛正昌：《黑水城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影响》，《西夏学》第5辑，2010年9月。

韦兵：《俄藏黑水城文献佛说寿生经录文——兼论11—14世纪的寿生会与寿生寄库信仰》，《西夏学》第5辑，2010年9月。

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手印定引导略文考释》，《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

郑怡楠:《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

王培培:《俄藏西夏文佛说诸佛经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王培培:《英藏西夏文维摩诘经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慧宏:《英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考》,《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

屈耀琦:《对黑城出土的一件祭祀文书的考释》,《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

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版本考》,《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概述》,《西夏研究》,2011年第4期。

聂鸿音:《俄藏4947号西夏韵书残叶考》,《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

王荣飞:《英藏西夏文译贞观政要初探》,《西夏研究》,2012年第3期。

孙继民:《黑水城文献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

韩伟:《民间法视野下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兼与汉文卖地契的比较》,《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

孔德翊:《黑水城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自然灾害》,《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

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众会合约社会研究》,《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辑。

杜建录:《中国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借钱契研究》,《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辑。

梁继红:《俄藏黑水城TK27P西夏文佛经背裱补字纸残片性质辨析——西夏乾祐年间材值文书再研究之二》,《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13年第10辑。

崔红芬:《英藏西夏文大宝积经译释研究》,《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辑。

彭向前:《俄藏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辑。

张笑峰、王颖：《英藏西夏文圣智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魔行品考》，《西夏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辑。

宋坤：《黑水城所出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川绢、河北绢问题补释》，《宁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张海娟：《黑水城文献与蒙元史构建》，《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

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 读后》,《西夏研究》，2016年第3期。

赵彦龙:《俄藏黑水城西夏汉文No.2150号文书再探讨》,《西夏研究》，2016年第3期。

李晓明:《英藏西夏文孙子兵法残页考释》,《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 。

侯爱梅：《黑水城所出元代词颂文书中的法制术语考释与研究》，《西夏研究》， 2016年第4期。

宋坤：《黑水城所出识认状问题浅探》，《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

王培培:《英藏汉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考释》,《西夏学》 第12辑，2016年。

宋坤:《俄藏黑水城所出汉文六壬课秘诀版本辨正》,《西夏学》 第12辑 2016年

张淮智：《黑水城所出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整理与复原》，《西夏学》第12辑，2016年。

杜立晖：《黑水城所出元代劄子考 》《西夏学》 2017年第12辑，2016年12月。

林玉萍 孙飞鹏:《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新规佛经考释》,《西夏

学》第12辑, 2016年。

崔红芬:《从父母恩重经看儒释融合——兼及敦煌、黑水城残本比较》,《西夏学》第12辑,2016年。

张淮智:《黑水城所出大德十一年税粮文卷整理与复原》,《西夏学》第12辑,2016年。

周永杰:《元代亦集乃路的物价——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学》第12辑,2016年。

王巍:《俄藏黑水城文书卜筮要诀考释》,《西夏学》第12辑,2016年。

卜凯悦:《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刻本研究述论》,《西夏学》第十二辑,2016年。

二、国外论著

(一)俄罗斯

1.著作

[俄]尼姑拉·普尔热瓦尔斯基著:《蒙古语唐古特人之国》,彼得堡,1875年。

[俄]波塔宁著:《中国唐古特和西藏的交界地带》,圣彼得堡,1893。

科兹洛夫著:《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莫斯科:彼得格勒,1923年;1947年莫斯科再版。

[俄]聂历山遗著:《西夏语文学——研究论文和字典》(二卷),苏联科学院东方所特设委员会监印,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曾获得苏联最高学术奖列宁文学奖)。

[俄]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合编:《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分所所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已定者目录》,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3集,1978年。

[俄]克拉乌松著:《未来的西夏研究》,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4年。

[俄] 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合著：《西夏文译的中国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6年。

[俄] 鲁勃·列斯尼钦科、萨弗拉夫斯卡娅合著：《死城哈拉浩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

[俄] 克平、克罗科洛夫、克恰诺夫、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合著：《文海》（两卷），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9年。

[俄] 克恰诺夫著：《新集锦合辞》，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74年。

克平著：《孙子的西夏文译本》，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79年。

[俄] 克平著：《遗失的汉文类书类林的西夏文译本》，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83年。

[俄]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国家的书籍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王克孝、景永时汉译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俄] 孟列夫著：《黑城出土的汉文遗书叙录科兹洛夫卷》，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84年；王克孝汉译本；宁银川：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俄] 克恰诺夫译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

[俄] 克恰诺夫：《11—13世纪的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傅海波合著巴亚尔科学院哲学历史论文集》（104卷），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俄] 克平著：《新集慈孝记》，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90年。

[俄]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的物质文化》，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93年。

[俄] 米哈依·彼奥特洛夫斯基著：《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意大利：米兰爱利克塔出版公司，1993年；中译本，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1997年。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俄］克恰诺夫著：《圣立义海》，圣彼得堡，1997年。

［俄］克恰诺夫编著：《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东京：日本京都大学，1999年。

2.论文

伊凤阁：《哈拉浩特出土的唐古特手稿》，《俄国皇家地理学会XLV.463—470》，1909年。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探险队日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档案第18宗》目录1，157号。

伊凤阁：《哈拉浩特出土的唐古特手稿》，《俄国皇家地理学会XLV.463—470》，1909年。

伊凤阁 、奥登堡、考特维奇合著：《科兹洛夫黑水城所获文物》，《俄国民族学资料》，圣彼得堡，1909年。

伊凤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夏汉对译)，圣彼得堡，1916年；沙畹法文注译，《通报》第12期，1911。

伊凤阁：《黑城出土文书——14世纪的中国私人书信》，《皇家科学院通报》第6集7卷第13号，1913年。

奥登堡：《黑城出土的佛教造像资料——藏传风格图像学》，《俄国民族学资料》2卷，1914年。

沃尔科夫：《黑城塔墓中的人类遗骸》，《俄国民族志资料》第2卷，1914年。

阿列克赛列夫：《1818—1918年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文物简介》，彼得格勒，1920年。

伊凤阁：《西夏文文献》，《俄国科学院通报》第6集，1918年；《法文译释亚洲杂志》第552号，1921年。

伊凤阁：《西夏国书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1期，1923年12月。

聂历山：《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日本亚细亚研究》（第4号），大阪东洋学会，1926年又见《西夏语文学·聂历山著作目录卷一》，1960年。

聂历山著、石滨纯太郎译：《西夏文般若经片断》，《艺文》第18卷第5号，日本京都，1927年。

聂历山：《西夏文字典小记》，《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日本京都，1927年；又见《西夏语文学》（卷一），1960。

龙果夫：《西夏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尼卒汉译音拟构》，《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

伊凤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释文》，《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期，1930年6月。

聂历山著、向达汉译：《西夏语研究小史》，《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2年。

聂历山：《西夏国书残经释文》，《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2年。

聂斯克著、石滨纯太郎译：《西夏文八千颂本般若经合璧考释》，《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期，1932年。

聂历山、石滨纯太郎合著、周一良汉译：《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聂历山：《苏联研究院亚洲博物馆藏西夏书籍目录二则》，《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聂历山：《类林释文》，《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龙果夫著、王静如汉译：《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所藏西夏书籍目录》，《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石滨纯太郎、聂历山合著：《西夏语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1933年。

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写本非佛教部分概述》，

莫斯科：《东方文献》第7卷，1934年。

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汉文古佛教写本简明目录》莫斯科：《东方文献》第8卷，1936年。

聂历山：《西夏文献及其馆藏》，《在1935年3月20日苏联科学院年会东方学会分组会报告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

苏伯尔：《黑水城佛像画中的乐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艺术和文化部学刊》第4期，列宁格勒，1940年。

鲁格：《10至13世纪中国印刷术简史》，《苏联东方学》第1期，1940年。

科切托娃：《黑水城艺术中的天界神灵》，《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丛刊》第4期，列宁格勒，1947年。

戈尔巴乔娃：《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档案中有关西夏学的资料——聂历山档案》，《东方学研究所简报》18卷，1956年。

克恰诺夫：《中国史料中关于唐古特人的民族学资料》，《东方国家与民族》第1期，莫斯科，1959年。

戈尔巴乔娃：《唐古特学发展的新阶段——聂历山有关西夏学著作的出版》，《东方学问题》第6期，莫斯科，1959年。

卡津：《哈拉浩特历史简述》，《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丛刊东方各族文化和艺术》卷5，列宁格勒，1960年。

戈尔巴乔娃：《列宁格勒的西夏学史》，《东方学研究所学术丛刊》25卷，莫斯科，1960年。

克恰诺夫：《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西夏文字典》，《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1年。

孟列夫：《黑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57卷第7集，1961年；戴密微法文注译，《通报》51卷第4—5期，1964年。

格列克捷亚可洛娃、克尔切多娃、鲁波·列斯尼琴科、鲁多娃合著：《对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哈拉浩特唐古特文书的研究》，《在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纪念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列宁格勒，1964年。

格列克、捷亚可洛娃、克列托娃、鲁勃·列斯尼钦科、鲁多娃合著：《由黑水城到爱尔米达兹——唐古特文化遗迹的研究》,《关于忽必烈学术讨论论文集》，1964年10月。

克恰诺夫：《作为历史资料的黑城西夏文献 》，《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5年。

克恰诺夫：《有关西夏政权机构的西夏文史料官阶封号表》，《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1965年。

捷连提耶夫 ·卡坦斯基著：《唐古特书籍的类型》，《东方民族文化史的文献与问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简报》，1967年3月。

鲁勃·列斯尼钦科：《蒙古统治下的哈拉浩特》，《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1967年工作总结》（学术会议报告提纲），1967年。

孟列夫：《中国古代文献研究》，《苏联科学院通报》第8期，1967年。

鲁勃·列斯尼钦科：《哈拉浩特历史考古研究》，《东方的国家与民族》第6期（苏联科学院、苏联地理协会东方委员会），莫斯科，1968年。

鲁多娃：《哈拉浩特出土的两张版画 》，《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画报》第28期，列宁格勒，1968年。

克恰诺夫：《十二世纪中期唐古特关于反对国家罪的法律》，《东方民族文化史的文献与问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科学会议简报》，莫斯科，1968年4月。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载文海影印本第一部分文海、文海杂类是唐古特刊本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

克恰诺夫：《掌中珠——研究唐古特文学的材料》，《中国与朝鲜文学的体裁和风格》（论文集），苏联科学院，莫斯科 ，1969年。

科切托娃：《哈拉浩特的中国画 》，《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通讯》第30期 ，列宁格勒，1969年。

科切托娃：《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所绘人像 》，《艾尔米塔什珍藏》第36卷，1969年。

马克西莫娃:《黑水城12至13世纪纸画的修复》,《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31卷，1970年。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勃莱格尔、康斯坦丁诺夫合编:《西夏圣祖赞咏》,《东方文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

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历史语文学研究》（1968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

索弗罗诺夫:《与文海相连的西夏语文学的几个问题》，莫斯科:《亚非民族历史、经济和文化》第4期，1971年。

克恰诺夫:《西夏谚语》,《苏联民族志》第3期，1971年。

克恰诺夫:《新集金碎掌置文》,《苏联民族志》，1971年。

克恰诺夫:《黑水城所出1224年的西夏文书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贴》,《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4卷2期，1971年。

孟列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远东和中亚写本藏卷》,《考古学年鉴》（1970），莫斯科，1971年。

克平:《带有三家注释的汉文兵书孙子西夏译本的版本考订和语法研究》（硕士论文），1971。

克平:《中国孙子兵法的唐古特语译本》,《东方的国家与民族》第11期（苏联科学院、苏联地理协会东方委员会），莫斯科，1971年。

克恰诺夫、鲁波·列斯尼钦科合著:《哈拉浩特钱币的流通——有关拾得物的资料》,《东方的国家与民族》第11期，1971年。

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至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69年鉴》，1972年。

克平:《唐古特与宋的类林东方民族文化史的文献与问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简报》，1972年。

克恰诺夫:《唐古特学——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莫斯科，1972年。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全部唐古特收藏品中与书籍业相联系的人名》,《东方民族文化史的文献与问

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简报》，莫斯科，1972年8月。

克恰诺夫：《关于唐古特人和文化的一些问题》，《亚洲东方历史和文化》第3卷，1972—1976年。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哈拉浩特发现的11至13世纪唐古特古文献书籍》（申请副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列宁格勒，1973年。

克恰诺夫：《在词典掌中珠（1190年）中叙述的唐古特国诉讼程序》，《东方民族文化史的文献与问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简报》，莫斯科，1973年9月。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哈拉浩特的唐古特书籍及手抄本的时期判断》，《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1年鉴》，莫斯科，1974。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唐古特书籍的艺术装帧——根据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手抄藏本的资料》，《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1年鉴》，莫斯科，1974年。

克恰诺夫：《从唐古特语翻译的正文和注释——搜集到的两种珍贵的格言木刻本重新出版》，《东方文献》第40期，莫斯科，1974年。

索弗罗诺夫：《文海中语音单位的分配研究——第一批反切符号》，莫斯科：《世界文化的历史与理论问题》，1974年。

索弗罗诺夫：《解译唐古特文书》，莫斯科：《古代文书秘密的解译问题》，1976年。

克恰诺夫：《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杂类及其在西夏辞书中的地位》，《文海》影印本第一部分，莫斯科，1969年；史金波、黄振华汉译，《民族史译文集》（第3集），1978年。

克恰诺夫：1170年的西夏文卖地文书（天盛22年地契）克恰诺夫《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1年鉴》，莫斯科，1974年。

聂历山：《哈拉浩特唐古特文学出版方案》，《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0年鉴》，莫斯科，1974年。

克平：《保存在唐古特译本中的中国著作十二国》，《东方民族文化史

的文献与问题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简报》，莫斯科，1974年10月。

克平：《唐古特译本所存已失传的中国汉文类书》，《亚非民族历史、经济和文化》第1期，莫斯科，1974年。

克恰诺夫：《西夏法律史略——在西夏十二世纪法典中的中国中世纪的十个罪犯》，《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0年鉴》，1974年。

克恰诺夫：《唐古特词典圣立义海中关于奴隶和仆人的论述》，《东方的国家与民族》，莫斯科，1974年。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奥尔德罗格主编）：《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东方国家和人民》，1974年。

克恰诺夫：《远东法律中的案例与法典关于西夏法的范例》，《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第1期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学术会议报告提纲》，莫斯科，1975年。

鲁多娃：《官僚和仆人——哈拉浩特的画》，《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画报》第41期，列宁格勒，1976年。

鲁勃·列斯尼钦科：《哈拉浩特的瓷制品》，《东方的国家与民族》第18期（苏联科学院、苏联地理协会东方委员会），莫斯科，1976年。

克恰诺夫：《西夏法典12—13世纪》，《西藏研究——第29届国际东方学会文集》，巴黎，1976年。

克平：《唐古特译本中的手写本孙子兵法》，《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2年鉴》，莫斯科，1977年。

克恰诺夫：《黑城西夏文债卷》，《东方文献》，1977年。

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唐古特抄书史》，《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年鉴》，莫斯科，1977年。

克恰诺夫：《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写本西夏地图》，《东方国家与民族》第1期，莫斯科，1959年；李步月汉译，《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1月。

克恰诺夫：《12世纪西夏法典中异族与外国的规定》，《东方国家与民

族》第22期，1980年。

克恰诺夫:《从法律状况看西夏的佛教与国家》,《匈牙利东方学报》1期，1980年。

克恰诺夫:《西夏法典中所反映的12至13世纪的社会组织》,《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81年。

克恰诺夫:《12世纪的西夏法典》,《亚非民族》第2期，1983年。

克恰诺夫:《党项译经史》,《纪念乔玛诞生200周年文集——西藏和佛教研究》，布达佩斯，1984年。

列昂诺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西藏艺术品》,《德国慕尼黑第3届国际藏学会议论文》，1984年。

克平、捷连提耶夫 ·卡坦斯基:《在西夏译文中关于梁武帝的伪书》,《东方文献历史-语文学研究1978—1979年鉴》，莫斯科，1987年。

克恰诺夫著、赵明鸣汉译:《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萨莫秀克:《科兹洛夫探险与黑水城艺术日本东京举办的西夏王国艺术展图录》，1989年。

萨莫秀克:《西夏帝国艺术》,《东亚艺术》3卷3期，1993年。

索罗宁:《十二国》,《东方学报》，圣彼得堡，1995年。

克恰诺夫:《黑城裨将述略1225年3月》,《东方文献》，1997年。

吴兢:《贞观政要西夏译本残叶考》,《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萨莫秀克著、迈克尔 肖特尔英译:《西夏国的行星崇拜——圣彼得堡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遗物》,《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学》(丝绸之路研究学会会刊第5辑)，1997—1998年；郑国穆汉译，《陇右文博》，2002年2期。

萨莫秀克:《西夏艺术作品中的肖像研究及史实》,《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增刊 。

三、日本、韩国

石滨纯太郎、聂历山（合著）:《番汉合时掌中珠》,《史林》15卷，1930年。

桥本万太郎:《掌中珠中夏、汉对音研究的方法》,《中国语文学》109期，1961年。

桥本万太郎:《关于文海的韵尾组织——论西夏语的音韵》(1),《言语研究》41，1962年。

西田龙雄 :《关于已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言语研究》41号，1962年。

桥本万太郎:《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言语研究》43，1963年。

桥本万太郎 :《关于文海韵的组韵组织和西夏语语音韵论》(2),《东方学》30，1965年。

西天龙雄:《关于西夏语译论语》,《吉川博士退休纪念论文集》，1968年。

西天龙雄:《评克恰诺夫等著文海——西夏语刊本复制》,《东洋学报》52卷2号，1969年。

川口久雄:《唐代类林的全貌——西夏文传本》,《日本中国文学会报》22册，1970年;《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文集》18册，1970年；《岩波书店文学》38卷12号，1970;《朝日》，1971年10月29日。

野村博:《西夏文土地买卖文书式》(1—2),《东洋史苑》14—15号，1979年。

仁井田陆:《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文书与马伯乐的研究——特别是唐代有关马政文书与西夏高利贷文书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交易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年；姜镇庆（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1年4期。

野村博:《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道理》,《小野胜年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

野村博：《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东洋史苑》23号，1984年。

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期，1986年。

野村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之我见》(1)，《东洋史苑》30—31号，1988年。

野村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之我见》(2—3)，《 东洋史苑》38、46号，1992、1996年

中岛干起、今井健二：《西夏文杂字的电脑分析》，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1996年。

松泽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余滴》(1)，《东洋史苑》5号，1999年。

松泽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余滴》(2)，《龙谷史坛》112号，1999年。

李范文、中岛干起（合编）、今井健二：《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年。

松泽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余滴》(3)，《东洋史苑》55号，2000年。

关尾史郎：《俄藏黑水城文献收藏一览》(1—2)，《敦煌文献总合的学术研究》，2001—2002年。

荒川慎太郎：《电脑处理文海宝韵研究评价》，《言语研究》121号，2002年。

岛田正郎著：《西夏法典初探 》，《东洋法史论集》第8，东京创文社，2003年。

荒川慎太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所藏中西（亮）搜集的西夏文——关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断片》，《内陆亚西亚研究》18号，2003年。

四、欧美

[法] 伯希和：《评聂历山：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通报》24卷2期，1926年。

[英] 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记》（第4卷，黑水城发掘），伦敦：

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28年。

［英］斯坦因著：《亚洲腹地考古记》（第4卷，黑水城发掘），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28年。

［瑞典］斯文赫定著、侯仁之汉译：《黑城探险记》，《禹贡》第1卷9期，1934年7月。

［意大利］马可·波罗著，冯承钧汉译：《马可·波罗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英］杰拉德·克劳森：《西夏研究展望》，《东方学家第20届大会文集》，1938年；《亚洲论丛》第11期，1964年。

［英］格林斯蒂德：《英国博物馆藏西夏文残卷》，《英国博物馆季刊》24卷3—4号，1961年。

［英］格林斯蒂德著：《西夏文字典》，中国第8期，1964年。

［法］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译本》，《通报》55期，1969年。

［英］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字分析》，伦敦，1972年。

［英］格林斯蒂德：《西夏文大藏经》，印度：新德里，1973年。

［法］伯希和：《科兹洛夫在黑城所获汉文西夏文书》，《亚洲杂志》11卷3期。

［美］鲁光东著：《合时掌中珠——十二世纪的番汉字典》，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敦出版社，1982年。

［美］邓如萍：《西夏人与西夏国家》，美国密执安，1983年。

［美］邓如萍，方骏汉译：《苏联的西夏学》，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1期。

海瑟著、熊文彬汉译本：《早期的汉藏艺术》，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美］林瑞宾：《西夏的塑像》，《东方杂志》，1994年6月。

［美］林瑞宾：《近期发现的西夏佛教艺术品一瞥》，《华裔学志》43期，1995年。

［美］邓如萍：《12—13世纪中西夏佛教中的肖像画和施主》，末见发表。

［美］邓如萍：《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



后　记

本书稿的完成经历了艰难的过程。真正着手，方感学识浅陋，经验匮乏，甚至力有不逮。面对浩大、深邃的文献，随即彷徨犹豫起来。此时，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前辈学者奋博学海，披荆斩棘，终成正果的精神激励了我；加之，深获博物馆领导和同事的有力支持，于是，以勤能补拙，持之以恒，终能交稿。

其间，我积极学习积累，请教于学长智者。诸多良师益友倾力相助，令人感怀不已。

衷心感谢杜建录导师，他博我以文，授我以渔。传身教使我敬畏于斯，循循善诱使我执着于斯，耳提面命使我开拓于斯。

衷心感谢孙建军局长、景学义局长、张震洲馆长对于拙稿的大力支持。

衷心感谢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于光建老师、张笑峰老师、高仁博士、邓文韬博士、李玉峰博士，他们的热心指正与不吝赐教使得拙稿的表现方式多有增色。

衷心感谢阿拉善博物馆的王秀梅老师，项羽、王丽娟、杨峰同仁，他们对文本核对给予大力支持。

最后衷心感谢我的家人。

2017年7月9日



BAINIAN

HEISHUICHENG

百年黑水城

责任编辑：房金蓉

装帧设计：吉　庆

上架建议：历史研究


ISBN 978-7-5490-1492-7

9 787549 014927 >

定价：38.00元